

類別 110
156

三之書叢誌

種
々

偽文藝類

文化協會

著

者

7803



MG

K825.6

34

雜誌叢書

第 三 種

人 物 種 種



3 1761 5026 0

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

人物種種目錄

序	(一)
記茅盾	(二)
記郁達夫	(八)
記田漢	(一六)
記洪深	(二四)
憶曹禺	(三五)
記憶中的沈從文	(四〇)
記馬彥祥	(四六)

艾蕪與沙汀	(五九)
記阿英	(六九)
憶鳳子	(七九)
獨脚學者潘光旦	(八九)
回憶許地山先生	(九四)
從崑曲說到吳梅	(一〇一)
憶黃季剛師	(一〇七)
憶弘一法師	(一一五)
章瘋子	(一一九)

編序

近十年來傳記文學獨盛，西洋出版界所出的傳記文學不知有多少，不但名人在寫「自傳」之類，就是無名作家，也往往有寫一部類乎「自傳」的故事，而一舉成名。在自傳以外，其他由作家來寫的傳記，更是多得不可勝數。不但是整部的傳記，就是零篇的人物素描，人物特寫一類的文章，也風起雲湧，成爲一時寫作風氣。這種風氣並不是作家和新聞記者無端創造出來的，而是由於讀者的需要，而自然地蔚成的。

讀者所以愛讀這類寫人物的文字，原因很簡單，卽此類文字有血有肉，雖然寫的是個人的事，可是被寫者因爲大都是著名人物，與時代息息相關，所以時代的影子也依稀可以在文中看出。而且近代傳記文學家的寫作方法也不同了，他們不但寫人物的業績，還把人物當作一個「人」來看，以「人」的見地去理解他，因此人物的私生活成了傳記中的重要部分，這種一反傳統的傳記文學寫作方法，打破了羣衆的偶像觀念，也把人物的「英雄性」減到最低限度，因此讀者對於所寫的人物可以感得更親切一點，在人的認識上也更透澈一點。

這種空氣也沾染到中國出版界，顯然可見，可是這並不壞，我們也不妨學人一點長處。本刊復刊以來，寫人物的文字刊過不少，有時一期裏甚至有兩篇或三篇，不過寫的以文人佔絕大多數，可是也不打緊，以文人的生活來表現這個時代，仍不失爲是一種方法，至於寫的材料，當然不限於人物的經歷及其作品，還兼及其私的一面，也許這是更能表現人物的個性的。

這是「人物種種」的第一集，在第二集中，人物的性質也許還要廣大一點。

記茅盾

我認識茅盾，還是八年以前的事情。

在一間狹窄的亭子間裏，朋友C爲我介紹：「這就是茅盾先生！」

我抬起頭來凝視着他：瘦小的身材，像蘆葦一樣風洒而又堅實，兩顆細小的眼睛，射着逼人的慈祥的光芒。

我緊握住他的手，叫了一聲：「茅盾先生！」一剎那，我不知道被什麼力量吸引住了，我說不出話來。他的有力的手，火一樣地溫暖了我的心。他是那樣慈祥，和藹，詳盡而又親切地詢問着我的一切。

我感動了，一絲人間的溫情，流進了我的心胸。我要求他，希望他以後能多多地給我以指示。

閉門寫「子夜」

我開始讀着他更多的作品，除了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之外，我又讀了他的長篇小說「虹」，短篇小說「野薔薇」，「宿莽」等，那種流暢而生動的文筆，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每一篇作品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有着我的縮影，我把我自己的命運與他們的命運聯系起來，在他們之中得到了夥伴，得到了慰藉，更得着溫暖，……。

對於一些不了解的人物，個性，境遇，我老是要了解，我仔細地向他探索着一切，他也老是不



憚煩向我解釋着一切，有時要到深夜。

那時，茅盾先生正在埋頭寫他的長篇小說「子夜」，整日夜的不大出外，有時出去，也要在夜深人靜之後，我瞧着他穿着一件龐大的棉袍子，戴着一頂赭色的皮帽子，在已經達到幾百度的近視眼鏡上，還要加上一副墨色的眼鏡。急忙忙地走出去，我瞧着他在黑暗中逝去了的背影，彷彿已經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這才與匆匆地，回到我的狹窄的亭子間中，很安靜地睡去了。

有時，我被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纏繞住了，我想跟着他的背影，追上前去，和他談一個痛快，但我又怕驚動了或就誤了他的要事。

在這種時候，我獨個兒徘徊在他的寓所的門口，或者弄堂門外，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

在一天下午，他突然跑來找我，他興奮地拍着我的肩膀說：「我有半個月的空時間，我打算做一件事情，你能不能陪着我去做？」

我毫不猶疑地答應了，也不管那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實地的觀察

原來他那時所寫的長篇小說「子夜」中需要明白「交易所」中的情形，他打算花半個月的工夫去實地調查一番，然後才執筆寫作。

以後，我們每天出現在各個交易所中，瞧着那些騷動着的人們，瘋狂地嚷着：「空頭」「多頭」的買賣，我們冷視着，一直要到交易所收息時，才蹣跚地踏了出來。

有時，茅盾先生更活躍得像一個商人，擠在生意買賣的人叢中去打聽行情，他表現得是那樣地認

真，又是那樣地老練。

每天晚上歸來時，他獨自地關在他的書室裏，埋頭寫作了。

每晚我從弄堂外面，瞧見他書室中的燈火扭開着，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又出現在他的寓所的弄堂裏時，他書室中的燈光仍舊是明亮的，差不多每晚都是這樣。

我開始被一個人的努力深深地感動了，我開始知道一個作家的成功，是經過了怎樣堅忍的努力。

這以後，我們有五個月沒有見面，我爲了怕就誤了他的工作，一直沒有去找過他，後來，據說他將他的家暫時搬回故鄉浙江桐鄉去了，也是爲了「子夜」的寫作。

五個月以後的一天下午，我們在北四川路的上海大戲院的門口碰着了，那時，上海大戲院正在開映蘇聯的片子「金山」，上海的文化人差不多都爭先恐後地去看這一張片子。

這時，雖則是春天，他仍舊穿着那件寬大的棉袍子，一頂皮帽子，更戴得下了，差不多齊了他的眼睛角，他的態度仍舊是那樣從容和精明的，他一看見我便握着我兩隻手，把我拖到上海大戲院的樓梯的後面，熱心地問着我五個月來的近況。這五個月來，我的內心正沉浸在秋天的境域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酸痛，多少朋友離開了，多少面貌改觀了。多少……一長串的悲憤和淒涼。

他照例給我許多安慰和鼓勵。

因爲時間的匆促，我們沒有談到更多的話。戲散後，也不能允許我們談更多的話。在黑暗的戲院中，我們緊握着手，互道一聲「再會」，便分別了。

嚴謹的工作者

記 茅 盾

這以後，便一直沒有見面，只是知道他仍舊是在上海，他仍舊靠着賣文來度活，他仍舊是……內心算是得到了些微的安慰。

一直到事變的前一年，我才在一個歡迎會上碰着了，我們離別雖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功夫，但是，茅盾先生變了，他變得是那樣的冷靜與沉着，彷彿一言一笑，都可以震天地，憾山岳似的，他的表面冷靜得就像一塊寒光閃閃的鋼鐵，而他的內心却潛伏着無限的熱和力。

那時期，他正是舊病復發的當兒，胃病和心臟衰弱症，緊緊地追隨着，不願放鬆他一步，然而，他便在這整日夜病魔纏擾中，進行他的工作，有時，他爲了生活，也是爲了工作，一天要寫上將近萬字的文章，有時，他又得冒着風和雨，深更夜半去出席各式各類的座談會，沒有怨言，更不感到絲毫的疲乏，彷彿像一隻跋涉在沙漠中的駱駝似的，默默地工作着。

八一二事變後，雖在各種座談會中，不時地遇着他，但也無言可說，好像一切談話都是多餘的了。上海戰事西移後，他決心帶着他的太太和三個孩子到內地去，臨走的前幾天，我碰着了，他緊握我的手，他問我要不要到內地去，他說，他能够幫助我解決到內地的路費與工作問題……

他是那樣地熱心與興奮。

不知怎樣，我變得那樣冷淡，我搖搖頭，毫無意識地答覆他：「我不願離開上海！」這一別，不想就是五年多了。這期間，我會經從各方面和報章雜誌上設法去打聽他的行蹤與他的生活工作狀況，只要是一點點，我也心滿意足了。

在新疆和香港

在漢口時，據說，他對於當局的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政策不滿，又曾經帶着他的全家跑到遼遠的新疆去，準備開闢新的天地，但不久又爲了政治見解的不同，而不容於新疆當局，幾乎送了他的性命。

從新疆出來，又回到重慶，結果又爲了對渝府不滿，而不得不重新帶着他的全家，跑到香港去，仍舊度着他的賣文生活。

顛沛，流浪，掙扎，這是他的半生。

在香港，他寫了一篇日記體似的中篇小說，題名「腐蝕」。

他在「腐蝕」的開場中這樣寫道：「這一束，斷續不全的日記，發現於陪都（重慶）某公共防空洞，日記的主人不知爲誰氏，存亡亦未卜。該防空洞最深處岩壁上，有一縱深尺許的小洞，日記即藏在這裏。是特意藏在那裏的呢，抑或偶然被遺忘——再不然，就是日記的主人已經遭遇不幸，這都無從究明了。日記本中，且夾有兩張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爲日記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爲日記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爲K之女友所謂「萍妹」，這也是無法究明了。不過，從日記本之紙張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還夾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觀，可知主人是很寶愛他這一片段的生活記錄的。」

所記，大都綴有月日，人名都用簡寫或暗記，字蹟有時工整有時潦草，並無塗抹之處，惟有三數實行間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處，墨痕溶化，若爲淚水所漬，點點斑駁，文義遂不能聯貫，然大意尙可推求，現在移寫，悉仍其舊。

嗚呼，塵海茫茫，狐鬼滿路，青年男女爲環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

記 茅 盾

七

然大都默然飲恨，無可伸訴。我現在斗胆披露這一束不知誰氏的日記，無非想借此告訴關心青年幸福的社會人士，今天的青年們在生活壓迫與知識飢荒之外，還有如此這般的難言之痛，請大家多加注意吧了……」

「腐蝕」的內容，可以說是茅盾整個的心情流露與對重慶不滿的呼聲！我默默地讀着「腐蝕」，我懷念着茅盾！

記郁達夫

王易庵

「萬劫艱難病廢身，姓名雖在已非真，
多慚鮑叔能憐我，只怕灌夫要罵人。」

泥馬縱驕總少骨，坑灰未冷待揚塵，

國門呂覽應傳世，何必臣雄再劇秦。」

上面的一首詩，是郁達夫先生在民國廿四年冬天作成了抄給幽默大師林語堂看的，詩前有題云：「歲暮窮極，有某府憐其貧，屬其撰文，因步鈞台題壁原韻以作答。」實際上，這首詩簡直可以說是郁達夫先生個人人格的寫照，我們只要一讀這首詩，眼前便恍忽有一個傲骨嶙峋，耿介拔俗而又駢弛不羈的詩人湧現出來，他是率真的，不諧世俗的，旁人批評他浪漫頹廢，其實根本是對他没有認識，不明白他的胸襟。形成他這種與常人殊異的性格的，一半是所謂「江左風流」的才子氣，另外一半則是一肚皮不合事宜，這纔借酒澆愁，狂歌當哭，學那劉伶縱飲，庾信疏狂。

倘若把古來的文人和郁達夫先生相比，我以為最像不過的，莫過於那對人有青白兩種眼色的阮籍了。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嗜酒能嘯，當其得意，忽忘形骸，這些都和郁達夫先生相像，而尤其相像的，是阮籍在魏晉之際，屢次出而從政，而他却不與聞世事，酣飲爲常，郁達夫先生在民國廿四五年間，也會到福建去做官，而他也是縱情詩酒，很少與聞政事。前有阮步兵，後有郁達夫，這兩人的生

涯竟如此其相像，足可稱爲文苑傳中的佳話了。

我認識郁達夫先生是在民國廿四年間，那時他正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卜居杭州，大約隔一月或半月光景到上海來一趟，看看親友，送送稿子，拿拿稿費，算算版稅，待到一切任務完畢，便回到杭州，向他的小家庭中一溜，左顧孺人，右撫釋子，寄閒情於山水，吟吟自己「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的詩句，倒也頗覺悠然自得其樂。當時他的作品，以交給北新書局出版的居多數，尤其是一「達夫全集」，最受青年讀者的歡迎，所以他每次到上海來，總要到北新書局去，我認識他，也就是在北新書局編輯所裏，初看見他時，我幾乎不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受許多青年崇拜的郁達夫先生，因爲他的外表上，毫沒有一些新文藝作家的樣子，他不穿西裝革履，却穿着中裝長衫，腳下也是白襪，直貢呢鞋，乍看上去竟像是個舊式商人的模樣。瘦瘦的身材，個子並不高，面部的特點是：額角很寬，鼻大而平，眼睛很小，嘴唇很薄，兩耳有些招風，這一切都是很容易使人記憶的。不過雖然認識了他，卻沒有和他交談的機會。後來又在魯迅先生的追悼會上遇見過他一次，那時他正預備到東京去，從福建到上海時恰巧逢上了魯迅先生的追悼會，在許多追悼的人羣中，他當然不會注意到旁邊有一個我，何況我和他本來並不熟識呢？自從見過這第二面以後，便從此地北天南，再無相見的機緣了。

說到郁達夫先生的文學生涯，那應該遠溯到二十年以前，那時他和郭沫若，張資平，王獨清，成仿吾等一班人，都是屬於留東學生，因爲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兼之各人對文藝都具有濃厚的興趣，便雖所學的不是文科，也都在課餘寫一些文藝作品寄到國內來，在國內著名的報章雜誌上發表。當時的幾種著名的刊物，如「學燈」，「覺悟」，「東方雜誌」，「學藝」，「太平洋」，「少年中國」等，都常登載他的作品，但他的正式成名，却是創造社這文學團體成立以後的事。

創造社是中國新文壇上具有不滅功勳而又最爲青年崇拜的文學團體，這團體的發起人中，郁達夫也是一個，在前期的創造社中，他可說是始終努力支持的一人，創造社的幾個發起人中，郭沫若與王獨清以詩著，成仿吾以批評鳴，而郁達夫與張資平則以小說稱。他所寫的小說，大都是以青年的性愛心理爲題材，很有許多大膽描摹的地方，如「沉淪」，「銀灰色的死」，「茫茫夜」等，都大膽地把青年人的性的苦悶的情緒揭發了出來，而他的得名及受青年人的歡迎也就在此。因爲五四以後，青年剛從舊禮教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但社會却還是個守舊的社會，青年人所如輒阻，滿腔苦悶無從發洩，郁達夫的作品恰好出來作了他們的代言人，自然深投他們的所好了。同時也正因此，他便被社會上的一批以衛道者自居的正人君子之流所嫉視，加他以浪漫派作家或頹廢派作家的頭銜，而他也坦然居之而不疑，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是都帶有些革命精神的，做舊禮教制度的叛逆，這在他們是視爲非常光榮的事。

創造社最初和泰東書局合作，出有創造季刊創造週報等刊物，和創造社叢書，創造社叢書中，郁達夫的作品也佔有兩種：一是「沉淪」；一是「蕩蘿行」。後來因爲泰東書局的老板趙南公對待作家太苛刻，版稅總不肯照算，創造社各作家一怒之下，便相率脫離了泰東，自己創立創造社出版部，除出版創造月刊，刊印新書外，並把泰東所出各書的版權收回來重印。但這時正是北伐時期的前夜，大家都有另外的職務在身，郁達夫也膺了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前去教書，對創造社的事務無暇兼顧，便都交給創造社的一位小夥計周全去辦理。誰知周全却趁着創造社各重要人物都不在上海，在社內從中舞弊，大肆中飽，創造社各理事也微有所聞，苦於誰都分身不開，恰好郁達夫交卸了中山大學教務，便託他到上海來查賬。郁達夫。剛到上海，那周全平却挾着創造社內的一筆鉅款，逃之夭夭了。

這在創造社本身當然是一重莫大的打擊，幸而創造社在青年羣中已經植下了良好的信譽，稍事整頓，一切便都又踏上了正軌。不料創造社的內部一切才踏上正軌，郁達夫却反而以脫離創造社開了。

郁達夫的脫離創造社，決不是無因的，這正是他尊重思想自由不願意使一個純正的文學團體受政治束縛的嚴正表示。原來這時創造社的幾個重要人物已都在政治活動上宣告失敗，鐵羽歸來，百無聊賴之餘，便想利用創造社在青年羣中的信譽，使牠成爲政治的附庸，來宣傳帶有某種色彩的文學。這在郁達夫當然是極不贊成的，無奈衆議僉同，他一人勢孤力弱，爭論無效，便只好毅然決然的登報聲明脫離創造社。

郁達夫脫離了創造社以後，索性我行我素，寫他自己所要寫的文章，一方面縱情詩酒，倒反覺得脫然無累。這時恰好「語絲」不容於奉張，由北京遷移到南方出版，魯迅也由廈門到上海來主持輯務，「語絲」的發行者北新書局也在上海建立了發行所，郁達夫便和魯迅合作，重新來創造他的文學生命，他過去所發表的作品，本來已經輯成了「達夫全集」，第一集「寒灰集」且已由創造社出版部出版，這時也收回來，改交北新書局去發行，過了些時，甚至和魯迅合編起「奔流月刊」來，儘管改絃後的創造社對他大肆攻擊，他也只是置諸不理。

脫離創造社後的郁達夫，他的作品，仍不脫過去浪漫頹廢的色彩，如「迷羊」，「感傷的行旅」，「她是一個弱女子」等，都與他前期所發表的作品沒有多大區別。但時代的進展，却使得他的作品漸漸在青年羣中落伍了。郁達夫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他的浪漫主義的作風業已過時，索性擱筆不再寫小說，一面携家卜居杭州，一方面到處游山玩水，把沿途所見的風景筆之於書，然後整理出來發表，這就是後來交現代書局出版的「屐痕處處」。

到了民國廿四年間，他從前留日時的一位舊同學陳公俠，做了福建省政府主席，慕他的文名，便禮聘他前去，擔任福建省政府參議。郁達夫在政治上本來並沒有什麼立場，這時他正苦於文字生涯的不可爲，作品既發表得不多，版稅收入也日趨微薄，不足以贍養妻孥，便也樂得應聘，借鶴俸所入，來過他縱情詩酒的放誕生活。

不過他的官運，也只交了兩年多光景，廿五年冬天，他參與了魯迅的追悼會以後，便東渡扶桑，事變起後，他更在國內隨處漂游，行蹤無定，其間曾有一時，在湖南漢壽他的朋友易君左家裏住了好久，易君左便是龍陽才子易實甫的兒子，原名易家鉞，以「閒話揚州」一書闖禍得名，性格和郁達夫相髣髴，也有些文人積習，詩酒風流。所以兩人在一起頗爲相得。後來胡文虎在新加坡創辦星洲日報，想請國內一位有名的文學家去擔任副刊編務，但大都嫌路遠，憚於跋涉，雖然報酬很豐，也都不肯前去，惟有郁達夫却是閒散之身，在國內正苦無事可幹，便自告奮勇，去担任副刊編務。這一去國，在他不過是勉可維持生活，並不能算是得其所哉，而他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本來已告破裂的感情，終於無法再維持下去，不得不宣告仳離了，這無疑地是郁達夫的生命史上最痛苦的一件事。

關於郁達夫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仳離的始末，已有許多報章登載過，就是他自己也有「毀家詩紀」以記其事，這裏本來可以用不着再多說什麼，不過關於他們從結合到仳離的經過，却很少有人能原原本本的說出，所以覺得有從頭至尾重新加以記述一番的必要。從前陸放翁寄恨釵頭鳳，曾傳爲文苑傳中的佳話，但在他本人却是傷心得很的，現在郁達夫的毀家，其遭際經過雖與陸放翁不同，而他的傷心却也正不下於陸，何千古詩人的不幸，竟如出一轍耶！

關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結合，很有許多人說是出於王映霞的毛遂自薦，並未經過任何人的介紹，

王因爲慕郁的文名，所以自動前來，向郁表示願意委身相事，所以大家都很羨慕郁達夫的儼來豔福。但據郁達夫詩中所述：「猶記當年禮聘動，十千沽酒聖湖濱，頻燒絳蠟遲宵柝，細煮龍涎澆宿熏。」則他們的結合似乎又曾經過禮聘的手續，到底他們結合的真相如何，因爲手頭恰巧沒有郁達夫所著的「日記九種」，只好暫時存疑。不過有一點可以相信的，是他們的結合由於自由戀愛，並未經過家庭的同意，郁氏原是有婦之夫，且已生兒育女，王女士那時則是一個小城市中的小學教師，郁氏因爲對他的前妻不大滿意，還會和他的老母翻臉，憤然離開他富陽原籍，而王女士則是麗質天生，以豔冶著稱的。

郁達夫和王映霞結合以後，雙方情好甚篤，難得有兩個月以上的別離。後來都因爲厭惡上海的煩囂，便携家卜居杭州。他搬到杭州去住，魯迅很不贊成，曾有一詩阻之云：

「錢王登還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魯迅所以要阻郁達夫移家杭州，是因爲他早已嘗試過浙江黨政諸公的辣手，他的作品在浙江各地遭受無理壓迫，禁止發賣，甚至稱他爲「墮落文人」，所以他知道郁達夫到杭州去住決不會有良好結果，這纔阻止他不要輕蹈虎口，郁達夫不聽他的忠告，反去和浙江的官僚接近，引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爲知己良友，結果是被他的這位良友把他的夫人都姦佔了去，弄成了伶仃一身，豈不可歎！郁達夫初到杭州，是分租人家一椽寄居的，後來却有人慕他的文名，自願送他一方地基，他便在這塊地基上鳩工庀材，建築起一幢平屋來，這平屋中却又造了一間唯一的小樓，以供登眺湖光山色之用。雖說地基是人家送給他的，但他建築這幢平屋的費用却花去七千元之多，這倒並不是泥水匠和木

匠敲他的竹槓，原來他這幢平屋外表建得很平常而又簡陋，內部却美輪美奐，建築得非常精緻，這也是他的聰明處，目的是爲了可以防止外人的覬覦，誰知外人覬覦他的，竟是別有所在呢。

新屋完成以後，郁達夫自己給牠題上了「風雨茅廬」四字，從此他便和他的夫人隱居在新屋裏面，嘯傲烟霞，悠然自得，並且常常請他的親友們來他的新屋中便飯，吃他夫人自己做的菜。但他本是個文人，不事生產，不善居積，這一場造屋費用，幾乎把他在福建做小官的宦囊所入，爲之一空，生計所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到福建去過一行作吏的生涯，而他的愛妻留在杭州，託他的知友浙江教育廳長許紹棣代爲照料。不料許竟趁郁達夫不在，在王映霞的面前獻起殷勤來。王映霞自從嫁了郁達夫以後，跟着他出入交際，親眼看見做官的人聲勢煊赫，起居豪華，早已引動了她的虛榮心，暗中豔羨不置，而不滿意於郁達夫的清貧，現在見有一位現任官吏而又年富力壯的許紹棣向她獻殷勤，怎能不芳心暗許，不過因爲許妻尚在，雙方畢竟有所顧忌，不敢明目張胆的肆無忌憚。事有湊巧，到了廿六年秋天，許妻因病逝世，事變恰巧爆發，郁達夫那時恰好到上海去晤郭沫若，海道被阻，陸行又多危險；一時不能返杭，許紹棣便趁此機會，和王映霞發生了關係，當時許爲了要堅王的信心，還把港幣三十七萬餘元的一扣存摺交王代爲保存，後來因爲要換購美金方始取去。郁達夫那時還被瞞在鼓裏，毫不知道，好容易吃盡千辛萬苦，由閩返杭，令映霞到富陽原籍親戚家去寄居，居不到兩月，王竟託詞生活太苦，跟着許紹棣到金華麗水去同居了。郁達夫因爲職務關係，只好仍返福州，雖屢次電促王到福建，王却始終不理。後來郁因外間傳說王有行跡不檢之處，又見王許二人過於親密，心頭不能無疑，便促王和他同往武漢，誰知王到了武漢以後，對許仍是藕斷絲牽，幾乎天天有信去麗水，促許赴漢，到了廿七年夏天，王竟席捲所有，匿居不見，郁沒奈何，便在漢口各報上登了警告逃妻王映霞啓

事，這啓事登出後，引起了全國的注意，郁氏的朋友都很代他抱不平，而在許紹棣一方面，因為他是現任官吏，如此有失官方，恐怕難免要遭彈劾，連忙挽人出來調解，情願使王映霞重歸郁達夫，不過要都在報端登一則道歉啓事，以顧全雙方顏面。郁達夫因為愛妻重得，便也不咎既往，應允登道歉廣告，並且在廣告中自承神經失常，侮辱王映霞。郁如此對王，也真可說是委曲求全之至了。

此後郁達夫去漢壽，去福州，及應胡文虎之聘赴南洋，王映霞無不跟隨前往。無如夫妻間感情上的裂痕已深，縱使換了個地方，也無法挽回過來，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到了廿九年三月間，終於爆發而不可收拾。郁達夫先在香港星島日報上刊登和王映霞離異的啓事，接着王映霞也在香港大公報和上海申報上登出痛詆郁達夫的廣告，裏面竟說：

「郁達夫近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在星洲無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兒子三人，統歸郁君教養，此後生活行動，各不干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親友，恕不一一。」

綜觀郁達夫和王映霞離異的經過，我們覺得郁並沒有對不起王，王却實在很對不起郁；而且王在離婚後還要痛詆郁，其行徑更令人齒冷。平心而論，郁氏近年來的思想行動，並不怎樣浪漫腐化，倒是王映霞的行徑，却頗多令人可議之處。「己不正，焉能正人？」對於王詆郁的廣告，我們只有作如是觀。不過中國女子，大多意志薄弱，虛榮慾旺盛，而又好逸惡勞，這些都是可乘的弱點。一個文人，置身在這商業化官僚化的社會裏，無財無勢，要想獲得女子的芳心，像舊小說上所說的才子佳人，偕老白頭，恐怕是永遠無望的了。

現在新加坡已告陷落，郁氏的音訊却至今無人知道，大約總不至於有性命之憂罷？遙望雨天，我們唯有默祝這位才氣縱橫的詩人無恙。

記田漢

王易庵

清瘦的臉蛋，凸出的顴骨，頭髮亂蓬蓬的，時常低着頭，帶着沉思的模樣，兩顆眸子炯炯有光，彷彿要射進你的心坎，說起話來若斷若續，一面想，一面說，帶一些重複；如果你引動了他的話頭，他就會滔滔不絕的和你談論。這就是中國話劇界的開國元勳，表字壽昌的田漢。

我認識田漢，還遠在民國十七年南國社在上海公演時代：會見的地方是戲院的後台，同訪的人還有兩三個愛好戲劇的青年，那時他正很忙碌的在後台指揮着，矯正演員的服裝，姿勢，表情，還要照顧燈光，道具，佈景，所以不能和我們多談，但就從他那簡短的談話裏，也已充分顯示了他的熱情，坦白，誠懇，和他獻身於話劇事業的精神。我想，南國劇社的社員以及各劇團的話劇從業員，都那樣擁護他，甚至稱他爲田老大而不名，決不是無因的吧。

田漢在文壇上的歷史，已經很悠久了，五四運動時代，他就已是文壇上很活躍的一人，和沈雁冰，郁達夫，郭鼎堂等齊名。當時他是兩個團體的會員：一個是少年中國學會；還有一個是創造社。「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社員除田漢外，還有王光祈，左舜生，會琦，易家鉞等，後來都成爲國家主義派，但也有左翼文化運動的健將惲代英，鄭伯奇等，出版的刊物有少年中國月刊，田漢的處女劇作「瓊瑤璘與薔薇」，就發表在這上面，這刊物創刊於民國八年，還出兩卷，即告停刊，停刊的原因是由於社員思想的分化，左右兩派各不相容，民國十年在南京開會討論主義問題時爭持得非常激烈，當時到會的人各持一說，有的主張要主義，有的主張

不要主義，結果是不但把刊物停辦，甚至連整個團體也因這個紛爭而無形的解散了。

田漢同時又是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創造季刊第一二期中，曾載有他的獨幕劇「咖啡店的一夜」和「午飯之前」，可是到創造季刊出到第四期時，他却因為和成仿吾發生了意見而退出了。他加入創造社時，還是在東京留學的時期，那時他的情人後來成爲他夫人的易漱瑜也在東京女高師讀書，田漢早晚總要挾着一本英文本的易卜生所著的娜拉，跑到易女士的宿舍裏來，教她讀英文，兩人情好甚篤。當時女作家白薇也在東京女高師讀書，不過她所學的是理科，整天只知道埋頭從事於爬蟲走獸等的實驗，對於文學還是一個門外漢，雖然她的性情已經比較喜歡接近文藝，却苦於沒有一個人給她作理論上的指導。由於易漱瑜的介紹，白薇於是也就認識了田漢，田漢給了她許多文學書籍看，其中尤以易卜生的劇本居多，因爲在新文學運動初期，易卜生的問題劇是風行一時的，這就使白薇女士的興趣逐漸轉向到文藝方面來，對田漢也非常接近，常常到田漢的宿舍裏去玩，或者一道到公園去散步，不過每次出外的時候，田漢總要喊易漱瑜在一起，藉以避嫌，因爲那時田漢非常醉心於易女士，對白薇就不免有些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白薇也知道田漢不會愛她，所以在她給田漢的信裏，總是稱田漢做「老師」或者「先生」。

不久，田漢就和易漱瑜結了婚，一同返國，出版南國半月刊，宣稱要在沉悶的中國新文壇鼓動一種清新芳烈的藝術氣，並且慕英國大詩人威廉·勃萊克的所爲，不願意把雜誌託給書商，就決定自己出錢印刷，自己校對，自己摺疊，自己發行，這刊物除了發表他自己的創作劇本「獲虎之夜」，和他的妻易漱瑜的作品外，並錄登他和他的朋友郁達夫，宗白華，郭鼎堂的通信，就是後來收入「三葉集」裏的，從第二期起又附刊南國新聞，注重戲劇，電影，以及出版物的批評。這樣繁重的工作，僅由

他和他的妻兩人艱苦支撐，終不免要弄得心力交瘁，易女士身體較弱，終於累得病倒了，而南國半月刊也就宣告壽終。

到了民國十二年，易女士的病勢愈來愈重，田漢不得已，只好送她到湖南長沙原籍去養病，誰知回到湖南不滿三月，易女士就玉殞香銷。田漢驟失愛妻，奉情神傷，心裏悲哀到了極點，便終日借酒澆愁，沉溺在麴蘖中間，後來接受了故鄉一部份朋友的勸解，才到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去教國文，藉資排遣，當時和他在一起同事的教員有趙景深，汪馥泉，王魯彥，葉鼎洛等，並且還同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瀟湘綠波，但不久他便又棄之他去，和葉鼎洛一同回到了上海。

這時就是田漢開始致力於中國的話劇運動的時代了。他在這時期創作劇本方面的收穫，有所謂「三黃史劇」，三黃者，即黃花崗，黃鶴樓，黃歇浦是也。黃花崗是寫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的歷史劇，當時他的老友會琦左舜生等正在辦醒獅週報，田漢便在那裏面附出了個南國特刊，黃花崗的第一幕就發表在醒獅週報的南國特刊上，但劇本還未登完，醒獅本身的國家主義派傾向已經表顯於世，南國特刊也不得不因此戛然中止出版了。

民國十四年間，上海的藝術大學是知名於世的，田漢因黎錦暉之邀，而主持上海藝術大學的文科，常常在校中的禮堂舉行文藝談話會，參加者有畫家徐悲鴻，詩人徐志摩，郁達夫，戲劇家歐陽予倩，余上沅，朱璣丞，王泊生夫婦，以及舊劇界有新思想的麒麟童，高百歲等。並且開了一禮拜的藝術魚龍會，演過父歸，未完成之傑作，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畫家與其妹妹，蘇州夜話，名優之死等七個劇本，這七個劇本，除了前面兩個是翻譯外，後面五個都是田漢的創作。

藝術大學結束以後，田漢又再接再厲的創辦南國藝術學院，自己主持文學系，而聘徐悲鴻擔任西

畫，歐陽予倩擔任戲劇，辦事人則全由藝術大學跟來的學生充任，其中以陳凝秋，陳明中，陳征鴻，及唐叔明女士等最爲出力。除了在校內設立人體畫室，實驗小劇場以外，並出版南國月刊，以及組織旅行團，赴杭公演。直到民國十七年夏天，南國藝術學院以種種原因停頓，而學生却仍相依不去，而且當時的環境比較適宜於做戲劇運動，於是田漢便正式成立南國社，分爲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五部，明定宗旨爲「團結能與時代共痛癢之有爲的青年，作藝術上之革命運動。」南國社雖是這樣一個範圍廣大的藝術團體，但因只有戲劇運動比較爲社會所注目，所以社會上也只知道南國社是一個戲劇團體，而不及其他。

南國社在成立的初期，處境是很困難的，洪深在「南國社與田漢先生」一文中說：

「我們有五重困難，我們缺乏了五樣要緊的東西：一，沒有劇本；二，沒有演員；三，沒有金錢；四，沒有劇場；五，沒有觀眾。幸而田漢是個跌不怕，打不怕，罵不怕，窮不怕的硬漢。沒有劇本麼？他自己來創作，自己來翻譯，沒有演員麼？尋幾個同志，組織一個南國社，刻苦的練習起來。沒有金錢麼？索性不希望國家的津貼，有錢人的資助，自己負了債來窮幹。沒有劇場麼？先尋一個小劇場，或者借人家的劇場。觀眾不來麼？我們自己走到觀眾那裏去，拿出些東西給他們看看，再對他們說，還有比這個更好的東西藏在家裏呢，慢慢的引起觀眾走入我們的門裏來。那爬樓梯跌了一交，躺在地上哭的人，是沒有出息的，那熬着痛，硬着頭皮，勉強笑着，立起身來再爬的人，總有一天會爬到頂上的。」

從洪深的話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南國社當初締造的艱難，以及田漢不畏艱苦努力奮鬥的一班了。至於南國社的戲劇運動所代表的傾向，則也受了時代的影響，漸漸的脫離了個人主義的，浪漫

的，頹廢的歧途，而轉變到民衆的，寫實的方面去，田漢在「公演之前」一文裏說：「在現在而言戲劇，何待說是應該替民衆喊叫的，……南國社的社員們，……願意始終站在被壓迫的民衆的地位喊叫，這是無疑的。因爲他們始終是受着壓迫的。他們的生活就是一種「慘苦的重擔」。在這重擔下，以藝術的傾向結合起來，自然不會把藝術來消閒，來歌舞昇平的。他們將使他成爲一種運動，以促進新時代的實現，他們將和歐戰中的兵士似的在砲力的壓迫之下一步一步地進軍。……這些劇本裏面許仍有替我自己喊叫的地方罷，但替自己喊叫也並不壞，深的自己喊叫，就達到「世界苦」的源頭。這些劇本裏面的詞兒，許有些人以爲太深了些罷，動作許以爲太不中國式了罷，但真的民衆戲劇，並不是戲劇之凡俗化的意義，新的戲劇得爲新時代的民衆製造的語言，與新的生活方式……」

南國社的公演可以分爲兩期：第一期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的第一次上海公演，以及民國十八年一月的南京公演；演出的劇目有古潭裏的聲音，蘇州夜話，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劇，名優之死，顫慄等，差不多全是田漢個人的創作。第二期是民國十八年七月的南京公演，以及同年八月的上海公演，演出的劇目有古潭裏的聲音，南歸，第五號病室，火之跳舞，孫中山之死，以及翻譯劇莎樂美，強盜等。後來又在無錫作了一次公演，除了前面幾個很熱的戲外，並加入了田漢的一個新作一致。這前後兩期的公演，使得京滬道上充滿了戲劇空氣，而南國社也就更爲社會所注目，更受愛好話劇的青年的歡迎。

南國社所造就的人材是不在少數的，唐槐秋，孫師毅，陳癡秋，左明，顧夢鶴，萬籟天，金篋等，許多後來話劇界電影界著名的人物，在初期的戲劇運動裏，差不多都是和田漢同甘苦的老同志。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演莎樂美成名的俞姍女士，她的容貌既美，表現又生動，博得外界極大的好

評，因此有人造了個謠言，說是田漢在追求她，這謠言的起來也不是無因的，因為田漢那時正是個喪了妻室的單身漢，而他以南國社社長的地位，和演員自然比較接近，於是一般喜歡無事生非的人便騰造起謠言來了，這對於田漢雖然沒有什麼損失，在俞女士却因為人言可畏，不得已退出了南國社。一般人對於俞姍的批評，彷彿是戲劇界裏的一顆彗星，有「其來何遲其去何速」之感，事實上俞姍的退出話劇界也實在是可惜的，因為隔了不久話劇就和電影拂起手來，當初南國社的人物，莫不在電影界裏嶄露頭角，俞姍若在，是不難和胡蝶阮玲玉爭一日之長的。

民國十九年的上海，是左翼文壇得勢的時期，南國社當然不免要和左翼發生關係，所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時期，田漢也被選為執委，他並在南國月刊二卷一期內寫了一篇「我們的自己批判」，洋洋十餘萬言，一本刊物內只登了他這一篇文章，可說開雜誌界的新紀元。接着他又和藝術劇社等戲劇團體作聯合公演，演出許多含有宣傳性質的劇本，轟轟烈烈的，着實熱鬧過一時，可是畢竟因為鬧得太厲害了，引起了壓力，結果藝術劇社被封，南國社社員也避禍星散，只剩下田漢一個人，號召不起來，此後他就轉入了蟄伏時期，一方面埋頭寫他的劇本，一方面開始作進入電影界的準備。

從此南國社就成為歷史上的名詞，而田漢也就成為劇影雙棲的人物了。他在這一時期，除了寫過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亂鐘，梅雨，戰友，一九三二年月光曲等適合時代背景的戲劇外，還曾以陳瑜的筆名，寫了不少具有新的思想意識的電影劇本，如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把死氣沉沉的中國電影界，引出了神怪武俠的歧途，開闢了一條嶄新的路徑，此後以新的思想意識為題材的影片不斷的出現，同時影壇上也出現了不少新人，這差不多都是出於田漢的功勞。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電影皇帝金釵，當他在南國社公演時代，還是個不重要的角色，僅在莎樂美裏

飾敘利亞少年一角，在電影界裏更是毫無地位，不過是一個做做活動背景的名無名小卒，一個月拿十多元錢，生活非常清苦。可是田漢却巨眼識人，早已看出他是會有前途的，常常的周濟他。周濟窮朋友固然是田漢的一種慷慨的本性，不過他對金箴却是另眼相看的。果然不出他的預料，金箴進了聯華公司以後，接連主演了幾部新的題材的影片，聲譽鵲起，光芒萬丈，在男明星中獲得了最崇高的電影皇帝的地位，所以金箴對田漢的知遇之感，是不消說的。

三個摩登女性和母性之光的出演，使中國電影界的風氣爲之一變，田漢在電影編劇界裏固然成爲一時領袖人物，但同時却也引起當局的注意，認爲電影是一種民衆教育的工具，不能聽憑田漢他們散播左翼思想的種子，於是田漢便在民國廿二年冬間繼了玲之後而被捕解京了。他在南京所受的待遇，也和丁玲一樣，起初是監禁在獄中，頗受優待，後來釋放了出來，却隱示羈縻，不許他離開南京。田漢很覺苦悶，便又借酒澆愁，終日杯不離手。當局對他却也另眼相看，甚至把他的母妻都接入京中，令他團聚，田漢的愁思纔爲之稍殺，索性過起放縱不羈的頹廢生活來，開琴鸞會，捧秦淮歌女王熙春，一面又和京中的戲劇文藝界往來，籌備公演，一時南京的藝術空氣非常濃厚。在此時期，他除了把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改編爲舞台劇外，又寫了個新劇本「回春之曲」。

回春之曲最初是在上海上演的，由金箴王人美夫婦主演，成績很好。田漢當時正和洪深在南京籌辦舞台協會，也預備上演回春之曲等幾個劇本，便函邀金箴王人美夫婦到南京去參加演出，在田漢之意，以爲以他過去和金箴在南國社時代的關係，金箴是決不會不答應的，所以抱着有把握的希望。誰知金箴却回了他一封信，託故不能到南京去，這真出於田漢的意料之外，田漢很是氣憤，因此就與金箴不通音問，可是金箴却還不知道田漢在生他的氣。後來田漢和馬彥祥所主持的中國戲劇學會在南京

公演時，金餒也恰好到南京去打獵，便中特地到世界戲院的後台去拜望田漢，田漢見金餒到來，起初是視若無睹，並不招呼，直到金餒向他躬身問好時，他才遲遲的問金餒來此何幹？接着在感情衝動下，很不客氣的對金餒說了不少冷嘲熱諷的話。金餒被他數說得面紅耳赤，啼笑皆非，不過他是個有城府的人，當時對田漢還是唯唯聽命，從此他兩人的交誼就告中斷了。

戰事起後，田漢往來京滬兩地，主持戲劇宣傳，非常努力，後來又回到長沙原籍，主編一張小型的日報。現在有人說他在貴陽，又有人說他在重慶，衆說紛紜，倒有些莫衷一是呢。

記 洪 深

王易庵

大家都知道洪深是大名鼎鼎的留美戲劇家，大家又都在不久以前津津有味的談着洪深的自殺，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洪深的歷史，一般人對於洪深的概念，大抵只是一個身材魁梧的胖子，有着過人的精力，能在一年內完成十來個電影劇本，如此而已。

洪深是江蘇武進人，提起他的父親來，倒也大大的有名，不過這名不是留芳，而是遺臭的，原來他的父親就是刺宋教仁案的主犯洪述祖，以一位刺殺革命偉人的兇手，竟會生出這樣一位好兒子來，使人對遺傳優生一類的學說，不能不表示懷疑，但在洪深一方面，却可以說是善於幹父之蠱的了。

洪深出國的時期很早，他在清華理學院畢業後，就放洋赴美了。當時留美學生以學實科的居多，一般人的心理，總以為中國將來需要建設，一定少不了技術和實用工業方面的人才，所以洪深初跑到美國，進美國哈佛大學時，也是學工業的。後來據說是受了一種很大的刺激，就不管當時的人們如何的輕視戲劇，毅然決然的放棄了工業的學習，改投在美國的大戲劇家拜克的門下了。這事使他家鄉一部份守舊的長輩頗為不滿，甚至譏他為沒出息。誰知後來連年內戰，當初留美學實科的人回國後都英雄無用武之地，反而讓學戲劇的洪深出足了風頭，這也可說是意想不到的事呢。

不過洪深初上文壇，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雖是個留美戲劇家，而且在哈佛大學得了碩士的頭銜，但在崇拜偶像主義的文壇上，沒有造成相當的名望以前，要發表文章也並非易事。當時文化界的權

威刊物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東方雜誌」，許多文人學者都在上面發表作品，洪深見獵心喜，也投了一篇稿子去，誰知結果竟被原封不動的退了回來，大概編者因為他的姓名不見經傳，還當他是什麼無名小卒吧，可是洪深却並不灰心，又再接再厲的寫了個電影劇本「申屠氏」寄去，這一篇稿子寄出以後，索性好像石沉大海，大約是被幽禁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裏受無期徒刑了。直到後來洪深組織了戲劇協社，屢次舉行公演，又常常和當時的名流學者往來，名氣漸漸的大了起來，「東方雜誌」的編者才從舊稿堆中把他這部作品檢出來發表，可是這種錦上添花的舉動，對於出了名的洪深，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

現在的四十歲左右的人，在新舊過渡時代裏，都是深受過婚姻不自由的苦痛的，洪深也是這中間的一個。他先後會結過兩次婚，前妻死後又續絃，但這兩次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定的，並不是他自己選擇的對象，所以都不能使他滿意。他現在的太太名叫常清貞，是一個大家閨女，生長在官宦人家，從小就在父母的鍾愛中長成，過慣了千金小姐的生活，對於官場裏的壞習氣，也無形的吸收了不少。女子多數是物質主義的崇拜者，尤其是虛榮兩個字，更是一般女性的通病，古來雖然有許多佳人愛上了才子，甘心同受困苦，然而這僅是小說故事中的情節而已，事實上是很少有的，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裏，一般女性所希望的是有錢有勢，生活享受舒適，住洋房，坐汽車。洪深的太太也就是這樣一種人，什麼吟風弄月，夫唱婦隨，一切文人學士所目為精神上崇高的情味，老實說，她是毫不感覺興趣的。據說洪深的太太有一位堂房姊妹，比她早嫁一個月，丈夫任了知縣，新娘一出花轎，就被人恭維做官太太，相形之下，她嫁的是一個文人，離開做官的路程太遠，這當然不免要使她的內心感覺非常失望，甚至對洪深表示鄙夷。雖然洪深那時已經出了名，而且他的頭銜也已不少了，

歷任上海大夏大學戲劇教授，國立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華主任，復旦大學英文文學及戲曲教授，上海學技研究所所長，天津大陸銀行祕書長，在電影界裏則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導演，然而沒有用，他的太太總是看不起他。

一個女子不安甯起來，家庭當然不會快樂的，何況他們的結合，完全由於父母的支配，根本談不到什麼雙方的自由意志，兩人間既沒有好感，也根本沒有情愛，這樣的家庭當然是不會幸福的，洪深又是個脾氣爽直的人，不會鑽營，做不起官來，洋房，汽車，永遠只好付諸夢想，不能滿足他太太的願望，因此他們夫妻間永遠沒有快樂的日子。本來，像這樣的婚姻，是大可不必勉強下去的，無如他的太太又是個舊式女子，認爲離婚是不名譽的事體，絕對不肯，這就陷入了一個僵局。洪深常常緊皺着眉頭，對他的朋友說，他勞碌半生，只是爲太太做牛馬，賺到的錢都交給太太，而太太還不見他的情。語氣非常消極。看起來他去年的自殺，雖然一大半是受着經濟的壓迫，恐怕也未嘗沒有精神上的痛苦刺激着他驅使他去這樣做呢。

洪深的爲人是很熱情的，而且敢說敢做，不畏強禦，這可以從民國十九年春間大光明映羅克「不怕死」一片時他的仗義執言一事上看將出來。那時的大光明影戲院，在派克路轉角上，較現在的大光明略爲偏向東一些，規模很大，建築也很摩登，和現在的大光明一樣是上海的第一輪影戲院。有一次和四川路橋堍的光陸大戲院同時映演一張羅克主演的「不怕死」新片，在報上大舉鼓吹，賣座很盛，居然場場客滿。洪深也被報上的廣告所吸引，便乘着星期休沐之暇，前去觀光了一次。不料不看還可，一看之下，却使他義憤填膺，原來這張「不怕死」影片，却是以侮辱我們中國人爲主題，那裏面映演出來的唐人街上的華人，不是吸食鴉片，就是偷竊物件，或者販賣人口，醜態百出，彷彿中國人都

是不法的匪徒，而唐人街則是罪惡的淵藪，號稱「不怕死」的羅克，則以一種俠客的姿態出現，把這些作惡的華人一一打死。這樣一張辱華影片，只要是稍有血氣的人，看了心裏都不免要覺得不自在，何況是具有熱烈的情感的洪深，當然更加要覺得怒不可遏了。於是便在休息的時間裏，躍登臺上去，慷慨激昂的演說了一番，指出這張片子辱華的地方，慫恿大家向戲院退票，表示不願意化錢受辱。觀眾本來就已對這張片子暗暗抱着反感，這時被洪深一語提醒，立刻大家都一哄而起，爭向售票處退票。院裏的秩序登時大亂。戲院的執事人見洪深還在台上演說，也不知道他是誰，只認定他是罪魁禍首，仗着外人的勢力，跳上台去，舉拳便打，把洪深的眼鏡打碎，衣服也扯破了一大塊，洪深拚命奪出重圍，在戲院外面叫了巡捕，和動手的戲院執事同到捕房裏去。當時有一大羣熱血青年同情洪深的舉動，自動跟他到捕房裏，爲他作證，捕房裏對這一類爭執，照例是不會有什麼舉動的，不是做和事老，就是把雙方都訓斥一頓了事。可是洪深却不肯甘休，請了律師向法院控告，以刑事罪起訴動手的戲院執事，並要求把兩張「不怕死」影片的拷貝完全焚燬，還要羅克向我華人道歉，否則全中國各戲院一律拒演羅克主演的影片。這個消息傳了出去，輿論方面因爲洪深力爭國體，值得同情，都傾向在他這一方面，各報的本埠新聞欄裏幾乎把這一件案子佔據了大半篇幅，海上有名的律師自願代洪深作義務辯護的多至一二十位，各影片公司也都願意捐助巨款代充訟費。到了開審那天，旁聽席上擁擠不堪，洪深的口才本來不錯，在庭上滔滔汨汨的說個不歇，理由很是充足，所以結果戲院執事的罪名終於宣告成立，負賠償道歉之責，一般同情洪深的熱血青年，猶覺心有不甘，故意和大光明光陸兩家戲院搗亂，有的用保安剃刀片在黑暗中把坐墊的皮面割破，有的買了廣東爆竹，帶入場中燃放，有的把阿母尼亞汗酒在場內，弄得奇臭不可嚮邇，觀眾都紛紛掩鼻而走。這樣一來，戲院的營業大受影響，門

可羅雀，不得已祇好都暫停營業，等過了一時，輿情漸漸的冷落了下去，纔敢重整旗鼓。至於洪深的其他兩個要求，焚燬「不怕死」影片拷貝部份，結果雖沒有實現，但要求羅克向我華人道歉部份，却因觀眾都挾着「不怕死」案的餘憤，對於羅克「不怕死」以後主演的新片，一律拒看，一時羅克的影片在東方幾乎毫無出路，羅克深知我華人衆怒難犯，只好引咎自責，從美國寫了道歉信寄到中國來，並在紐約報紙上刊登向我國人道歉的廣告，一場巨大的風波纔告結束。洪深的名望本來已經很大，這事以後，更加聲譽鵲起，甚至有人把「洪深」和「不怕死」兩個名詞連綴在一起，稱他爲「不怕死洪深」，可是洪深却把這事看得很平凡，好像是他應做的分內事一樣，絕無驕矜之態。

在「不怕死」案發生的時候，洪深已經在教書以外，兼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導演了。其實他正式加入電影界的時期比這還要早，當國產電影還在萌芽時代，他就已經在寫電影劇本「申屠氏」，這可見他對電影事業的興趣。他加入明星影片公司是在民國十三年，那時正是一般人對電影事業感覺莫大興趣的時期，大大小小的電影公司在上海開了不下數十家，但出品多半很幼稚，甚至有開了公司而毫無出品的，在這許多家電影公司之中，要以明星影片公司爲個中之巨擘。洪深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以後，自編自導的第一部影片名叫「馮大少爺」，他還會在這部影片中親自參加演出，可是結果並不怎樣良好，他自己也承認這部初期的處女作影片是失敗了的。

洪深和田漢兩人在戲劇和電影界的功績可說是相等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若說田漢是以戲劇爲正業而以電影爲副業的，則洪深恰好和他相反，是以電影爲正業而以戲劇爲副業。誰都知道，田漢會寫了不少的戲劇，而他的電影劇本却只有不多幾個，洪深呢，他所寫的戲劇雖也有「趙閻王」，「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等好幾種，但遠不如他所寫的電影劇本那樣多。在他創作精

力最旺盛的時候，曾經在一天裏寫成了好幾部電影劇本的大綱，一年內完成十來部電影劇本。可惜他的產量雖然豐富，成就却總不能和田漢相提並論。田漢的電影劇本雖然寫得少，但却是每一部都闖動了全社會的，洪深却没有那樣的幸運，他的電影劇本雖然寫得多，却都不能闖動社會，只和普通一般影片一樣，演過就完了，不能在人們頭腦裏留下更深的痕跡，這大概和劇本的取材也有關係，田漢所抓取的對象是具有新的思想意識的進步青年，洪深抓取的對象却是尚未脫離封建意識支配的舊家庭中的人物和婦女。如若說田漢是急進的，則洪深可說是緩進的，他的思想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想，這就使得他所寫的電影劇本不能像田漢那樣的闖動一時，正如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是胡適，而成就最大的却是魯迅一樣，洪深是國產電影的開國元勳，但他的成就却總不能不遜色於田漢。

洪深不但努力於電影事業，就是對電影批評的建設也是很重視的，中國之有影評人這一名詞，恐怕是由洪深所開始，而最好的電影批評也首先出於洪深的筆下。當民國廿一二年間，上海的電影事業雖已非常發達，中外新片時有放映，影迷也已日見其多，但正式的批評電影的刊物却一張都沒有，洪深便和明星影片公司的同事姚蘇鳳在新出版的晨報上開了二張「每日電影」的副刊，很認真的做起電影批評的工作來。但他畢竟是個直腸人，不知道社會的詭譎，結果是姚蘇鳳借他作踏腳石而登龍，而他自己却反被逐出了「每日電影」，爲了要出這口惡氣，他便和另一位也是被「每日電影」逐出的影評人張常人和現代書局接洽好了，由他們主編一個「一週間」週刊，以與「每日電影」對抗，可是姚蘇鳳是有當時的上海教育局長潘公展爲他抱腰的，「一週間」僅出了六期，突然一道命令下來，竟被禁止出版了。洪深這一氣非同小可，竟氣出了一場病來，恰好青島山東大學慕他的名，聘他去當教授，他也想移地養病，於是便接受了聘書，趁海輪到青島教書去了。

洪深在青島教了兩年左右的書，那時在青島的作家有老舍，臧克家等人，常常往來，倒也不大寂寞。青島畢竟是宜於療養的所在，洪深在那邊住了兩年，不但病魔爲之退避三舍，而且身體也一天比一天強壯了，他久靜思動，又想和上海的一批老朋友會面，且因上海各影片公司如明星天一等連電促返，於是便決計辭職返滬。那時正是上海文化界的形勢極爲蓬勃，國防文學的討論更是盛極一時，洪深便和沈起予合辦了個「光明」半月刊，托生活書店代理發行，不過他實際上只是掛名，並不親理編務，所以仍舊有很多時間來爲各影片公司編寫劇本，且因煩厭惡上海囂，索性住到蘇州去靜心寫作。他在蘇州是住在平江路他妹妹家裏，他所鍾愛的一個小女兒洪鈴在他未去蘇以前早已住在那裏，有她在膝前承歡，精神上倒也相當愉快，他和他的太太本來不甚相得，所以極少寫家信，有時寫信給家裏，字數也是極少的，往往只有一行，真是奇怪極了。當時作者也住在蘇州，會去拜訪過他一次，知道他的生活極有規律，每天都是清晨起來寫作的，因爲下午太熱，晚上又有蚊子的緣故。大約每隔一個星期，到上海來一次，理理私事，和導演們談談劇本上的問題。

在民國廿五年這一年內，他總共代明星天一兩公司編成九個電影劇本，這在專任的職業編劇家恐怕還沒有這樣的寫作能力，而洪深僕僕於蘇滬道上，一方面要爲上海各報章雜誌寫稿，一方面還要擺擺私事，交際酬酢，却還有如此巨大的產量，從這一點上，也可說得他精力的過人了。他的電影劇本的代價是每個五百元，九個劇本就有四千五百元的收入，四千五百元在現在固然算不得什麼，但在生活程度很低的那時，却不能不說是一筆巨數了。可是洪深個人的經濟狀況仍舊不大好，大概他所賺得的錢都已交給他太太去支配，所以弄得他自己反而沒有錢用了，記得在中國文藝家協會開成立大會的那天，他連一元錢的茶點費都交不出來，只好問傅東華借，那時我正坐在他對面，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倒害得他面紅耳赤，很難爲情似的呢。

也許就是爲了經濟的關係，所以這年的秋天，他又離開上海，到廣州中山大學去擔任戲劇學教授了。他在中山大學擔任的是英文系四年級的必修課程「戲劇學與舞台的技術」，普通授課的地點大都是在教室裏，洪深却例外地移到了食堂裏去舉行，因爲這一科的主要節目是表演的基本動作，他嫌教室太狹小，不適宜於施展，便破天荒地移到了食堂裏，但食堂裏白天是要吃飯的，不得已又把時間改爲晚上七點至九點，每星期一三五各教一次，每次上課的時候，別級學生因爲這時沒有功課，往往也聚集在食堂裏旁聽，因爲洪深的教授法很能適合學生的心理，時常很滑稽的裝腔作勢，作種種表演，使學生們頗感興趣。同時他又在中大文學院的中文系擔任了「戲劇編寫法」的一科，選這科的學生有一百人左右，起初他叫每個學生寫一個劇本，一個劇本的字數常在四五千字以上，一百個學生的劇本全得由他批改，且須把每個學生作品的優劣點指示出來，這在時間上是頗成問題的，後來他利用了當時文壇上正很流行的集體創作的辦法，叫每五個學生合寫一個劇本，這在批改卷子方面果然省了許多，但還是常常要把他弄到天亮才得就寢。此外，廣州鄉村實驗區組織的戲劇研究會也聘請他當顧問，他也給予他們不少的助力，他在廣州的聲名之盛不亞於上海，使得當地原有的一部份戲劇作家如胡春冰等很感威脅，暗中傾軋排擠，不遺餘力，但洪深却淡然處之，不屑和他們計較。

民國廿六年夏天，洪深又從廣州回到了上海，那時七七事變已經發生，火藥氣味業已瀰漫全國，不久大戰正式爆發，戲劇電影界的一部份人物便組織演劇宣傳隊，出發各地宣傳，洪深所領導的是第二隊，這是由四十年代劇社所改組的，裏面重要人物有金山王瑩等。說起金山和王瑩來，他們和洪深之間據說還曾鬧過一場三角關係，洪深在某一時期對王瑩確有追求的意思，他所導演的「鐵板紅淚錄

」就是由王瑩主演的，甚至在王瑩面前還會透露過一些口風，不過在四十年代劇社的時候，王瑩和金山的關係已經很好，外間並說他們已經實行同居了，洪深要想拆散他們的關係當然不成功，就是想插進他們中間去也不可能。因此演劇宣傳隊第二隊出發後，洪深和金山間鬧得很厲害，大有冰炭不相容之概。他們出發的目的是沿江西上，再到隴海路一帶去活動了，到武漢以後，住在精武體育會裏，洪深這時對王瑩大概已感覺失望了罷，索性聘了個女祕書顏一煙小姐，算是對王瑩示威，一面籌備公演他的新作「飛將軍」。不久他受了政治部之聘，金山也帶了王瑩到河南去演戲，藉以避免洪深的追求，戲劇宣傳隊第二隊就這樣無形的解散了。

現在再說洪深的自殺。洪深自武漢陷落後就到重慶，並遣人把他的妻女也接了去。他在重慶任職於文化工作委員會，並兼文藝獎金保管委員會委員，但仍舊很鬱鬱不得志，有一次政治部招待文化界的大宴會上，洪深拚命的酗酒，當時他的朋友們已經都感覺他多少有些失去了常態，神經似乎受刺激很深，但還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使他感受刺激的，後來才知道是爲了他的女兒洪鈴小姐的病。

前面已經說過，洪鈴是洪深最鍾愛的女兒，偏偏她小小年紀，就已患了不治痼疾，肺病已經入了第三期，病情很是沉重，而醫藥費又昂貴得很，洪深素無積蓄，每月收入僅足勉強維持生活，那裏負担得起，爲了女兒的病，他在外面已經舉借了二千元，其間並向文藝獎金保管委員會借借一千元，但後來因一部份人頗有微詞，會中遂議決委員不得貸借，洪深身爲委員，只好首先把所借的一千元歸還，因此他的生活遂更陷入困境。爲了增加收入起見，他遂應遷到了廣東曲江坪石的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之聘，月薪三百元，並預支了六個月薪水，打算在民國三十年三月間去粵就職。在他未去粵以前，他本想多寫文稿，償還債務，但心緒異常惡劣，往往舉筆不能着一字，自殺前五六天，他曾對

他的朋友說：「我現在只好無聊的玩，吸煙，喝酒！」又說：「我簡直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洪太太常清貞女士爲了生活困難，只好把其餘的子女遠遠的寄托在香港兒童保育院，在自殺以前，她心緒的惡劣，也正不亞於洪深。

洪深自殺的日期，是民國三十年二月五日，那天清晨，他們夫婦決意自殺，洪深服多量的奎寧丸，洪太太則飲紅藥水一瓶，並留下絕命書一封，內容如下：

「一切都沒有辦法，政治，事業，家庭，衣食住種種，如此將來，不如且歸去，我也管不盡許多了！」

洪深夫婦服毒後，首先被洪鈴小姐發覺，連忙托人打電話給郭沫若，郭氏當即偕同醫生赴家賴橋三塘院洪宅探望，到了那邊，洪深夫婦已經昏迷不醒，於是便施行緊急療治，幸虧發覺時間尙早，經注射後，就把所受的毒物吐出，經過短時間的休息，就脫離了危險，不過洪深聽覺略差，大約是因爲服了過量的奎寧所致。第二天，洪深自殺的消息已經傳遍了重慶市上，文化工作委員會立即舉行會議，當場議決贈送洪深醫藥費一千元，並決定聘他爲政治部設計委員，月薪二百元左右，並擬定具體辦法，保障文化人和作家今後生活。但洪深對這一千元贈款，却口授友人寫信辭謝，全部璧還，並表示友輩捐贈，一律謝絕，自謂：「生性捐介，否則亦不致有今日。」等到身體復原，他就起程赴粵，去担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了。

有人因爲洪深謝絕餽贈，而且在他的絕命書中，首先提到政治沒有辦法，就推測他的自殺是爲了政治上的原因。這說法當然也有理由，但洪深並不是偏於一黨一派的人，他的自殺，正可象徵一般文人懷才不遇的悲哀。他有着遠大的理想，却處處碰着現實的壁，他想有所作爲，却處處都遭擯棄，像

他這樣富有熱烈的感情的人，怎能不傷時弔影，走上消極的自殺的道路上去呢？

洪深自己說：「我一生也演了不少喜劇悲劇，就是在矛盾中過活的，我也曾隨波逐流的做許多別人都做的事情，我也曾牢牢的抓住自己的主見做人家絕對不肯做的事情。」這幾句話，赤裸裸地描繪出了一個壯直漢子的性格。

關於洪深的處世態度，曾有一個朋友對他這樣說過：「你的行爲和你的歷史環境是不容分離的，你再強硬一些，你就沒有了，你再軟弱一些，你也沒有了。」這話批評得很中肯，但既不能硬，也不能軟，然則所謂洪深也者，豈不是變成牛皮糖了嗎？哈哈！

憶 曹 禺

郭 朋

在中國許多劇作家中，我最愛好曹禺的作品，過去我這麼感覺，在最近之將來，我想這樣的見地也不會變更的。

像曹禺之作品一樣，他本人永遠給予人以新鮮之印象，他是個瘦小的，架着一副墨邊眼鏡，不十分健康的人，年紀雖說也三十開外了，但仍具有青年人所特有的熱誠。他的臉上永遠掛着笑，一種青春成熟的笑，與曹禺在一起是不會感到寂寞的。

他穿着一襲藏青色染有油漬的舊大褂，佈滿微鬆的嘴角上，永遠銜着一根濡濕的烟卷，平常總是頭埋着，像在沉思着什麼。走起路來急急匆匆地，一天到晚像有什麼要事在等着他，但即使是最繁忙的工作裏，也總是滿臉堆滿笑容。他絕不肯因自己的私情而妨礙別人，他自己高興，他也要使在他週遭的人們都變得高興，在他的談吐中，是不會尋出「憂鬱」一類的字眼的。

「人生就是做戲，爲什麼不打起精神與高彩烈地過下去呢？」

這是他的話——一個十足樂天派的人，成天爲流行憂鬱病纏繞的年青人，聽到他這樣的話，也會被鼓舞起來吧！

但如果根據他這種氣質而來推測他是個渾噩而不懂事的孩子，那將犯着一種嚴重的錯誤。曹禺豐富的人生經驗，比之那些在宦海浮沉數十年的老者，亦無愧色。我們也可以說，假使曹禺不是具備這樣豐富的人生經驗，那末他決不會寫出像三部曲之類的不朽劇本，即使有，也決不會有今日的收獲。

他雖然在外表上顯出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但對世間之一切，他是用着全副精力去觀察的。對於那些愚蠢的，醜惡的，陰暗的，……他都像欣賞一幅藝術傑作似地觀察着，憑着他超絕之聰穎，他從周圍的世俗事物中去發掘他精神之寶藏，當他靜靜地低着頭凝思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一個偉大的故事是產生了，曹禺之劇中人常是在這樣狀態下產生的。

正因為他這種人生鑑賞者態度發展之結果，所以在他筆底下刻劃出來的人物，都是活生生地，決不帶有絲毫牽強。在中國，劇作家也不可謂少，但他們由於實際體驗之不夠，所以創造的人物個性也常是幻想的，虛構的，這樣的作品，某一時期也許會受到某一部份觀眾的歡迎，但多半的結果總是失敗的。曹禺之所以顯得出類拔萃，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也更可以說，曹禺的成功是客觀的人生經驗與豐富的靈感滲合的結果，假如我們從他的代表作來細細研究的話，我們都可證明這樣的評語是正確的。「日出」中陳白露一型的都市女人，以及如「原野」中帶有原始怨恨之仇虎等等人物，寫來真是再親切也沒有，在我們現在的世界，像這樣的人物是隨地可見的。也許在我們最親近的友朋間，就可發現類似的嘴臉。自然經過作者略加渲染以後，其個性便成爲典型的了。看曹禺的戲，不啻讀一部最感人的史劇，使觀眾的情緒完全融合於劇中人之喜怒哀樂中，隨時有一種親切之感。

遠在曹禺做學生時，我就看過他演的戲，那時他正在南開讀書，節的是洪深五奎橋中的一個老頭子，演來真是維妙維肖，使人拍手叫絕。但是當時一般人也祇不過知道有一個叫萬家寶會演新戲而已，誰也沒想到幾年以後，他會成爲中國劇壇上的一顆燦爛的星座。正像任何藝術家一樣，曹禺的成功也全不是倖致的，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他具有犀利的觀察力，一件平凡的事都能給他以深刻難忘的印象，日子久了，許多不同的經驗堆集起來，就成爲他用之不竭的藝術的泉源。他年青時的日子

並不很痛快，貧窮及一切不幸的遭遇時常會襲擊他，但對於各種陰暗勢力從不畏縮，他就是這樣一個能闖能打的傢伙，他會說，世界上絕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災難能使人一輩子沉淪下去，人生下來也絕不是永遠爲着受苦的，靠着他對生命堅強的信心，他終於克服一切的阻礙，他的話是對的：「我們都年青，我們永不會在黑暗勢力前低頭。」

他的學生時代是這樣打發過去的，他所攻讀的雖不是戲劇一科，在中國大學裏，直到現在，這樣專門的學系還不會有過。他因爲一心要成爲一個劇作家，所以祇要有空暇，總是躲在圖書館裏，翻閱這一門的書籍。對於理論方面的研究也從不忽略，西洋劇作家中他最愛好的是英國高滋華斯的作品。他初在南開，繼而轉學清華，在那兒由於環境優良，給予他不少工作上的便利。前輩詩人聞一多是他最愛護的師長，畢業後曾一度考官費留美，但不幸落選。要在平常人，也許早就心灰意懶，但曹禺絲毫未曾介意，他雖沒能有機會出洋，但他比那些鍍過金的博士們，也許有更多的成就。

在他的私生活中，對一切事情是不肯苟且的。這種精神自然也滲合在他的藝術中，爲要描寫一個人物的強烈個性，他會四下訪尋，以求真實。「日出」中的小東西，就是他親身去妓院體驗後動筆的。曹禺還有一個特點，在他的劇本中，對白最流暢，但並非是用華麗的詞藻堆砌而成的，他描寫一個工人或者一個小市民，或者一個流氓，每一人物都能恰合個性，講的話句也能符合身份。這一點，也許並不太難，但事實上却要費多時的磨練，方克成功。除此以外，他的每一部戲都還帶有一種濃重的情調，或者充滿地方氣息，像「原野」閻王鬼怪那段唱詞正是北方民間最流行的。

有許多批評家，認爲「日出」及「原野」之第三幕都是多餘的，對於這問題，他的答覆是他創作這場面是經過多時考慮而成的。別人所認爲不重要的枝節，而對他乃是嘔盡心血的結晶。他說如其將一

日出」第三幕刪掉，當然全劇的故事進展也許不致受任何影響，但就不免缺少一種氣息，沒有小東西之出現，也許黑三陳白露人物之輪廓，就不會有這樣鮮明，對於「原野」第三幕，他更特別珍惜，他也承認這幕幻想場面有某一部份是受了歐西前進劇作家作風的影響，但他完全重新加進一種新的靈魂，使它帶有濃厚的中國情調，沒有這便會像被閹割過後的動物，將永遠缺少生氣。

民國廿八年夏間，昆明「國防劇社」爲舉行盛大公演，特地派員專程請曹禺來滇，那時筆者因在劇團中也担任著相當職務，因此與曹禺見面之時頗多，當時擬定的戲目計有「原野」及「全民總動員」兩劇，前者由鳳子，孫毓棠及聯大優秀演員演出，陣容之強可謂開西南劇界紀錄，演員既都是知名之士，而且與曹禺私人方面都有濃重情誼，對劇本也更能了解，這次的演出不用說是絕對成功的。在「全民總動員」一戲中，曹禺本人也飾一個瘋子的腳色，比起他學生時代的演技是更進步得多了。這齣戲是重慶劇作家慶祝戲劇節的集體創作，曹禺，宋之的的都是執筆者，這齣戲連演至兩三星期之久，其熱烈情形是少見的。

曹禺不但是卓越的劇作家和優秀的演員，他同時又是全國最佳之導演。我從沒看見過一個導演有曹禺那樣謹慎，對於演員的每一小動作，他都會詳細考慮過，絕不容有絲毫變更。因此演員們都累得喘不過氣來，就是對鳳子孫毓棠等他也毫不講情，既要演戲，就得認真從事，馬馬虎虎是要不得的。要不能遵守這起碼規則，那末乾脆可以不必做，一個不成熟的戲拿來搬出去，那是比要他性命還會使他痛心的。

他担任的雖然是導演，但對佈景服裝等等也都貢獻意見，經他指點後，工作起來確是省事得多。「原野」第一幕的後台效果，五十多種秋虫鳴聲都是由他親自教授的，又如鐵道模型的仿製和佈景畫

面，也很多是由他親自動手的。他捲起衣袖，嘴角啣着烟，常是獨個兒工作到深夜，但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他愉快地幹着一切，他說一齣精彩戲的上演，是他生活中最感興奮的事。

對於不負責的工作人員，他從不惡言相責，導演中有這樣好脾氣的也真可謂鳳毛麟角，他總設法勸你改進，要是你實在不聽，他就閉口不響。每次排戲完畢，他照例要爲演員們講點有趣的故事，大家痛痛快快樂一陣，誰也不會感到寂寞的。

昆明大公演後，他就回到江津，重新擔任戲劇學校教職。這兩年間新完成的作品如「正在想」，「蛻變」，「北京人」等已相繼在上海公演過，在這幾種戲中，作者的藝術造詣是更進步了。他寫的劇本自不僅這些，祇是限於環境，不易寄滬罷了。我還記得他離昆明前，曾說過要寫一歷史劇，現在想來也該早已脫稿了。

記憶中的沈從文

郭朋

年紀很輕的時候，對於湖南人就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我還記得父親提起曾國藩的名字時，老是一壁翹起大姆指，一壁嘖嘖讚不絕口，以後我又有機會聽到湘軍這一類的字眼，湖南人的影子開始在我簡單的腦筋裏織下粗陋的輪廓，但印象似乎也祇止於此，我幼稚的心靈裏暗暗竊想湖南人該都是一批壯健能闖能混不怕死的傢伙，現在回憶起來，對於當時的想頭，是怪覺得好笑的。

等自己開始能懂得點事的當兒，湖南人這三字對我更引起濃重的興味，在一大批新文學家中，我開始知道田漢丁玲等等的名字，但對這些人也祇是感到興趣而已，我最注意的却是沈從文，我奇怪有一股什麼力量誘惑着我，使我對於他的作品有了深切的愛好。

提起沈從文，這名字想來對一般人並不顯得十分陌生，在中國新文學社發展過程中，他確實盡了不少開拓的任務，但究竟有多少人懷着我相同的心情去欣賞他的作品，這是頗值得疑問的。有不少朋友與我閒談中提起他的作品，總好像有點不屑的樣子，他們最有力的論據是嫌作者的東西過于粗俗單純，用一句明朗的話來形容，就是太鄉下味，在一般由都市裏陶冶出的人看來，那簡直有點卑不足道了。

但這點粗俗單純正是我所珍惜的，我就愛上那種無羈束質樸有人性的東西。

一個在窮鄉僻壤地方長大的孩子，在隊伍裏混過，成年無休止的流浪，他的足跡會踏上國內無數

角落，他會潦倒地爲着獲取最低限度的食糧蟄伏在陰暗的屋角裏嘔下他寶貴的心血，他當過雜誌編輯，他做過大學教授，他也在機關裏做過一名不大不小的公務員……一個在無數變幻的人生潮流中翻筋斗的人。他就是沈從文。

沈從文是湖南人，他又是行伍出身，這麼着你也許會聯想起作者是身材魁梧的粗漢，但你這想頭是完全錯誤的。他在軍隊裏混過是事實，但並非是真的扛着槍桿的大兵，他所担任的是一員小文書，實際上仍幹着筆頭上比較輕鬆些的事體。他自己也坦白承認，他與士兵間由於智識環境之差異，有着顯然的距離，但多年的共同生活，使他了解他們，他懂得這批拿生命做孤注吃糧漢的單純喜樂，他愛他們的誠實坦白，對他們不幸的遭遇他會由衷地喚起真摯之同情，是這樣他吸取了他們的氣質，滲入自己獨特的血液中，以後在他的小說裏，我們不時可以發現那些善良的臉譜，這該是作者這幾年豐富生活經驗積累而成的。

前幾年中國文壇上盛行着建立平民文學的口號，但那批提倡者也祇是隨口嚷嚷算數，平民文學之特質是什麼？它怎樣建立？喊的人大都是整天躲在咖啡座裏吃下午茶的朋友，他們自己從沒在廣大的民衆裏生活過，隔上一回連自己究竟作些什麼似乎也不知道了。在這點，沈從文是個沉默的工作者，他並不會學時髦附和着叫嚷，但實際上，在這方面他介紹了不少超越的榜樣，他這麼做祇是爲着忠實於自己，他從沒有打算將自己捲入不熟悉的都市漩渦中，用他自己的話，他是在寫他自己所知道的。

假如說中國有所謂鄉土文學這字眼的話，我認爲沈從文在這上面是個最具有成績的倡導者。說到鄉土文學，有些人也許又要將它解釋作鄉下氣了，所謂鄉下氣，他們的意思也許是指它庸俗，平凡，這自然是種偏見。鄉土文學與都市文學是同樣有其客觀存在價值的。在歐西各國，像屠格涅夫，狄根

斯等人的作品都充滿着濃烈的鄉土氣息，悲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的美麗旋律是吸取鄉村的柔和情調而成的。像李斯特，休伯特等人的歌曲也多半是從多年鄉村生活的體驗中蛻化而來的。一篇好的小說像一首抒情的曲子同樣是由於它獨特風土情趣支持成的，沈從文的作品就是這樣一個上好的例子。他的散文或是小說中所製造的人物都是習見的，作者絕對不打算用些奇特人物同離奇情節來炫惑人，他祇是應用濃烈的地方背景襯出一幅平凡的故事，但作品的效果往往是卓越的，他還會應用民間的歌謠很自然地配合到故事的發展中去，他的文字也許質樸平淡，但它使我們嗅到一種醇厚的田野氣息，通過他的文字，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是一幅內地荒遠的爲重山環繞的小城剖面，那裏面活動着專愛打抱不平的樸實的壯年人，還有那些愛僧纏足的小城婦女，醜酒的大兵，有着上好歌喉的船夫……我們似乎像被作者帶到一個古老而未會沾染近代文明的遼遠境地去，有一種無限親切的感覺。

結識沈從文說起來也是不久的事，但願望是早就有的。我絕對料不到居然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中，一睹這位渴慕多時的作家的風采，這對我是一個值得欣幸的機會。

一個寒冬的傍晚，山城的天空壓着陰翳的厚重的雲塊，北風呼嘯着，這樣嚴寒的天氣在此地是極罕見的，誰都耽心着會落起雪花來。

一所不十分華貴但佈置相當精緻的廳舍裏，充滿着喧笑，熾亮的電燈光像在人頭上罩起一層銀色的霧圈，壁爐的火熊熊地燃着，跳動的光輝映照到人們臉上，是益發變得紅豔閃亮了。這裏團團坐着的都是一批趕來參加宴會的，女主人是此地報紙副刊一個頗有聲望的編輯，在座的有兩位教授，幾個像我一般年紀的年青人，但最值得我們興奮的，却是沈從文也是座客中之一，除此以外，他的夫人與令妹，也被邀請了過來。

這是個中等身材瘦弱的中年人，面孔發着灰黯色，兩個顴骨高高聳起，看樣子不十分健康，他還不時作着輕微的咳嗽，我想也許是被多年煩重生活的重擔折壓了吧！

假如不是預先讀過他的作品話，誰也瞧不出他會在軍隊裏混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一襲色澤清褪的綢面袍子，一副深度的墨晶眼鏡，說話很斯文，聲音低得像一個靜淑的女人，手在袖管裏縮着，一雙謎細的眼睛老是釘在桌角那隻有蓋的茶碗，像要從裏面覓取一絲單純的興味，看神情他完全是古人筆底下描述的一副書生模樣。

他的太太也非常嫺靜，一個有着一張白晳面孔身段適中的婦人，據說是安徽人，她難得講幾句話。「多麼一對寂寞冷靜的夫婦啊！」我心裏真想不透他們苦寂的日子是怎麼打發過去的。但他的妹妹完全是屬於另一典型的人，像一般湖南人一樣，有着一副堅實的體質，頑皮，天真，具有一股少女特有的熱情，她是客人中最活潑的一個，他時常向他哥哥逗趣着說：

「瞧鼓起嘴幹嗎？不開口啊！」

受着溫暖的激勵，作為哥哥的黯淡臉上也飄起了一絲笑容，他的那雙謎細的眼睛也變得閃亮起來了。今天女主人特地爲着難得的客人親自烹調了幾隻可口的菜肴，沈從文不住地對主人的殷勤款待表示謝意，他還破例地喝了一點酒，他的話似乎也跟着多起來，他講起他在上海一段落拓的生活，他還提起丁玲，對於這位優秀女作家，他懷着無限的敬意，最後像夢幻似地爲我們講述了幾個湘中故事。像他的作品一樣，他說話也簡單，明明，他竭力避免應用較爲艱深的字眼，一個平凡的故事從他的嘴中講出來，自然親切而使人感着一陣溫暖。

飯後客人們細啜着上好的紅茶，友情的談話在溫暖的氣氛中像張開的翅膀飛揚開來：

「聽說沈先生從前在軍隊中幹過一陣是不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提起了這樣的問話。

「談不上，不過在裏面混了好些年，多跑了一些路，多看了一些人，也多見識了一些。」

雖然是這樣簡單的答話，但這裏面已包含了他全部生活的意義。他一點不誇大，幾年的隊伍生活確使他見識了許多，假如說作者全部作品中所以充溢着那麼多的人性，這該是這段可寶貴的生活的賜予。

「沈先生對於寫作的態度如何呢？」很自然地，在這樣場合下，有人想起這樣的問題。

「寫自己所知道的，寧可少寫，但千萬不可濫。」

仍然是這般簡潔，但這話裏含有無限的力量，這對於年青的寫作者是個最可寶貴的座右銘。

我們最後還問起那一個是他自己以往最滿意的作品，對於這問題，他略爲想了想，就迅速地舉出「邊城」來。照他說，這本書也許不大爲人注意，他也同樣承認，一些在大都市動脈裏生長的孩子，對於那樣邊遠地方的故事，是會覺得陌生的。但正因爲他是在那環境裏長大起來的，所以他明瞭那兒原始式戀愛的情緒，這裏也同樣遺留有他年青時的影子，他愛它正像珍惜自己一段生活的計程碑。以後當我有機會從新翻閱那本書時，也許因爲自己也會在那樣荒僻的邊城裏度過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吧，所以對於書中主人公的遭遇，也就更感覺無限親切，對於作者之誠摯自白，我是完全同意的。

告別的時候，外面確是飄起雪花來了，黑黝的天空中，零落的雪片像絨絮似地不停飛舞着，迎面的北風吼着，但我們的心底確實意外地感到少有的溫暖。

一個清癯的面影刻劃在我腦筋裏，對於這位爲生活折磨的中年人，我是較前更變得喜愛起來了。以後我們時常碰面，對於年輕人他也有一種濃烈的興味。每次的談話總多少帶給人以一點更多的

智識，他老是那般謙虛，真是個溫和的父執輩的人呢！

事變後他一直待在昆明，名義上他担任的是教育部編纂，另外在聯大及雲大還担任過一點課，他的住宅就在翠湖邊，天氣好的日子裏，濃綠的樹蔭裏時常可以發現他們夫婦的僂影的。

最近幾年中，創作寫的很少，僅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有過一篇長篇連載「湘西」，繼續以前一貫的質樸作風，去過湖南的人，對於這篇作品都感着十分熱愛的。

在昆明，他同雲大教授林同濟還創辦了一本名叫「戰國策」的刊物，他寫的多是有關學術研究及文藝理論的東西，除此以外，在「新動向」「今日評論」及「雲南日報」上亦時常可以看見他類似的文字，創作及散文小品之類的東西却極少有發表，對於寫作的興趣，他也許轉了向吧！

離開沈從文說起來也快兩三年頭了，這以後從沒再讀過他的新的作品，今日無意中在書肆中翻到「邊城」那本書，對於這位善良的好心眼的作者，我是感到濃重的懷戀起來了。

記馬彥祥

王易庵

近人寫文章，每喜藉他人以自重，如「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到底胡適之是不是這位作者的朋友，除了胡適之的本人以外，恐怕只有天曉得。我這裏不想採用這種作風，我所要說的只是，我和所謂「戲劇大師」馬彥祥，雖曾相處過一時，但他絕對不是我的朋友，因為我們相處時，彼此年紀還輕，我只有十六歲，他也只有十八九歲光景，大家還都在求學時代，他既沒有幹他的戲劇，我也沒有弄我的新文藝，各人對自己的前途都還渺茫得很。那麼大家以何因緣而相處在一起呢？說起來讀者也許會不相信，但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原來我們那時正都很起勁的在辦小報，寫小報稿子。

時間是民國十五年，正是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孫傳芳在東南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時期。那時的小報並不像現在一樣天天出版，都是三日一刊，只有遊戲場的報紙才是天天出版的。數量也比現在多，除了老牌的晶報以外，還有施濟翠編的「金鋼鑽」，吳徵雨編的「福爾摩斯」，朱瘦竹編的「海報」，（非現在的海報），賁少芹編的「風人」，郁慕俠編的「滬報」，賈劍青編的「鐘報」，孫拂塵王瀛洲編的「光報」，以及「開心報」，「窩心報」，「花報」，「上海花報」，「上海灘報」，「羅賓漢報」（現在還在出版，但在那時還是初創）等，不下十餘種之多。那時的小報，對寫作者是毫無報酬的，作者賠貼了心血，紙張，郵票前去投稿，完全是爲了興趣關係，想滿足自己的發表慾而已。我那時寫得很起勁，最多時竟擔任十張小報的特約撰述，而和馬彥祥的遇合，則在孫拂塵王瀛洲所編的「光報」。

王瀛洲是永安公司天韻樓的天韻報的編者，孫拂塵則是青島路上一家元昌印書館的職員，和我一樣喜歡寫小報稿子，彼此因同文關係互相認識，後來他們合編一張「光報」，於是我便被他們拉為寫稿的台柱，常常到孫所住的元昌印書館去，就在那裏，遇見了另一位寫稿的台柱馬彥祥。

馬彥祥那時還不叫馬彥祥，他在小報上寫稿時用的筆名叫「馬凡鳥」，「凡鳥」二字是「鳳」字的拆字格，大概他的本名中總有「鳳」字什麼的吧。他那時正在復旦讀書，寫小報稿子完全是課餘消遣性質，正和我一樣，不過我那時對新文藝還是門外漢，他却已經很熟悉，寫的稿子全是談的新文壇上的事，如「徐詩哲海外得良緣」，寫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合的經過，非常有趣。他那時對戲劇已經發生了趣味，在學校裏努力從事戲劇運動，所以光報後來還特地開出一塊戲劇版來，請他主編。

馬彥祥給我的印象是很良好的，他的容貌很俊美，完全是一副瀟灑風流的公子哥兒派頭，這和他後來的享盡人間豔福，戀人如走馬燈般去而復來，大概也不無相當關係，而他的待人和氣，滿面春風更不容易使人把他忘記。我們當時常常在孫拂塵那裏喝酒，酒酣耳熱，印刷所裏的一個職員拉着一把二胡，馬彥祥就高聲唱起西皮原板來，此景此情，還恍然如昨。有時也一同到天韻樓上去，天韻樓的文明戲班裏有個男演員，名叫張四維，別號大喇叭，也會寫文章，脾氣很爽直，大家圍坐在一張圓桌左右，一面看戲，一面談笑，倒也很有趣味。可惜為時不久，國民革命到達上海，光報停刊，天韻樓也暫時停業，舊時寫小報稿子的同文大都風流雲散，我和馬彥祥也從此沒有再見過面，我們之間只有這短短的一小時期的因緣，所以我決不敢說馬彥祥是我的朋友，因為他此刻說不定早已把我忘記了。現在要說到馬彥祥的家世和他生平所享受的豔福了。馬彥祥是浙江甯波人，他的父親便是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他出身於上海復旦大學文學院，因為愛好戲劇的緣故，和復旦的戲劇教授洪深非常

接近，他的出名，也得力於和洪深合譯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當洪深在天津任大陸銀行祕書長時，馬彥祥恰好也在天津，曾在天津「庸報」上著文大論洪深，備致揄揚，即此可見他的爲人是很能不忘私德的。

馬彥祥的成名，得力於他的妻沉櫻女士的地方不少。沉櫻女士是一位女作家，民國十八九年商務的「小說月報」上常有她的創作發表，作品集成單行本的，有北新書局出版的「某少女」，「喜筵之後」等多種。她的真名叫做陳因，是山東濟南人，雖是齊魯女兒，但她的溫婉多情，却和一個蘇州姑娘差不多。她和馬彥祥都是復旦大學的學生，那時「復旦劇社」公演焦菊隱的「女店主」，沉櫻女士担任該劇的主角，便和在學校裏自稱戲劇家的馬彥祥常有接近的機緣，以馬彥祥的風度翩翩，當然很容易博得女人的歡心，所以爲時不久，兩人就互相鬧起戀愛來，「有情人終成眷屬」，畢業以後，他們就在以前叫西藏路現在改稱廣洽路的大上海飯店結了婚。

新婚時期的生活當然是很甜蜜的，不過他們也並沒有忘記他們的事業。兩人都開始致力於新文藝活動，馬彥祥得到他老師洪深的提拔，和洪深合譯「西線無戰事」，沉櫻女士則努力寫創作小說，她的小說寫得很好，名作家矛盾和她的老師陳望道，對她都寄托着很深的期望，說她是中國很有前途的一位女作家。

馬彥祥和沉櫻二人，彼此既志同道合，又情意相投，在旁人的眼光中看來，他們縱使不海枯石爛，也該舉案齊眉了，誰知出人意外的，美滿的婚後生活過了不久，當他們旅居在廣州時，兩口兒就互相鬧起彘扭來。

馬彥祥到廣州去，是應歐陽予倩之召，那時歐陽予倩担任廣東省立戲劇研究所所長，馬彥祥也被

聘去担任教授，在戲劇研究所公演實習時，他還會當過導演，導演的劇本仍是「女店主」，和唐槐秋導演的「一百四十兩的銀子」同時演出。唐槐秋那時是戲劇研究所的劇務主任，認為這後起之秀的馬彥祥足以奪去他的地位，所以對馬彥祥很起了一些「刺激」，馬彥祥因為在事業上不很得意，於是就把他一向隱藏着的暴躁的性格都顯露了出來，把他滿腔的鬱抑都發洩在沉櫻女士身上，而這個被發洩的對象沉櫻女士，却祇有暗地裏飲泣，竭力避免正面衝突，不過同時她也很透澈的覺悟到，她和馬彥祥是不能永久相處了。在廣州時，有一次他們兩個人鬧得很兇。他們的朋友都担心想，以為這一次他們也許真的要鬧翻了，可是結果兩口兒却仍舊和好如初，大家總以為男女間的事情是不可究詰的，也就不把他們的衝突放在心上。

誰知當他們離開廣州重返北國時，却真的鬧起離婚來！原來兩個人一到北方，便都各自另外有了新的對象，沉櫻女士跟詩人梁宗岱發生了關係，以至於結婚，馬彥祥也和中國旅行劇團的女演員白楊女士鬧着初戀，對沉櫻女士的和他仳離，也就無所介意。不過他們兩方面的結果却大不相同，馬彥祥和白楊同居不久，便告勞燕分飛，沉櫻女士和梁宗岱却直到現在還保持着初戀時的情熱。

馬彥祥在初從廣州返北國時，閒着沒有事幹，藉天津「庸報」姜公偉的力量，進「益世報」館編副刊「語林」，才得住下去。不久，唐槐秋也回到北國來了，領導「中國旅行劇團」，出演於平津，倒虧他能不念舊時的「刺激」，依舊來請馬彥祥去導演「女店主」，就從這時起，馬彥祥便開始追求起被他稱為「名滿平津」的白楊女士來。

馬彥祥在担任了「中國旅行劇團」的導演還沒有開始追求白楊以前，還有一件為大家所矚目的坐懷不亂的桃色韻事：當時劇團有某女演員，行為頗為浪漫，慕馬彥祥的翩翩美男子風度，對他追求甚

烈。某一年夏天，馬彥祥正在獨睡，某女士特意去親近他，說是要睡覺，隨即便脫鞋睡上了他的牀，馬彥祥想讓她獨睡，她又不肯，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劇團裏的同志們恰好返寓來了，這纔把他的重圍解開，而馬彥祥坐懷不亂的佳話，也就傳遍了都下了。

馬彥祥和白楊的結合，是一般人所樂於稱道的，這因為白楊在當初就「名滿平津」，而她南下後不但成爲舞台明星，而且成了電影明星，凡是關涉電影明星的私生活和桃色韻事，一般人最喜歡引爲談資；馬彥祥和白楊既然有過同居關係，在他們未離開前固然常常被人提及，到他們已離開以後，也因爲一班好事之徒和小報的渲染，幾乎談到白楊時總要提及一下馬彥祥，而把馬彥祥的大名鬧得無人不知了。

到底白楊是怎樣一個人呢？這裏有加以說明的必要。白楊女士並不姓白，而是姓楊，芳名叫楊君莉，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日使館的職員，所以她的容貌也很有一些像日本女性。她的原籍雖是湖南，但却從小就隨着父母住在故都，曾在春明女子中學唸過幾學期書，沒有畢業就輟學了。她父母只生她姊妹二人，姊姊名叫楊君榮，就是舊都女名票楊韻琴，以交際花在平津一帶著有豔譽。白楊從小就失去了父親，母親不能守節扶孤，撤下她們姊妹兩人下帷歸三島去了，白楊全靠她姊姊撫育，才得長成，到她姊姊嫁德士古公司的經理某君時，白楊已亭亭秀發，圓姿替月，嫩靨羞花，和她姊姊一樣，以交際花的姿態出沒於平津社交界了。

凡是看過白楊主演的影片的人，對於她的容貌大概早有相當的認識了，用不着我再來多說，她身上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那一對眼睛，大家都說像兩顆白菓，馬彥祥所以那樣熱烈的戀愛她，十分之八可以說是爲了歡喜她那一對眼睛，真的，她那一對眼睛，具有極大的誘人的魔力，彷彿有牛奶冰淇淋。

淋似的愛情，要從她的眼睛裏漏出來似的。此外還有那陰險的鼻音，尤足以撩人春意，北方人的身材往往比南方人高，女性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爲早，白楊在十五六歲時，就已長成爲一個早熟的姑娘了，肌膚霜雪一般的「白」，纖腰像「楊」柳一般的軟，她的取名白楊，可說名副其實的。

白楊在沒有和馬彥祥發生同居關係以前，還會有過兩個男性朋友，第一個是她在交際場中認識的美使館的美國人賀士，當時情好甚篤，在戀愛過程中，兩人常把臂出遊，差不多要結成一樁異國姻緣，但不久便伯勞飛燕，各自東西。第二個據說便是後來供職於中央攝影場的戴涯，不過他們的戀愛經過則不詳，所以她的和馬彥祥發生關係，已經是第三次了。

凡是常常在交際場中出現的女子，虛榮心一定很重，渴望能獲得一個所謂「明星」的頭銜，白楊的所以不能在春明女中完成她的學業，未嘗不種因於此，那時，上海的聯華影片公司正在全盛時代，上海的分廠設有三所，並於北平也設有分廠，白楊見獵心喜，便放棄了學業投考聯華北平分廠，經聯華當局批准錄用爲學習生，在「故都春夢」中也有過她的鏡頭，不過她那時還處於不重要的配角地位，這是在銀幕上的初次露臉。

不久，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出演於北平，張榜招考演員，白楊因爲在聯華北平分廠鬱鬱不得志，正覺侘傺無聊，便也前往加入，開始度他的舞台生活，白楊的名字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用的。在「中旅」，她相當的活動，唐槐秋很器重她，一般同事對她的感情也都很好，因爲和男演員多所接觸的緣故，就和馬彥祥鬧出了桃色事件，展開了愛的一幕。

馬彥祥當時正在百無聊賴的時期，他的應唐槐秋之邀代，「中旅」導演「女店主」，也完全是消遣性質，却不料導演一個劇本的代價，竟會帶走一個名滿平津的交際花白楊女士，這在他完全是出於

意外的。至今「中國旅行劇團」的老演員，還常常把馬彥祥拿來和劇團的保姆陳綿博士比較，意思自然是譏刺他沒有什麼好處給過「中旅」。

當馬彥祥和白楊二人感情打得火一般熱，正要開始正式宣告同居的時期，他的朋友都會勸過他，說白楊是一個不祥人物，娶她無益，不如放棄了她的好。馬彥祥却執意不聽，自然，要他放棄這樣一個嬌豔的麗姝，他是不肯甘心的，不過他也防到良緣天妒，而且以白楊那樣的天姿國色，要是聽憑她和外界接觸，難保別人不會有染指的野心，更難保她會不見異思遷，所以他便把她當做他個人的禁樹看待，像小鳥兒一樣的關在籠子裏，使她不能和外界接觸。這計劃，對於馬彥祥當然是有益的，但在白楊，憑空失去了人生的自由。當然難免傷心，所以在他們結合以後，為時不久，他們間的感情就漸趨惡化而有了裂痕，不過還沒有明顯地呈露出來。

這期間，馬彥祥仍舊努力幹他的戲劇運動，過他的教書，編輯，寫作生活。他曾擔任濟南齊魯大學的教授，當王泊生在濟南山東省立劇院做院長時，他也曾膺聘在劇院所辦的戲劇實驗學校教過書。編輯工作方面，除了在廣東時曾代歐陽予倩編過「戲劇週刊」和「戲劇月刊」，在天津時編過「益世報」副刊「語林」外，還代上海光華書局編過「現代戲劇月刊」，後來屢經人們公演的劇本「寄生草」，就是在那刊物上面發表的。此外「中央日報」的「戲劇週刊」，最初也由他編，後來改為國立戲劇學校主編，才交給毛秋白去負責。當他編「中央日報」「戲劇週刊」時，曾鬧過很多笑話。據說有一次鬧起稿荒來，他竟把一位朋友的論文，拿來炒冷飯，而改了朋友的太太的名字，這樣，既不為名，也不負友，可謂滑天下之大稽。至於他的著作，那却並不多，除了常給人公演的劇本「寄生草」外，只有現代書局出版的一本「戲劇講座」，和光華書局出版的一本「戲劇概論」，此外好像還有一

本「秦腔考」，却不知道是那家書店出版的了。

民國念五年担任國立戲劇學校的教授，捐着「聯合劇社」的招牌，一手拉住「中國戲劇學會」，在首都戲劇界紅極一時，可說是馬彥祥一生中的全盛時代，然而同時也是他最傷心的時代，因為他的由戀愛而結合同居的愛人白楊，志在獻身銀幕，不甘於永久做他的禁燭，度那檻花籠羽的生活，終於就在這一年，和他宣告分離了。

馬彥祥和白楊同居在南京時，鬪房之樂，還是有逾畫眉，當田漢主持的「中國舞台協會」公演「回春之曲」，白楊也會被邀粉墨登場，戲雖不多，但他的音容色藝，却不易使人忘懷。後來明星影片公司的巨頭周劍雲到南京去，看見了白楊，彷彿發見了一顆新星一樣，認為繼胡蝶之後而起的人，非白楊莫屬，於是有心提拔，不惜以厚幣聘白楊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白楊本來是醉心於電影生活的，覺得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不論是從名上說，從利上說，都遠較鬪房生活為佳，所以白楊對周劍雲的要求，很有允意。這消息給馬彥祥知道了，頗不贊成，他的意思，以為近年來影壇上的紅星，差不多都是從劇壇上招來，戲劇指導者幾年的苦功，無異代他人作嫁，完全費在影片公司身上，長此以往，劇壇將難見活氣。他這一番話表面上固然理直氣壯，其實也不脫私心作用，因為白楊是他的情婦，心裏自然不願意她捨他遠去，所以想拉住了她不放。爲了想拉住白楊，馬彥祥確實也會經過一番努力，他想由他所主持的「聯合劇社」排三齣戲，都由白楊主演，使白楊忙不過來，就可以長伴在他身邊，不生異志了。然而這一番努力結果徒勞無功，因為白楊醉心電影生活已久，厭倦馬彥祥把她關在金絲籠裏的生活則更久，所以堅決要求進電影界，而馬彥祥却執意不允，兩下意見相左，於是各走極端，終於白楊毅然決然的效娜拉式的出走，和馬彥祥脫離了有三年歷史的同居的關係，雖然彼此仍舊保持着

友誼，並未以仇人看待，但在馬彥祥的生命史上，却無疑地已受了重大的創傷。

實在，白楊的那一副甜勁兒，是很不容易使馬彥祥忘懷的，她的那一對眼睛，那一張嘴，那一個鼻子，那一副笑靨，都有着動人熱情的吸引力，和她有過三年「夫婦」關係的馬彥祥，一朝爲了一點小小的衝突而互相判袂，怎麼就能够把往日的歡情忘懷了呢？據說有一次，田漢的母親作壽，馬彥祥也去祝賀，壽筵上以羊肉爲盛饌，當羊肉上來時，有人指羊肉問馬彥祥道：「你可還想羊嗎？」意蓋以「羊」喻「楊」，馬彥祥聞言，立刻答道：「那有不想的道理，願唱兩句倒板以表心跡。」當即有人爲他配絃子，過門拉過後，他略一思索，便高聲唱道：「一見白羊心腸斷，令我老馬淚不乾！」音高調激，好像蘊蓄着無限悲痛似的，一時席上諸人，都爲之黯然不歡。由此可見馬彥祥是如何的不能忘情於白楊了。

白楊自從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以後，第一部戲就被派任爲沈西苓導演的「十字街頭」女主角，周劍雲對她非常優待，當時因爲白楊所寄寓的地方居停主人是一位白俄，所以外間便有白楊與俄人同居的謠傳，周劍雲以衆口鑠金，深恐使白楊難堪，所以便叫她遷居到明星二廠裏去，對她也真可說是愛護周至的了。

當白楊決定加入明星公司以前，爲了要增加形態上的美感，特地請教一位著名的美容醫生來改造她的鼻子。因爲她平時說話，多走鼻音，在舞台上雖因此給人一個美妙的聽覺，但是一旦踏上銀幕，拍起有聲電影來，恐怕不甚悅耳，所以她要求醫生替她糾正發音的機扭，醫生對於她的請求，雖認爲可行，但須把鼻子開刀，從內部改造起，恐怕很費手術，同時她的朋友都勸告她，說鼻音就是她最動入的地方，如果把牠改變，未免太傻，白楊接受了朋友們的勸告，便打斷了改造鼻子的念頭，僅把眼

皮改造了一下，單眼皮改成了雙眼皮，又增加了她幾分嫵媚。

有人說，白楊的和馬彥祥分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她嫌馬彥祥太不夠勁，因為白楊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姑娘，要克服她祇有一個法寶，就是放出無限的熱情。據潘才農所探得的原由也是這樣，他說：「白楊是喜歡愈熱愈好，高占非像殺胚一樣厲害，白楊不是在重慶和她打得像火一樣熱嗎？這是什麼道理呢？大概是因為高占非够勁的道理。」這話是不是厚誣白楊，我們却不敢斷定。

至於馬彥祥，他自從和白楊分離以後，不久便又獲得了一個新愛人，有人說他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新愛人名叫李萱，就是現在還在上海和銀幕上有名小生余光結婚了的電影女明星李紅小姐，她出身於中央攝影場，當時馬彥祥和中央攝影場的戴涯等組織「中國戲劇學會」，排演「雷雨」「日出」等劇，因戴涯的延譽，而聘李紅加入為女演員，馬彥祥因為常常和她接近，兩人就漸漸有了超乎友誼以上的關係。

李紅原名叫做李可苒，當時戲劇學會的人以為「苒」字人都不識，擬改名可男，而李又不同意，所以改為李萱，因她楚楚孤立，只有一位老母相依為命，以萱字來紀念她的母親，是很確切的。後來她到了上海，經黃嘉謨的介紹，加入藝華影片公司，並由劉吶鷗替她改名李紅。這有兩種涵意，因為「萱」字不很通俗，改了「紅」字，既通俗，又象徵着她將來一定可以在電影界大紅而特紅。這說法雖不免有些歪曲，但改名的原意確是如此的。

李紅是廣東人，生長在北京，平時却說的上海話。她到過的地方委實多得很，杭州，天津，安徽，南京，都曾有過她的足跡，她爸爸是一個銀行的行長，後來雖然亡故了，但她仍不失為一位貴族化的小姐，所以她跑東跑西的讀書，很是自由。當她在南京金陵大學二年級讀書的時候，她對於戲劇

像着了迷一樣的有興趣，天天想找一個機會能夠跨上舞台，果然有志者事竟成，終於給她加入了「中國戲劇學會」，開始了她的舞台生活，也開始了她和馬彥祥的超乎友誼以上的關係。

但她和馬彥祥的關係剛開始不久，便又突然宣告破裂了。這因為馬彥祥始終不能忘情於白楊，而李紅的醋勁又恣嫌大了點兒，因此一決裂便無法挽回。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當時「中國戲劇學會」假座世界大戲院公演「梅蘿香」一劇，馬彥祥因為這齣戲是白楊最擅長的傑作，同時自然也有些想念白楊，於是特地請白楊前去參加演出，白楊因為她在明星的處女電影作「十字街頭」已告完成，也很想到南京去換一下空氣，於是就答應了馬彥祥的函請，赴京主演「梅蘿香」，而馬彥祥則飾男主角白森卿，當演到梅蘿香重又回來的一場，馬彥祥很熱情的對白楊說：「你願意回來嗎？」白楊回答說：「我很願意回來！」這兩句對話原是戲中應有的，但那時給李紅聽見了，却深知馬彥祥對於白楊，始終舊情未斷，如今又在台上這般演出，認為他們也許因此真將恢復舊好，不禁發生了酸素作用，對馬彥祥大起反感，雖經馬彥祥事後多方解釋，但李紅絕不肯予以原諒，終於因此而與馬彥祥宣告決裂，退出了「中國戲劇學會」。當時李紅還曾有信給她上海的朋友，否認她和馬彥祥愛好，並說：「像馬彥祥先生那樣的人，要做我的情人，那實在不大敢當。」看她的語氣，似乎有些瞧不起馬彥祥，但在他們沒有決裂以前，大家却都知道她和馬彥祥委實不是泛泛之交。

馬彥祥和李紅決裂以後，又得了一位新愛人，這新愛人並且是他的高足，和他有師生關係，那便是國立戲劇學校二年級女學生林飛宇小姐。他們因為是師生，所以時常接近，林小姐乘李紅去上海藝華電影公司之際，對馬彥祥十分表示好感，不惜移樽就教，促馬彥祥另遷一新居，屋內一切陳設，均由林小姐代為籌備，覺得新屋後，即由林小姐前往佈置，與以前屋內設備完全兩樣，其用意在使馬彥

祥忘記以前煩悶的事，免得他觸景生情，憂鬱不樂，也真可說是體貼備至的了。當時京中盛傳，他們師生兩人，有進一步的合作的消息，後來到底合作了沒有，因為八一三戰事發生，不得而知，不過在馬彥祥這短短的生命史中，戀人如走馬燈般去而復來，川流不息，並且有些是女作家，有些是電影明星，舞台明星。也真可說是豔福無邊，桃花運十足的了。

馬彥祥一生最大的缺點，是心地淺狹，不忘舊怨，這可以從他在南京和唐槐秋所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大唱對台戲一事上看將出來。這事發生於民國念五年夏季，唐槐秋率領「中旅」全班人馬到達南京，原擬於五月三十日上演於世界大戲院，後來因為國立戲劇學校的第五次公演「羣鴉」，適於此時在「公餘聯歡社」露面，為避免「唱對台戲對台型」的嫌疑，乃自動延至六月四日登台，誰知六月五日起，馬彥祥所領導的「聯合劇社」竟繼「羣鴉」之後公演於「公餘聯歡社」，於是有劇壇開人數名，認馬彥祥的行動為失當，蓋因「中旅」開碼頭到南京來，為整個劇運計，居京同道弟兄正宜竭力捧場，如今馬彥祥非但不盡地主之誼，而且伺機相抗，實非同道弟兄間所應有，何況從前「中國舞台協會」首次公演時，唐槐秋自故都兼程來京，於馬彥祥所導演的「洪水」中充任一角，以言朋友交情，實在够而又够，現在馬彥祥竟如此對待，實在是劇壇的不幸事件。馬彥祥聽到了這消息，連忙向各方奔走解釋，據他自稱：「初，予知中旅來京，係在六月中旬，故聯合劇社乃定於五日起公演，其後槐秋翩然蒞臨，知中旅演期業已提早，予雖有暫緩公演之意，奈何劇場已簽約訂定，欲延而不可得。且予此次公演，既非求名，更非圖利，實欲為中國舞台協會拔還陳賬也。蓋公演「復活」時，經濟胥由予負責，事後各人經手之預約券資未能如數繳到，而服裝佈景諸費，咸在予之兩肩，無奈只得演一次戲而償宿欠矣。雖然予無操必勝券之把握，惟一切佈景都假之中舞，開支極微，似有盈餘若干之可能

也。在未繳之預約券資中，槐秋經手者亦有三百元左右，是予此次公演，亦可謂幫槐秋之忙也。至於槐秋於我，誠有「對不起」者，如去年予離平南下時，彼雖閒居平市，而並不趨站相送，又如此次來京，亦不來看看老友，然聯合之公演，要非爲搗蛋耳！

他的話是否實情，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不過看他悻悻然的怪唐槐秋在他離平時不來送他的行，到京後又不來拜他的客，即此已可見出他的爲人心地是如何的淺狹了。

艾蕪與沙汀

黃果夫

民國廿四年的冬季，我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底，靠近打浦橋附近的一個衙堂裏，面對着我小亭子間窗口的一間廂房中，住着一對年近卅歲的夫婦。

每晚，我工作疲乏歸來時，從小小的窗框中望過去，總可以在那昏暗的燈光下，瞧見一個瘦長個子，蒼白面孔，尖下巴的人，伏在一張臨窗的寫字檯上，興沖沖地工作着，他的旁邊坐着一個和他同樣瘦長個子的女人，在默默地讀着書。

照例，我的眼光和他們的視線接觸時，那個坐在一邊默默地讀書的女人，就立刻機警地將那蒙着灰塵，而又殘破的窗簾放下了，只能隱隱地瞧見他們在窗簾後蠕蠕移動的影子。

每次遇着這樣的情景時，我內心便深深地感到痛苦，覺得不應該在這清夜，驚擾了他人的工作，不論這工作是屬於那一類性質的。

當時，正是暴風雨醞釀着的時代，在這種欲雨不雨陰霾密佈的環境下，祇有感到恐懼，威脅，每個文化工作者都特別提高他們的警惕心而小心翼翼地工作着，生活着，當時，我就是其中的一人！我怕人們驚擾我，但是越怕人驚擾，越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就像我注意對面窗子裏那一對夫妻似的，雖則我的注意，並沒有其它作用，僅僅是好奇心而已。

然而，我的內心也不得不深切地感到慚愧的，所以每當我的視線和他們接觸，而紅着面孔低下眼

袋時，心中想着他們該要如何地不安啊！

爲了避免使他們感到不安，每晚歸來時，總是先在黑暗中偷偷地瞧着對面房間裏的窗簾放下來沒有，然後才將自己房中的電燈扭開，有時候，瞧見他們的窗簾沒有放下時，便索性不打開自己房中的電燈，不做工作，就這麼地和衣睡在床上，以免引起對方的驚異。

然而，我越是小心翼翼的，越是引起了人們的不安，因爲我鬼鬼祟祟的行動，是更加引起人們的猜疑了。

這樣，有一天，一大早，一個姓王的朋友把我從睡夢中推醒了。

「呵！××，你知道對面窗子裏，住着的人是誰嗎？」

我說，「我不知道！大概也是一個幹文化工作的吧？」

「不知道，他就是新進作家，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人生哲學的一課』的艾蕪啊！」

「呵，艾蕪！」我猛的從床上坐起來了。

「是的，是艾蕪，××，下次你可不要再注意人家了，人家在懷疑你呀！」

「人家在懷疑我，懷疑我什麼？我又不是……」我有一點光火了。

我的朋友趕緊止住了我的氣，他說：「××不要光火，你每天不是在注意人家嗎？你把燈火關了，偷偷地從窗縫中瞧人家嗎？」

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的朋友所說的我注意人家的事，正是我胸中每日所感到苦惱的事呵！我的面頰立刻紅了起來，我聲音顫慄地高嚷着：「××，我不是注意他，我把燈火關熄，原是怕引起了他的注意！我要向他解釋去，我不是……」

猛的，我從床上立起來了，我要求我的朋友給我介紹認識他。我要向他去表白一番。可是我的朋友拒絕了我，他拒絕我的原因，並不是不願爲我介紹，而是他也不認識他。

原來艾蕪在發現對面亭子間中的我在注意他的時候，就四下去打聽，瞧瞧有沒有人認識住在對面亭子間中的年青的單身的小夥子，這個小夥子也彷彿和自己一樣是同命運幹着文化工作的人。後來他問到了沙汀，沙汀再問我的朋友王君，然後再由這位姓王的朋友轉達我。

沙汀，我認識他已久，可是我們並不十分接近，只是互相知道罷了。第一次認識他是在一個文藝座談會上。記得那天討論的題目，是關於「文藝大衆化」的問題。

這一個矮小個子，滿面冷靜，而內心實含着無限熱情的人，給我的印象是永遠不能泯滅的。他對「文藝大衆化」的問題是絕對擁護和主張的，可是，他不接受人們批評他的作品不够通俗化的主張，他說文藝創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儘可利用各種不同的創作方法，而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的。那天，和他辯論的有周起應等人，一直有四五個鐘頭之久。他彷彿有很多的意見，但說不出來，最後是辯得滿臉通紅，青筋畢露，口沫四濺……結果，是不歡而去了——獨自個兒氣沖沖地離開了座。

據說那天沙汀回去之後，他是哭了，儘管各自的意見不同，但在態度上儘可以和緩一點，而不應該太過火了。於是，當天晚上他回憶起白天辯論的情景時，立刻從床上爬了起來，當夜跑到周起應的家中，以及其它的朋友那裏去道歉了一番。

事後，這一場辯論，曾經被某小報發表出去了，而且大事渲染了一下，說是沙汀與周起應幾乎大打出手，以致於沙汀表示不再參加周起應等人主催的文藝座談會，而弄得外間議論紛紛。

沙汀的個性與他的作品，恰巧相反，他的性格是爽朗明快，鬚直天真，他的作品却是沉鬱結實，扭

握執拗，不大通俗，而帶點歐化的東西。一個高中程度的學生還不大看得懂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與艾蕪的作品在作風上大不相同，與巴金的作品更其不同。周起應在批評沙汀的作品一文中說：「……把生活，工作，知識的種種經驗，以及智與力與愛全部點畫不差的刻到作品上去的，真是很少很少的，然而，人類的成就就在於他能點點畫畫，人類的失敗也就在他們懶於點點畫畫，一筆不苟且的完成，就彷彿一隻漏水的細節，不僅工作，生活，自身由篩孔裏面瀉，有時候就是連人也會漏出去的，自從能夠在篩子裏面保存下來的，我們可以想像這是金砂，這個金砂才是真正由各種生活，工作等等經驗以及智與力與愛的結晶，這種結晶，我們在沙汀的作品中，可以細細的摸索到……」

這批評，可以說是對沙汀的作品批評是再合適不過的了。然而，這種結晶，不是誇大的說，又豈是一個平常的中學生所能瞭解的呢？

由於我和艾蕪的這點小小的誤會，更由於我的朋友王君的介紹，我開始進一步的認識沙汀。

沙汀那時住在辣斐德路桃源邨的一間客堂中。他的房間的佈置很簡單，一張床，和一張寫作的檯子，以及幾大箱子的書籍，其餘便是被扔在床頭或者櫃子底下的報章雜誌以及一些醜觀的衣服而已。他本人不修邊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裝，但他有時也歡喜穿長衫，因此，我們不時也能瞧見他穿着一件藍布大褂，搖搖擺擺地出現在桃源邨中，這種寒儉而且帶點稀有的打扮，是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

沙汀似乎不大願意人常到他的家中去，很少有朋友被他招待在他的屋子裏坐上廿分鐘的，好像自己的屋子裏藏着幾許秘密似的，他說房間是休息與工作的地方，除了睡眠與寫作外，就不能有其它，他說如果要招待朋友閒談或者討論一些什麼問題，那儘管到咖啡館去，沒有錢上咖啡館，那末馬路上

也是很好的招待朋友的地方。因此每一個朋友到他家中去，剛踏進房門，還沒有坐下來時，便被他囑住了：

「呵！××，我們好久不見了，去去去，我們到馬路上去走走！」於是，他立刻穿上了外衣，領你到馬路上去散步，一走便是好幾個鐘頭，從來沒有表現過一點不耐煩或者敷衍的態度，這種熱情與精神却是沒有第二人及得上的。

第一次，我同姓王的朋友到他家去時，也曾經如此被他「熱情」地招待過，這以後，好多次的拜訪，也都是如此。因此很少是留在他的家中。我們常常散步的地方，是在杜美路與祁齊路之間，那些僻靜的街道上的一粒沙子和一顆石塊，都是我們所熟悉的，當他瞧見了普希金的銅像時，他便會高聲朗誦起普希金的詩歌來。他瞧着黃昏的杜美路的那一頭，有一兩個白俄在踱着方步時，他就會一口咬定這是古老的莫斯科的黃昏的街景。他看見一個流浪的老白俄時，就想起了杜斯妥益夫斯基筆下常常提到的一些頑固而又悲慘的老年人的命運來，他遇着了揣着一匹小狗或者握着一根手杖的年青的淑女或紳士時，他就會一口咬定：「這些都是果戈里小說中的人物啊！」

總之，諸如此類的例子，真是數不勝數。

我們一面徜徉着，一面閒談着，真是天下之大，無事不談，但是，在我們的談話中，却很少談到他的身世，他儘可能地避免人們問到他的家庭的狀況，但有時候，在談到杜斯妥益夫斯基，契可夫等人的作品時，也多少透露出他的身世，譬如說他憎惡他封建的大家庭，於是他就痛責「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中的那個頑固的老年人。他同情與他同樣為家庭不容而在上海流浪，當着學校教師的一個姐姐，因此他便同情「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中那個女主人翁的命運。於是他便常常地滔滔不絕地稱讚

這個女主人翁的性格是如何地善良，以及她是如何地堅忍和刻苦，而每次談到這些時，都是眼眶紅紅的，一直到他的第一顆淚珠從眼眶中奪出來時，他這才恍然大悟似的，趕緊把話題移到另一問題上去，好像這些人物的命運，都與他無關。

因此每次談到這些問題時，他的結尾便是：「××，你要熟讀杜斯安益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這一部書，還有『罪與罰』，還有法捷也夫的『毀滅』，還有梭拉非謨維支的『鐵流』，還有契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讀百次也不算多的。」

真的，他對於我的文藝愛好，是有着莫大的影響的。

除此以外，人們就不能知道沙汀較詳細的身世了，只有人們還知道他已經結過婚，還有一個孩子，不過那時他的太太不在上海，他只是一個人孤單的生活罷了！

我在認識沙汀的五個月之後，我才認識了艾蕪。在這期間，我們雖則彼此住在一條街堂裏，窗子面對着，日夜碰着頭，但是從沒有招呼過。

我曾經幾次要求沙汀給我介紹，但都被他婉詞拒絕了。他輕輕聲地，拍着我的肩膀說：「××，你可知道，艾蕪是一個膽子小的人呀！不，是一個仔細而又謹慎的人，是不大喜歡交際的人，他不像我，不大願意多認識陌生人！」

像這樣的話，我聽過不止一次，最後，我有點光火了；我怪俏皮地說：「呵！是嗎？不願意會見陌生的人，大概是有點驕傲吧？」

沙汀一聽到我這一句話，立刻從座位上跳起來說：「那裏的話，不是驕傲，不是驕傲！」他有點急了，緊握着我的手說：「艾蕪真是一個好人，一個忠厚而又虛心的人，他不願意多認識人，實在是

不會交際的原故，而且他說的一口雲南話，也不是我們容易聽得懂的。××，你如果不相信，我立刻就替你介紹去！」

他說着，便拖着我的手，立刻要我同他到艾蕪家中去，爲我們介紹。我這時雖則因爲錯怪了好人，而感到難爲情，但爲了要認識艾蕪心切，也只好將計就計，便興奮地和沙汀一同到他的家中去。

記得那時已是深夜十二點多鐘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幾個洋車夫在灑洋洋地徜徉着，我們一口氣地穿過了幾條街，到了艾蕪家時，艾蕪夫婦已經在甜蜜的睡鄉中了。

衙堂中燈火已熄，闔無人聲，我們瞧着那關閉着的大門，那放下窗簾的黑暗的窗子，那從窗子眶中漏出來的甜蜜的鼾聲。我便拉着沙汀的衣角說：

「我們明天再來吧！別要吵了人家的清夢啊！」

「呵，那裏的話，沒有問題的，艾蕪是沒有一點臭架子的，鬧醒了又有什麼關係！」

他說着便乒乒乓乓地敲起門來，高嚷着：「老艾，快開門！是我，是我呀！」

艾蕪聽了他的聲音，幾乎來不及下床似的，穿着一身單褂褲，趕緊跑到樓下來開門，把我們迎了進去。這時，雖則已是春天，但在這冷清清的深夜，仍是有點寒峭的。

當我們緊握着手時，一股熱情通過了我們的感覺，我們這才知道友情的可貴，真摯！

沒有等到坐定下來，沙汀便一口氣地將我們的來意一起爽直地說出來了，當這位忠厚的老實人，聽到別人誤會他驕傲時，一副惶惶然恐懼而又慚愧的心情，真不知道怎樣才好，他滿面通紅，露出他一口凸出的牙齒，笑嘻嘻地筆直地立在那兒。

我向他說了許多抱歉的話，解釋了一番誤會。那天晚上，我們一直談到了天亮，才各自歸去。

這以後，我就算正式認識艾蕪了，接觸的機會也就多了。

從長時間的談話中，我知道他窮苦出身，並不像沙汀那樣家中有錢，也不像沙汀那樣是一個大家庭，從小便失去了父親母親，中學畢業後，便一直在雲南和四川的深山間流浪着，做過苦力，做過小學校的教員，更做過人家公館裏的門房……「人生哲學的一課」就是他自己的寫照，在這裏，他不知道嘗過了多少人間的苦味，飽經了多少的風霜，生活增加了他人生的知識，經驗，以至於他長成。

因此，他在性格方面，並沒有沙汀那樣地爽朗，也沒有沙汀那樣地天真，他有的便是樸實，淳厚，農民的作風和農民的性格，他沒有高深的「學識」，也沒有受過上等人所授的教育，他有的便是生動的熱力，奮鬥的經驗，和一長串的苦難，磨折。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沒有討厭的洋化作風，沒有執拗的難以使人了解的感情，有的只是親切，真實，人間的溫暖和苦味……而使得成千成萬個青年感動，沉醉。

茅盾在批評艾蕪的作品時說道：「……你們幾乎難以想像這個作家的作品，是在怎樣的情形中產生的，他在雲南的深山中出賣着自己的勞力，一面像牛馬般地工作着，一面從懷中掏出他那一本記事簿子，隨時地錄下了他的感情和他的勞力……」

「你們更難想像到一個人在生活的折騰下，還要學習，還要不斷地求知的那種心境和精神！……」真的，他的大部份的作品，就在這種情形下寫成的，然而，這種染着濃厚的血和肉的作品，又怎麼不叫人們讀了感動和愛好呢？

他在上海的生活很苦，夫婦倆完全以靠賣文過活，有一個時期，朋友們看他的生活太苦，介紹他到南市某中學去教書，後來爲了環境關係，過了不到兩個月的粉筆生活，便自動辭職了。到了二十五

年的冬季，他們有了一個孩子，因為母親太弱的原故，孩子生下地，母親的乳汁便斷絕了，於是夫妻兩個在維持自己的生活外又增加了孩子一個月十多元的牛奶費。

那時，能够常常在經濟上幫助他的，只有沙汀，然而那一點經濟力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沒有辦法，他只好埋頭寫作，日夜地寫作，到處託人介紹稿子。

有一天下午，沙汀來找我，他一見我面，便很痛苦地說道：「呵，我對不起艾蕪！」

「爲什麼？」我不勝驚異地問。

「我沒有借錢給他，他的孩子又缺少了買牛奶的錢！」他顫慄地說着。

「那麼，爲什麼不借給他呢？你沒有錢嗎？」我問。

「不，我有錢，我氣憤他！」他的臉上真有一點氣憤的樣子。

「不借錢，還要氣憤人家嗎？那是爲了什麼呵？」我有一點埋怨他的意思。

於是，沙汀便從頭至尾向我解說這件事。原來沙汀氣他的，是前時艾蕪給了會今可一篇稿子，

叫做「我們的夥伴」，最近在「新時代月刊」發表出來了。那時會今可正在提倡什麼「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的所謂解放詞，文壇上的人，對他都沒有好感，所以沙汀氣艾蕪不該將稿子給「新時代月刊」發表，不該和會今可來往。

沙汀告訴我這件事後，便大罵：「他媽的，真是無恥，什麼是『國家事，管他娘』，什麼是解放詞，他媽的，真是無恥！」

等了一會，沙汀又好像懺悔地說道：「老艾，真是好人，我明知道他和會某人的來往不是爲了一筆稿費，也不是存心要和他來往，還不是這個無恥的東西要死纏着他嗎？」那時我就常常看見會今可

出現在他的家中，向他索稿子，他將稿子給他拿去發表，還不是爲了「好人」這兩個字嗎？

第二天，艾蕪還是捧着一束稿子，到沙汀家中來，笑嘻嘻地向他請教，對於借錢「碰壁」的問題，毫不介意，這也是一個「好人」的心情和氣魄。

前年，聽說艾蕪從西北到了桂林，在桂林仍舊是靠賣文過活，仍舊當中學教員……。香港戰爭未爆發前，亦會到過香港，最近聽說仍舊在桂林。

沙汀，艾蕪，他們的近況，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記 阿 英

王易庵

我認識阿英先生，是在民國廿七年夏天從廣州返滬以後，當時施蛰存剛巧也從昆明轉道來滬，有一位朋友設宴於法租界麥賽而蒂羅路的潔而精川菜館，爲他接風，我也被邀作陪，席上便幸會了這位多方面的作家兼編書家阿英（錢杏邨）先生。因爲阿英和施蛰存交誼頗篤，他們在民國廿四年會一同代上海雜誌公司老闆張靜廬編過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所以在這接風宴上，當然不會沒有他的大駕。

寬廣的額角，剪着平頂的頭，嘴上留着兩撇小鬍子，這是我與阿英先生第一面的印象，要不是朋友從中介紹，我幾乎疑心是什麼地方跑來了一位小政客，實在，看阿英先生的外表，絕對不像一位文人，倘若剃去了他的鬍子，可以安置在錢莊裏充一名當手，倘若叫他戴上仁丹廣告上那樣的帽子，則又儼然是一位官僚。

我對於阿英先生，真可說是久仰大名的了，雖然在和他見面時，他在文壇上出現了也只不過十年光景。他最初大概也是寫小說的，我曾在創造社出版的洪水半月刊上讀過他的創作，好像他還會在泰東圖書局出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義塚」，但他的小說寫得並不成功，遠不如他的批評文章來得精彩。他的出名也是由於他的犀利潑辣的批評，有人會把他和創造社的文藝批評家成仿吾及語絲社的批評家韓侍桁相提並論，稱之爲現代中國的三大批評家。

在當時，他還不會用過阿英這個筆名，他的以文藝批評家的姿態出現，還是用他的本名「錢杏邨」。

「三字，阿英乃是在他文壇上由左翼批評家轉變到極右傾的古書收藏家以後所用的筆名，自從他用了這個筆名以後，就不會再用「錢杏邨」三字寫過文章，而且從此也擱筆不再寫批評了，大概他也有些懊悔青年時代的鹵莽滅裂，以致陷入左傾幼稚病的錯誤，而深自韜晦的吧。

但當他的批評初出現時，却無異在中國的新文壇上投下一顆猛烈的炸彈，使得大家都相顧失色。他雖然也起自創造社，和創造社的小夥計周全平，葉靈鳳，潘漢年等地位相等，但後來却成爲太陽社的中堅。太陽社是由蔣光赤所發起的，他和錢杏邨都是安徽績溪人，當時因爲看到創造社的受青年歡迎，所以在經過數度集議以後，便決定在民國十七年一月成立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提倡普羅列塔里亞文學。錢杏邨的第一篇批評文章就發表在太陽月刊的創刊號上，一開始就對當時思想界的權威文壇的領袖魯迅先生下總攻擊令，批評他的小說集「吶喊」中的「阿Q正傳」，而以「死去了的阿Q時代」題其篇名，響應着成仿吾，把魯迅罵得體無完膚。其實他這批評犯着極大的錯誤，因爲一篇偉大的作品，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但他當時那種大膽潑辣的作風，確實曾經鬧動一時，並得着多數青年的擁護。

接着他又批評了剛發表「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不久的茅盾，批評了「詩人郭沫若」，和郁達夫的「達夫全集」，每一篇批評，都爲青年們所熱心閱讀着，從此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算是奠定基礎了，有許多作家，甚至以得到他的批評爲榮，例如早死的青年作家顧仲起，就會在他的小說集「殘骸」的後記裏，表白他願意得到錢杏邨的批評的希望，這希望，在他死後，錢杏邨是會使他滿足了的。

這些鬧動一時的批評文章，後來錢杏邨會把牠們集合起來，在泰東書局出了兩冊「現代中國文學

作家」，這兩冊書現在不用說是早已絕版了。

錢杏邨當時不但對現代中國的權威作家逐個予以批判，而且對現代的世界作家也同樣的予以批判，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十九卷小說月報上，他曾先後批評介紹了十個現代有名的世界作家，他的觀察的透澈，筆鋒的犀利，簡直可以和丹麥著名批評家勃蘭兌斯並駕齊驅。這十篇批評文章，後來他也曾集合起來，出了一冊單行本，名爲「力的文藝」。

由於錢杏邨的批評的傳誦一時，駸駸乎幾欲奪成仿吾之席，泰東圖書局的老板趙南公便特地請他編了一份海燕週刊，格式仿創造週報，撰稿者完全是太陽社的一批人物，如蔣光赤，孟超，迅雷，楊邨人等，此外便是錢杏邨自己的批評文章。這一本太陽月刊的姊妹刊物，隨着太陽月刊的被禁止發行，太陽社的無形解散，而同時宣告停刊，僅僅出了十七期。

民國十八年，是左翼文化運動遭受挫折的時期，隨着創造社的被封，各種色彩比較鮮明的刊物都絕跡於文壇，僅存小說月報，大眾文藝，現代小說，奔流，語絲等數種，錢杏邨的鋒銜畢露的文藝批評一時也就失去了發表的地盤，這一年中，人們幾乎沒有看見過他一篇文章，但他並沒有放棄文字生涯，原來他這時已開始了另一種工作，代書店去編輯青年參考書和學生課外補充讀物去了。這時新創了幾家小書店，如光明書局，文藝書局等，大凡一家書店初創，最要緊的是趕造貨物應市，而不問貨物內容的良窳，錢杏邨便以戴叔清的筆名代光明書局和文藝書局各編了一套青年課外補充讀物，內容並不完全屬於文藝，也有生物理化等類的東西，這真可說是「能者無所不能」了。而他的能混進書業商人中間去活動，代他們編書，藉以增益自己的收入，不像其他文人一樣，只會寫稿，投稿，對自己的稿子的命運都無從決定，更可見他的手腕確實高於其他文人一等。

在雜誌上發表作品的收入是零星的，編書的收入則是整批的，而且編書可以利用現成材料，祇須加以剪貼即可，不必費力，寫批評却要絞着腦汁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兩兩相較，自然是以編書爲進益多而又不吃力了。錢杏邨自從吃着編書的甜頭以後，時刻不忘，從此就開始成爲文藝界的兩棲動物，市儈式的文人，每逢寫作碰壁的時候，就搖身一變，鑽到編書的路上去。所以蔣光赤潦倒至死，而他却得以在上海社會立定腳跟，同一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人物，却有如此兩種相反的結果，亦可見人生之不可執一，而必須從事多方面的活動，並且就是他後來的拚命買書，藏書，也未嘗不是受了當時編書的啓發，感覺到這些故紙的可以變做黃金呢。

然而當時的左翼文藝運動雖受挫折，却並未消滅，正如魯迅在野草中所說的那樣，「地火在地下運行」，終有一天要爆發出來，到民國十九年的春天，這一文藝運動又抬頭了，而且較第一次的聲勢尤爲浩大，第一次運動中爲左翼文藝作家所圍剿的魯迅，在第二次運動中，却由馮雪峯和姚蓬子二人的拉攏，成爲左翼文壇的盟主，把在北新書局出版的奔流月刊停刊，改到光華書局去主編萌芽月刊，提倡起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來。現代書局所出的大眾文藝和現代小說兩種刊物，態度原本是很溫和的，這時都開始轉變，篇幅加厚，色彩也日漸鮮明了，而且另外還出了一本「拓荒者」月刊，就由蔣光赤主編，儘量容納當初太陽社的一批人馬，錢杏邨不用說也就乘此機會捲土重來了。「拓荒者」也是一本月刊，但篇幅却較同時所出的各種雜誌爲厚，定價五角，也較其他雜誌爲高。錢杏邨按期在「拓荒者」上面寫一月來的創作批評，戴着有色眼鏡去批評作品的題材和內容，自然凡以無產階級爲主的皆是佳作，不管牠內容如何空虛，或者充滿了標語口號，而那些內容充實生活經驗豐富技巧也相當優秀的作品，只要不宜揚普羅列塔利亞，在錢杏邨眼裏，也就够不上稱一聲好了。

也許因為這一次左翼文化運動開得相當厲害，所以僅僅不過半年，就遭受了當局的高壓，萌芽，拓荒者，現代小說，大眾文藝，都被禁止出版，發行左翼文藝刊物最多的現代書局幾乎遭受封閉的處分。後來經老闊洪雪帆竭力疏通，纔免被封，不過有一交換條件，就是要他改出民族主義的文藝刊物，並且由官方派人來主持編輯部。因為這一次當局也學了乖，深知自己如果沒有貨色，僅作消極的禁止，則過了一時，難保不捲土重來，所以要提倡民族主義的文學，以與無產階級的文學相對抗，藉以收羅人心。這結果，便是左翼作家完全被逐出現代書局，而由民族主義文藝作家出而代替，刊物方面，也由前鋒月刊代替了拓荒者，現代文藝代替了現代小說，現代文學評論代替了大眾文藝。

這一次高壓的結果，是胡也頻，柔石，馮鏗等七個作家的被殺，和蔣光赤的病死，至於錢杏邨，他是最善見風使篷的，一看形勢不對，早已回過頭去，彈他編書的老調了。他在這一時期編的書籍相當多，有以錢謙吾筆名代樂華圖書公司編的「語體模範文選」「語體文學讀本」，又有以阮无名筆名代南強書局編的「中國新文壇祕錄」，更有以張若英筆名代光明書局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一方面，他仍不忘以左翼文藝批評家的姿態，攻擊嘲罵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一直到民國廿一年，他還在丁玲主編的北斗月刊上，寫「一九三二年文壇的回顧」，大罵民族主義文藝作家。不過這也是他從事文藝批評的最後一篇文章了，以後就不會見他再寫過批評。

作為文藝批評家的錢杏邨的功罪，是很難下定論的，要說他的功，那便是他代新生的中國文學的文藝批評這一部門做了一番開闢草萊的工作，使得大家對文藝批評和其他文藝部門同樣的重視，並且對於一個作家的系統的批評，也是由他開始的，現在我們已很難見到這種系統化的作家論了。要說他的過，那便是他戴着有色眼鏡，大刀闊斧地抹煞一切，黨同伐異，使大家心裏都存一個左翼文壇橫暴

的面影，雖然這也是當時的左翼政黨所持的幼稚錯誤的盲動政策所造成的惡果，但在他，畢竟也是功不掩過的。

當時政府當局的高壓左翼文化運動，殺戮左翼作家，並沒有使所有的左翼文化人屈服，反使他們仇視之愈愈深，同時國際方面若干團體也紛紛聯名向當時的政府當局提出抗議，這使政府當局不敢再用殘殺的手段，而想改用通緝和招撫的方法來懷柔左翼作家了。他們的辦法是很巧妙的，那就是方面下令通緝，一方面挽個別勸告他們改變宗旨，同爲貫徹三民主義而努力。錢杏邨當時就是既被通緝又受勸告的一個，那時上海的教育局長是潘公展，他曾這樣託人勸告錢杏邨說：要是他肯改變宗旨，歸化當局，可以請他來擔任上海市教育局編譯室正主任一席，並且只要他肯答應就這個職務，就是不到局工作也不妨，每月照樣送他薪水三百元。那時三百元薪水已經可說是很高的待遇了，像顧鳳城等就去之惟恐不速，可是錢杏邨對於思想信仰却是有着不變的堅貞的，他仍舊固執地不肯答應。

錢杏邨既然不肯歸化當局，通緝令當然不會取消，而且只有較前益緊，甚至署着他的真姓名的文章也已不能再在刊物上露面了，於是他便改了個筆名叫阿英。這阿英的筆名的第一次出現，是在施蟄存主編的現代月刊上，當時幾乎很少有人注意，現在却幾已無人不知，甚至竟有知阿英而不知錢杏邨爲誰的了，所以我這裏也就改稱阿英而不再稱錢杏邨。

阿英在當局的通緝令之下，不能在家裏容身，只好托庇在英美人的勢力下，住在租界上的一家小旅館裏，閒來無事，便在城隍廟的舊書肆裏徜徉，買了不少舊書，特別注重晚清學術文藝作品的搜集，因爲關於這一時期的文獻，還未有人注意過，正是一宗「冷門貨」，足可供他作「生發」的資料，他的注意及此，也正可見他的聰明。因爲在城隍廟的舊書肆中跑得熟了，他還會在「現代」上寫

了篇「城隍廟的書市」，後來收在他的散文集「夜航集」裏。

從民國廿二年到廿四年，可說是阿英一生中的黃金時代，這倒不是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的增高，而是他的進益的豐富，當時出版界正因屢受政治壓迫，書籍大部份被禁止發行，幾有無書可出之苦，於是競出雜誌，競相翻印古書，「雜誌年」之後，又來了個「翻印古書年」，阿英爲人圓通，與各雜誌的編者都有交情，他的作品在雜誌上發表當然不成問題，而翻印古書的風氣更使他交進了一步紅運，幾乎所有從冷攤上幾毛錢收來的舊書，都成了無價至寶，只要標點一下，售給出版商，一轉手間，就可以坐收每本數百元的利益，他和施蟄存在上海雜誌公司主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着實給他賺了很大的一筆錢。此外，他還代良友圖書公司編新文學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把由民國六年至民國十五年十年間文壇上的史料收集編目，所得的報酬也很豐，又把在舊書肆裏買來的一冊李伯元著「庚子國變彈詞」讓給良友圖書公司去翻印，也得了數百元。

但自一二·九學生運動起來以後，出版界的風氣爲之一變，古書已不再受讀者的歡迎，也沒有一個出版商肯加以翻印了，這就使阿英的生活缺如起來。幸虧他的眼光銳利，看出中國的話劇運動雖還在萌芽時期，却有着遠大的前途，北方唐槐秋所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南方田漢馬彥祥等人主持的中國舞台協會和聯合劇社，歷次公演，莫不吸引了不少觀眾，就是上海，業餘劇團演出的「欽差大臣」，寶座也頗不惡，可見這條路很可一走。恰好這時話劇界正鬧着劇本荒，而曹禺剛發表了他的鬧動一時的「雷雨」，話劇界裏公演「雷雨」的那種熱烈情形，也着實使阿英羨慕，於是他又搖身一變，鑽進戲劇圈裏活動起來，先後撰了兩個劇本，「滿城風雨」和「羣鴛亂飛」。這兩個劇本，雖曾經幾個劇團上演過，但似乎因爲內容過分羅曼蒂克化了，並未引起劇壇怎樣注意，一般的評價也不很高。

八、三戰事發生，阿英會銷聲匿跡了一時，但到民國念七年，他又開始活躍起來了。先在文匯報的副刊「世紀風」上發表散文隨筆，接着又在復刊後的申報副刊「春秋」上發表劇本「桃花源」，署的筆名是「鷹隼」。

這時，在香港註冊的英商大學圖書公司和好華圖書公司先後成立，利用洋商招牌作掩護，阿英活躍得更爲厲害了，他先編了一冊文獻月刊，專門轉載內地書報雜誌上所登載過的東西，厚厚的一冊，編得倒也相當精彩，銷路很不錯，後來還印行別冊附刊，如「婦女文獻」之類。另外還印了幾本小冊子，並且把「痛史」，「風洞山傳奇」等類的舊書也翻印了出來。仍舊不失他過去的一貫作風。自然，對於這一類書籍的翻印，他又有另外一種說詞的。

當時他還有兩個雄偉的企圖，第一是搜集七七以來所有的文獻，按着年月排列，出齊一套文獻月刊，以成全璧，這一個計劃如果實現，則直接「文摘」之後，對於文化上的功績確實不淺。第二是出版「翟秋白全集」，原來他家中所藏的翟秋白的作品最爲豐富，「亂彈」一書的材料，差不多完全是由他供給的，在「海上述林」以外別樹一幟。這雖仍不外乎舊書的翻印，但其意義却較翻印什麼「文學珍本」或「痛史」之類要有價值得多，因爲翟秋白這人，不論在政治上，在文藝上，都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他的全集的出版，在文化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民國廿八年四月十九日，英國大使館對所有英商報紙和英商圖書公司都拒絕發給執照，使得牠們都不能再繼續出版下去，阿英的兩個雄偉的企圖不但都未能實現，甚至連原有的文獻月刊也受了影響，不得不宣告壽終了。

在這一時期內，阿英還會接王任叔的後隊，主編每日譯報的副刊「大家談」，因爲王任叔由胡仲

持介紹去編復刊後的申報副刊「自由談」，遺缺便由阿英來代替，他一接手，就把前編者王任叔罵了個狗血噴頭，王任叔氣得要命，連忙也在自由談上反攻，彼此對開筆戰約有一月之久，結果竟使王任叔連自由談的編輯室座也不能坐牢，所以後來王任叔在人前提起阿英來，還是恨得牙癢癢地。

當時的英商大學圖書公司和好華圖書公司，雖然掛着洋商招牌，但出面的發行人英人孫特司·斐士和拿門·鮑納等，不但毫無資本經營出版事業，甚至還要向出版人支薪水，阿英出了這樣許多書，到底他的資本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的說他是走柳亞子的路綫，有的又說是孔祥熙的兒子供給的經費，究竟如何，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不過他自有他的活動手腕，他的河內地拿津貼，在出版界已經成了公開的祕密，就是他當時不時的到香港去與夏衍會晤，也未嘗不與他的出版事業有關呢。

說阿英和柳亞子有關，這話大概是可信的，因為柳亞子當時正在研究南明史實，想完成楊秋室，雙映江，戴子高，傅節子，李慈銘諸人所沒有完成的大事業，恰好阿英也有創造南明四部歷史劇——「碧血花」，「海國英雄」，「揚娥傳」，「懸嶼神猿」的計劃，彼此便接連不斷的通起信來。到了民國廿八年秋間，這四部史劇的第一部「碧血花」（即「明末遺恨」，亦即「葛嫩娘」。）完成，十月，由上海劇藝社演出，獲得空前好評，連演兩月有餘，場場滿座。他發表這部劇本時，是用的魏如晦筆名，取「風雨如晦」之義，演出後轟動一時，聲譽鵲起，幾乎把他的阿英的筆名都壓下去了。

阿英的興趣之重又移到話劇方面來，和他的朋友尤兢也有幾分關係，尤兢是阿英一手提拔起來的劇作家之一，當時正以于伶的筆名發表了兩部劇本，「女子公寓」和「花濺淚」，在舞台上博得盛譽，阿英見獵心喜，並且覺得這時上海話劇界的情形，正等於「蜀中無大將」，便開始着手寫起「碧

血花」來，果然一演就紅，這在他也正可說是求仁得仁呢。

「碧血花」奠定了阿英在劇壇上的地位以後，他對創作劇本的興趣更加濃厚了，接着第二部歷史劇「海國英雄」在璇宮劇院公演，輿論也一致推崇，再接着第三部歷史劇「楊娥傳」在辣斐劇場演出，賣座也是歷久不衰。

這時期的阿英，真可說是躊躇滿志了，他的劇本在舞台上公演，可以拿上演稅，在書店裏出單行本，可以拿版稅，但他仍舊不稍滿足，還是要編書，要把自己收買下來的舊書碑版給書商去翻印，在此期內，他曾代潮鋒出版社編了一部「現代世界名劇精選」，和一部「近代國難史叢鈔」，另外還把他的一部舊劇本「夜上海」改編為「不夜城」。不料霹靂一聲，新二八事變發生，使他終於不得不忍痛拋下了滿架圖書，而悄然出走。

綜觀阿英的一生，由左翼文藝批評家而轉變為編書家，更由編書家一躍而為紅透一時的戲劇家，也真可說是極盡「君子豹變」的能事了。

憶鳳子

郭朋

假如我們將時間往回拖個兩三年，又假定一個因戰事而繁華的內地都市裏，就譬如說在昆明吧！在一所裝璜富麗的西式寓所裏，這裏你一定要說我是故意向你炫耀，你會舉出極充實的證據，你也許正是從那山城來的，你會說在那貧瘠的小地方，比較像樣出色的房子是不輕易見着的。這也不打緊，我這麼說本不過打算給你一個最初簡單的意念，這一切堆砌的字眼也祇是比較地用來形容的，你是見慣那些高軒鑲着精緻木扇窗刷着黃粉的屋子的，得，我們就選定這樣的環境作為背景，你要問地點嗎？這也許不是頂難尋覓的，假如是在週末日，你也許正拖着一雙倦遊的脚步打從圓通公園步出來，我得提醒你，就沿着那條潔淨的石板道，不多遠你會瞥見一個新近油漆得黑亮的大門，我不想再多賣關子，這裏正是我們故事申女主角的住處。

時間是在仲春，飽滿鮮明的陽光從組織成圖案的窗洞裏射進來，整個屋子洋溢着這季節特有明快的氣氛，我們的女主人翁正歪躺在一隻大圈椅裏，她再一次欠了欠身，使勁作了一次深長的呼吸，她也許是倦了，瞧一整天她總是那麼忙着，清早她還出席了一次座談會，她趕寫了一篇短文，現在她該可以好好休息一會了吧。然而村想了一番，她的一雙濃眉又緊蹙起來了。她沒有好氣地怔了怔那掛在牆頭的日曆，她習慣地記起這不尋常的週末日子會給她帶些什麼事情來。可不是嗎？一會不是那幾個討厭的在大學教書的傢伙又要來了嗎？今兒晚上她還得熬半個夜去排戲，這是沒法避免的事，無論如

何，新戲在下禮拜一定得上演，許多花花綠綠的廣告也早已貼滿街坊了，她生活到這世界來像全是爲別人生活似的。她這多天來就從沒一份閒暇，讓自己靜靜地躺那麼一下。

「就譬如說，這麼飽滿的陽光，要是在它下面打會曬多美，」她喃喃自語着，然而就不行，她連這極細微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習慣地她又重重嘆了口氣：「生活着爲什麼呢？」這古怪的思想又再度從她腦筋裏飄了起來，這真是永遠沒法解答的問題，她爲此也不知研思了多少次，她也曾拿它去請教那批自詡爲老前輩的哲學家們，然而答覆都是莫明其妙地：「生活嗎？生活就是生活呀！」這就是那批學者的話，多好笑，一想到這，似乎連自身的繁累都暫時給遺忘了。他完全摸不清晰才她是在想些什麼，她的淺圓的酒窩裏又蕩起一層笑意來。

不管這些吧！她突然記起放在小几上的咖啡一定涼透了！對不起，我又說錯了，想想看，像咖啡這樣的東西在昆明該够多麼奢侈，我們的女主人翁端着的是杯紅茶，她微微嚥了一口，劣質茶葉苦澀的味道使她幾乎將灌進喉管的差一點吐出來，她又要埋怨了，這是多麼倒霉的地方，連咖啡都沒有，她就是喝慣咖啡的，她是在都市圈裏生活慣了的人，沒有咖啡的刺激，生活就會變得怎麼灰淡，對，她悟到最近所以感覺煩悶的理由，沒有刺激飲料的人生，是最難堪的戲弄。

她是個愛幻想的人，她希望這世界充滿着像古希臘承平時代一般的詩意，又或者像是像十九世紀初頭維也納所特別所染着的濃厚音樂情調一樣，然而現實的一切老是同她鬧別扭，她偏生在這樣一個灰色古老的國度，又偏逢着這樣不幸動亂的時代，一句話，上帝同她過意不去，成天總是戰爭啊！大炮啊！……她不敢想像這樣的日子如果再繼續幾年的話，她的靈魂怕將永遠給壓碎了。

我承認我是個拙劣的描繪者，你也許被我的話更弄得糊塗起來。但幸好這裏附着一張相片，會給你更多較清晰的輪廓的。你仔細瞧一下吧，對於美的標準一向有多方面的解釋的，她有着一頭烏黑燙成波浪形的髮絲，一張白皙微圓的臉，還有一張小巧玲瓏的嘴，一位大學教授讀過她的鼻子是屬於希臘型的，更有許多名流者說：「她的美並不在於面龐，而是她所特具的一種嫵雅風度。」我這裏祇是將別人的意見舉了點，還有一位當代的名詩人，爲着頌揚她那秀美的風姿，會寫下了許多優美的十四行詩，這位詩人是誰？恕我再賣弄一下，往後你會曉得的。

一位多方面活動的女藝人，她是作家，明星，她做過報紙副刊的編輯，也會擔任過婦女會的幹事，這就是鳳子。她應該是生活在一個快樂承平時代，然而她偏巧在戰爭的陰影下過着啣嚙心痛的苦生活，用她自己的話：「她是一個不幸的人。」

提起鳳子，這名字絕不是生疏的，遠在她的學生時代，這個超特的南國小姑娘就給人極深刻的印象了。「復旦劇社」時的鳳子是上海灘上一顆燦爛的星座，以後她又東渡到日本，「日出」一劇爲她奠定了堅固不拔的地位，許多日本人還爲她寫了好多讚揚的文字，鳳子一躍也就踏入國際藝人之列了。我們可以說，倘使新興的中國話劇給予日本人較多認識一點的話，鳳子該是這方面最早的介紹者。鳳子不但僅是演演戲的，她還是一個著名的女作家。「封禾子」這新穎的名字是一般愛好新文學的所習知的，她最擅長的是寫些散文小品之類，假如說冰心的文字是以細膩見勝，又或者說謝冰瑩，丁玲的風格可以用剛健樸實來代表，那末鳳子的小品文章則是屬於所謂「雋雅沖淡」的一類。她寫這類文字確具有卓越的天才，極其通俗的題材經她略爲渲染，就替讀者襯出一幅素雅的速寫來，讀她的文章正好比品一杯上好的龍井茶，可以發現無窮味道。

正如她爲人一般，鳳子寫下這般沖淡的小品文字是不會引起我們較大的驚異的。在日常生活中心，她是個較爲接近歐美風氣的人物，試想在一間陽光充足佈置精緻的屋舍裏，一面啜着咖啡，一面提筆寫點小品文章，作者超脫世俗的飄然的感覺是極容易叫我們領會的。但鳳子是倔強的，她是廣西人，那荒蕪山野間剛勁的風氣也許給她多少感染，有許多批評家說她最適宜寫小品文字，就一般人看來，這樣的斷語僅不過從她天才的寶藏中發掘一條最適宜的路徑，然而對鳳子說，這就是一種「難堪的侮辱」。這未免有點小覷了她揚溢的天才，爲着答覆那些批評家的無根據的發言，鳳子在事實上來一個強硬的抗議，她寫了一篇以戰爭爲背景的小說，那裏面照樣充滿着大炮啊，槍子啊，……那些滿篇叫人起着暈眩的可怖字眼，我們很容易判斷出鳳子寫這篇文章，一定是違反心的，她祇不過要表現她多方面的天才，來遮掩自己的缺點。藝人有這種矛盾錯綜的變態心理是決不罕見的，著名的大音樂家悲多芬的第二交響曲中特有的輕快活潑的節奏，就是在失戀後體嘗無限痛苦時掙扎着寫下來的。我們不妨說，這是同樣由於反抗心理的作祟而引起的，如果我們從這種違心的作品來判斷作家的氣質的話，那往往會得着相反的結論的。

鳳子以前發表文字最多的是南京出版的「中國文學」，上海的「文學」及「文季」等雜誌，平滬等大報的副刊上亦不時登載些短文。在中國，女作家一向少得如鳳毛麟角，鳳子憑着她特異的天才在文學界佔一席之地，這似乎也是極自然的。

於是戰爭的烽火燃起了，像大多數文化人一樣，鳳子也踏上了流亡之道。由香港而桂林而昆明，最後又來到重慶。但大致說來，鳳子仍是幸運的，物質生活享受的減低是事實，然而她絕未嘗到戰神所賜予的直接威脅，鳳子抱怨戰爭，抱怨那些灰色的鬼地方，祇是爲了缺少品上好飲料的福氣，此外

便再沒有比這更簡單的解釋的。

鳳子厭惡戰爭，然而戰爭使她受了更多的榮譽。戰前鳳子就是顆光輝的星座，而這星座在戰後是益發變得明亮起來了。在香港，在桂林，她先後爲人頌揚着。在她故鄉，與歐陽予倩合作的美滿的收穫，在廣西的戲劇界裏將永遠被人記憶着的。

帶着年青人勝利後的欣喜，有一天，鳳子幾乎像燕子般地展着輕鬆的羽翼飛臨山城的上空來了。我的意思是說，她來到了昆明。很多天以前，各大報都競載着她將蒞臨的消息，在這裏自然不缺少歡迎的人，教授學者們早已準備着迎接這位稀有的客人了。

鳳子來昆後不多久，受着教授羣的慫恿，就又重新在舞台上與世人相見了。這次戲是以西南聯大劇團名義來搬演的，除鳳子係由外界加入客串外，其餘演員均係清一色聯大學生，鳳子肯屈尊加入排演，是多虧她外子孫毓棠的慫恿，還有陳銓聞一多等，也儘力斡旋，事情才能順利進行，要不，憑着鳳子那股扭勁，是不會那麼輕易答應的。

劇本上演的時候正過着陰曆新年，那時昆明雖也有幾家專映外國影片的戲院，然大都陳舊不堪，這次聯大劇社的上演多少給予昆明人士較新的印象，昆明以前也曾有過一兩個簡陋的小劇團，然而用較新手法上演的，仍不得不以此爲嚆矢。昆明這幾年話劇事業所以有着飛躍的進展，這次的上演是少盡了點開導的任務的。

這次上演的劇本是「祖國」，是根據「前夜」重新改編的；這本來不是假好劇本，然而爲着要迎合一般觀衆的欣賞程度，又爲着宣傳，所以在僅有幾齣貧乏的劇本裏，終於選中了她。鳳子飾演的是一個年青的教授太太，這齣戲名義上是陳銓導演，這位矮胖的四川籍哲學教授除了有足夠獻身戲劇的熱

情外，對於導演一門完全是門外漢，演員們極少有聽他的，實際上担任他的責任的，却是孫毓棠開一多兩人。我們不難想像如其這齣戲真個由陳銓獨自導演，那成績一定會糟得不能再糟的。

大致說來，這齣戲是成功的，至少就淺識的昆明觀眾看來，都認為是個罕見的不朽作。鳳子在這齣戲裏，演技的精湛是不可否認的，然而還嫌太軟弱，特別在高潮的處理上顯得缺乏力量，如果說鳳子的演技有什麼缺點的話，這點該是她最大的遺憾，至少我個人是有這個感覺的。

鳳子是南國人，國語操得不十分流利，固然北京特有的地方俚語她無法傳出，即是像「兩」「倆」一類的字眼也咬不清，但她說話有一股柔媚，帶有音樂的節奏，這是她特有天賦的。有這麼個優點，即使她發音欠準確，一般觀眾也就原諒過去了。

祇要與鳳子稍為接近過的人，對於她的過份的傲慢態度，怕是叫人認為大不以為然的。我們也可以解釋鳳子並不是存心要傲慢，她也許祇是要表示她自己的超越身份，她這麼做，對她自己講也許是極自然的，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否認一個人有驕傲的權利，自然的情感的流露在某種情況下也沒有十分令人厚非的地方，問題祇是看你用怎樣的一個方式。過份的驕傲會毀滅一個天才的藝人的，古今中外像這樣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多少少，我真有點担心，像鳳子這樣一個有天才的作家兼藝人會不會因此而斷送了她整個的前途。

這裏我祇打算隨意舉兩樁小事情，雖然小，然而對於鳳子的性格是少可以窺出點的。「祖國」演至第四天的晚上，鳳子姗姗來遲，後台的工作人員疏忽了點是實情，然而瞧鳳子那種謾罵的神氣，假如是在職業劇團裏，你是紅得發紫的台柱，施出明星脾氣，那些小演員們也許就能低聲下氣承受得住，然而這裏的情形就兩樣，試想那批在大學裏念書的人，左右不過是逢場作戲，幹着好玩，誰能受

得了你的？老實說：「話說開去，哥兒個客客氣氣好商量，要是不乾脆就扯蛋！」就這麼着，事情鬧得怪僵，鳳子沒想到她施點小性子，動了哥兒的火氣，當時甚至有位年青小伙子頂頭撞了她兩句，鳳子一向被人捧在天上的紅角，從沒想到會跑來受學生們的氣，一別扭，於是兩行酸淚沿着眼眶瀉下來。這次對她的打擊可不小，多少天以後，當我提起那晚的事時，她還懷着滿臉難堪的氣色，你說這是她自己施性子造成的，然而還是將這話收回去吧！我們的鳳子對於這樣的解釋是萬萬不會接受的。

又有一次，時間我已記不清，大約是在暮春的下午，我們幾個人在她的寓所裏談起演員個性的問題，我們的意思是劇中人物由個性適宜的演員來相當，一定能收得更圓滿的效果。然而想不到這平凡的意見可引起了她的宏論來。對於個性的說法，她完全反對的，她說她就不信一個優秀的演員是會爲個性所限制的，舉一個例來說，一般人都說她較適宜演都市頹廢的女性，她自己可不承認，有機會她要做一個全然相反的角色，歸根一句話，她還是對自己的天才充滿着自信，第二天爲着補足她自己的意見，又在自己主編的報紙副刊上連續發表了關於這問題的文章，我想如其她今日在上海，對於石揮提倡的「打倒A B制」的議論，一定是最激烈的反對者。

一開頭，我們就說明鳳子是擅長社交的女性，她每天確實忙得厲害，她演戲，出席各種交際集會，同時她還擔任「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務。這副刊編得並不令人滿意，同樣在讀者羣中也不大受歡迎，然而鳳子拉稿的手段確是驚人的，比較著名的作家爲她寫文章的比比皆是。假如在編排方面更能新穎活潑點，那末比之大公報的「文藝」，也不會遜色到那裏。

自從「祖國」公演以後，鳳子的名字在西南一帶更是風靡一時，連那些昆明的土老頭兒也將她作爲談話的對象。鳳子是紅起來了，而且是大紅特紅起來了，這年十月間，爲着響應昆明戲劇節如火如

茶的劇運，鳳子再度走上了舞台，她連續獻演了「原野」及「全民總動員」。

這年昆明戲劇節之盛況是西南各地所罕有的。這次主催的是「國防劇社」，包括昆明所有最優秀的話劇工作者，然而主要的份子仍是西南聯大那一幫人，鳳子自從上次與聯大鬧過齟齬以後，又再度與原班人馬合作，這是表示她進步？還是出於她剛強個性的報復？這祇有她自己會明白。這次劇團爲着加強演出陣容，特地將曹禺從四川請過來，經過這位苦幹導演的努力，對於演出的效果是頗有把握的。

在「原野」裏，鳳子擔任的是金子，對於這角色的能否勝任，是一般人所最担心的，鳳子是個纖弱多病的女性，要叫她飾那樣一個潑辣而充滿野性的婦人，這也許不是太好的分派，然而鳳子倒底客允着担下來，她自己是反對演員個性的論調的，這次正是她理論最佳的試驗。瞧着吧，你們看我演不來這角色，我就偏要使你們吃一驚，好強的脾氣使她絕不會在任何人面前低頭。

鳳子確是應驗了她自己的話，她的確使熟識的朋友吃了一驚。她飾的金子演來維妙維肖，那種原始的頑強潑辣的個性都給儘量發揮無遺。她再一次勝利了，「瞧瞧我吧！」年青藝人的臉上掛着勝利的笑容，是任何人可以看得出的。

「全民總動員」裏，她飾的是個愛好虛榮和盲從的女性，劇中的女主人翁成天夢想着一個無敵的英雄——一個傳奇中披着錦繡騎在馬上的英雄，然而有一天，她發現她心目中那個渴想多時的英雄正是她日夜相處的那個跛子時，她失望了。故事很簡單，然而經過重慶「劇作協會」集體劇作寫成的，至少是較那些祇嘆口號的劇本較多意義。鳳子演這齣戲，我認爲在某數點上，同她自己頗有許多吻合之點，然而我也想得出，她自己是絕不會有這種感覺的。

鳳子是個愛好修飾的女性，在她的寓所裏，成天是絕不少有一批教授學者去光顧的。我們的德國哲學博士曾經在良友寫過「革命前的一幕」小說的陳銓，就是最習見的座上客。有人說，這位矮胖教授曾用盡心力去追求過鳳子，事實的真相很難說，然而陳銓確曾為鳳子寫了一齣叫「黃鶴樓」的劇本，而且那劇中主角就是以鳳子為藍本的，這齣戲一直未會上演，是鳳子拒絕呢？還是有其他原因？這將是一個永遠的謎。

鳳子的外子是孫毓棠，一個唯美派詩人，又是在大學裏擔任鐘點的歷史講師。他們兩人如何由戀愛而結合，這裏祇能留一個空白。人們所曉得的是，他們這般認識了，於是同居了一段極親密的日子。孫毓棠會寫詩，而且寫得極優美的詩篇，除此以外，他對話劇也是個熱心者，他像曹禺一樣，會自編，自導而且還能自演。在旁觀者看來，再沒有比他們倆的結合更為美滿了，他們自己也該如此想過，孫毓棠曾在人前讚揚鳳子的演技。他說：「鳳子演日出的陳白露有八十分，演原野祇六十分，至於演祖國還及不上四十分。」表面看來，也許是在說鳳子演技的退步，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反話，鳳子演「原野」，「祖國」，獲得一致佳評，他這麼說，無非是謙虛，那意思似乎在說：鳳子六十分四十分演技已經如此，要是八十分的話，那更會轟動的。鳳子演「日出」究竟怎樣好法，我沒親眼看過，所以對孫毓棠的話，也不敢妄加判斷了。

照理像他們這一對性情相投的佳侶，在生活的過程中該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然而事實上就不如一般人那麼料想得圓滿。也許是鳳子對於眼前的生活感覺着厭倦了吧，一天她悄悄地別了孫毓棠，還自飛到重慶去了。這在平靜的山城裏是樁大新聞。她同孫毓棠之間開了點什麼別扭，是局外人諱莫如深的，就連孫毓棠，對此事也緘口不言。猜測的人固然很多，然而比較合理解釋還沒有。僅有一點，

可以揀出點線索。原來鳳子在臨行前一天，在報紙上會發表了一篇「飛」的短文，大意似乎是說她厭倦了眼前的生活，她要飛，要飛得遠遠地，當天似乎誰也不會注意到這篇文章，然而第二天她真的飛走了。又有人將她比作「全民總動員」裏她所飾的女主角，好事的人說她在追求着一個夢裏的英雄，也有人說這位理想的英雄就是曹禹。我個人對這點是不敢相信的，曹禹是個正直嚴肅的人，而且同孫毓棠又是多年同學，私人的感情非常深篤，即使鳳子有這種表示，曹禹也不會輕易接受的。

不管這樣，總之鳳子是走了。她脫離了這生活一年多的山城，以後她沒再來過，自然你會想像得出，在重慶她是絕不少另一批新的教授學者們來爲她撐腰的，事實上她在那兒，確比以前得到更多的榮譽，如果不信，會與她合作，拍過「白雲故鄉」的高占非，該會證明我的話是不錯的。

我們這篇故事也該結束了。我們前面假設的地點是在昆明，主角已經離開這兒，該沒有什麼可以多記的了。這裏我們不妨將鏡頭再移到那個配角孫毓棠身上去。他比以前確更清瘦了，在重慶紅得發紫的鳳子還會記起這個忠實的老伙伴嗎？一句話，鳳子在新的生活中，獲得更多的滿足，然而有些人要爲孫毓棠抱屈：「瞧，一位詩人是這樣被毀了！」

獨腳學者潘光旦

士 傑

我認識潘光旦，遠在十多年之前，那時他一面編着一種定期刊物，一面替幾種雜誌寫稿，一面又兼着幾個大學的教授，忙得他不可開交。往往黎明即起，過了午夜才睡覺。朋友們說他『有兼人的精力』，那是一句很恰當的評語。但老潘（以下仿此）之所以身兼數職，並不是專門爲錢——因他的家口並不大——而是爲了他人緣太好，朋友們都喜歡拉他幫忙；或寫稿或介紹稿子，或教書講學，或現身說法，而他因爲盛情難却，往往接二連三地接受下來，當然呀，財源是亨通了。名譽是一天天地響起來，可是忙壞了老潘的身子，使他不得不把睡眠時間打上一個折扣。

老潘的精神和體力，實在一般人之上，在十來年的忙碌生活中，他從沒有生過一次病，不認識他的人以爲他『得天獨厚』，其實他却是一個高度的殘廢者——掉了大半段的右腿，其殘留部分祇及他大腿的一半，其短可想而知。他的腿是因病給醫生截去的，（有人說他因運動不慎而傷腿，那是不確實的）。那時他在清華肄業，還沒有出洋留學，但他的出洋資格却高人一等，因他的學業成績爲全級之冠。據他自述，在他截腿之後，頓覺一切希望全成泡影，畢業是不可能的了，（因他臥病經年，曠課甚多，）即使能補課畢業，而留學資格却喪失殆盡，因爲國家（清華是國立的）決不肯派一個殘廢者出國留學，退一步想，即使國家能破格相待，使他有留學的機會，然而學成後的就業問題，恐亦不容易解決吧。

幸而他平日學業成績甚佳，故清華方面特准他留校補習一年，然後讓他以「獨脚仙」的資格赴美留學。抵美後，抱着自強不息的精神，爲了要打破自身因殘廢所遭遇的障礙，乃主修優生學，歷數年如一日，不但學識大進，且亦漸漸忘却自身的缺點。當他留學時，他所肄業的學校離宿舍甚遠，平時往返非藉電車不可，且日必數次，他爲便利起見，竟不顧一切，拿着兩條拐杖，躍登電車，旁人皆爲他危，而他却置之泰然。

返國後，就「時事新報」之聘，編該報副刊『學燈』，公餘則在幾個大學講學，收入尚佳，他便拋却電車，買了一輛包車，雇了一名健壯的車夫替他拉車。認識他的朋友們往往看見他坐在包車上，（兩條特製的拐杖攔在車座的兩旁），戴上一副不新不舊的近視眼鏡，雙手捧着幾寸厚的洋裝書，在熱鬧的街上拚命地讀着，目不旁顧，這種情形，給別人看見了，準會引起極大的注意，而他則對於別人的注意完全不放在心上。據他事後告訴人說：他是在準備替一個刊物寫一篇「書評」，已經寫了一半，其餘半篇還不會寫下一個字，因爲他還不會把原書看完，可是發稿的時間却催他急於交卷，否則第二天便趕不上出版。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便充分發揮出他『下筆千言』或『一揮而就』的本領，他把已經寫成的半篇先行付排，——往往是他親自送到印刷所裏去——然後在印刷所裏校閱別人的校樣，校後立即送還給排字人，催他們速打二校。當初校已完，二校未來之際，他便抽暇趕寫他的「書評」的下半篇，在機聲軋軋，人聲嘈雜之中，寫他評論歐美學者之學術性的文章，他一邊翻閱原文，引章據典，一邊則走筆疾書，一揮而就，而且隨寫隨排，隨排隨校，等到排字人把最末第二批校樣送來時，他的最末一批的原稿已經寫好了。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往往能把一篇長約六七千字的長稿趕好排出去，使刊物如期出版，然而却苦了幾個替他工作的排字人，他們往往徹夜工作，敢怒而不敢言，但有

時也有例外，而老潘則一笑置之。

老潘素有『好好先生』之稱的，待人接物非常和藹，而毫無脾氣，但他對於他的本位工作——寫作或翻譯——却時常發揮十足的文人脾氣；高興的時候，一揮而就，倚馬可待；不高興的時候，擱上一年半載，嚙嗆希奇，罵他他不管，預先送稿費給他亦不能動他的心。朋友們知道他脾氣的，決不罵他失信用，也從不惡言相報，相反的，他們婉言地對他說出版業的難處，說是廣告已經登出，而稿子還未見影蹤，那是於他們太爲難了……這樣的訴說苦衷，往往能打動老潘的心，使他在短時期內儘速地趕稿，夜以繼日地開快車。在某一時期內，他因爲自己書室中來往的客人太多，不能安心工作，便悄然出外，在某公寓的高樓上借得靜室一間，摒除一切，專門寫稿或翻譯，這樣，他便能在一天工作八九小時的努力之下寫成萬把字的長稿。他這樣的速率能繼續到四五天，把幾萬字寫成後，休息二三天，再行工作，大約不出兩星期，他便能交出一部十萬字上下的稿本。他的趕稿的速率可說是驚人的。不過這是幾年前的事，現在怎樣，可不知道了。

朋友們知道這情形，必然以爲老潘的精力是過人的，就不約而同地問他的所以然，他的回答是怪有趣的：『譬如一份人家，開支節省的，經濟必然充足。我的身上缺了一條腿，在血液的供給上可以省却許多消耗，所以我的精力便特別充足。』人們大多諱言自己身上的缺點，而老潘則毫不介意，且會很幽默地對自己的缺點說俏皮話，於此可見他的雅量實有過人之處。

同老潘交朋友是怪有趣的。他的最顯著的特性是他的謙和，坦白，和幽默，這一些連初次認識他的人也能感覺到。當他在書室裏工作時，無論工作怎樣忙，對於走訪的人，他從不拒絕，且一見客人（包含他的後輩和學生）進來，便立刻找拐杖，支着身體站起來，雖然這種行動於他是怪不方便的。

當後輩的朋友站着不坐，或者東窺西望地翻他室內的藏書，他也非常高興，而且還肯娓娓細述他得書的經過，歷久不倦。

老潘又喜歡請客，與朋友們一同出去，祇要到了吃飯的時間，無論人多人少，他總喜歡邀他們到飯館裏，吃一頓有意思的便飯。高興的時候，或者天氣並不太壞，他竟會舍車（包車）而步行，擠在朋友中間邊走邊談，忘了路的遠近。他所常去的飯館是『經濟而實惠的』因為『經濟』是他所承認的一個要點，原因是文人的收入有限，而客則不能不請，『經濟』一些，就可以多請幾次了；『實惠』也是同樣不能忽略的，因為，如果菜的味道不好，或者油膩得令人生厭，或者花樣雖好，而分量太少，經不起一班健胃者的一筷一匙，那也不合乎『請客』的條件。記得十年前，四馬路中段一個過街樓上開着一家經濟飯館，門面不大，陳設簡陋，又須從弄堂裏的公共樓梯上進去，然而這家飯館的茶却烹調得法，頗具川菜味兒，價錢公道，祇須口袋裏帶着五六塊錢，就可以請四五位客人去大嚼一頓，去的次數多了，侍者的招待亦特別周到，祇要你泡上幾壺茶，便可以坐在這裏邊吃邊談地消磨兩小時的時光，等於開一次熱鬧的文人座談會。在這所謂『座談會』中，執着牛耳而談鋒最健的，無疑的要推老潘了。他的交友，不問輩份的高低，不問年齡的大小，對於若干曾受教於他，而為他所器重的學生，他是樂於交接，一點不擺老師的架子。有不懂洋文，而思想高超，國學甚佳的，他也樂於引為同調。這些朋友們，是一般人所認為潘光旦『派』的。人們都說他是『新月派』的健將，其實是不確的，他不過在新月書店裏出版了幾部書，同『新月』的發起人徐志摩並不怎樣接近，而一方面，兩人的志趣也完全不同。在老潘平時對人的談話中，從不以『新月派』自居，至他對於胡適，雖有先後同校之誼（胡適也是清華出身的，但比老潘早得多），但兩人的興趣也是完全不同的。胡適喜歡標新立

異，出出小鋒頭，玩玩政治，而老潘則是一個不愛出鋒頭的學者，一味埋頭研究，新舊兼蓄，而毫不歧視。有人說他守舊，那倒是不容否認的，因為他對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舊觀念，以及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促成的舊式婚姻，不但加反對，反從優生學的立場來加意提倡，說得頭頭是道，因此那些不明白他的思想背景的人往往罵他守舊頑固，不合時代潮流。其實老潘是中國有數的人文生物學者，而且還是他們中間最傑出的一位，他不特精於西洋的優生學，且亦擅長我國的文史，故能治中西於一爐，發人所未發。他又長於爲文，著譯甚富，如「人文生物學論叢」，「日德民族性之比較研究」，「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性的教育」，「性的道德」，及「馮小青的研究」等，其尤著者也。本文既爲「印象記」，對於潘氏學術的批評祇得從略了。

回憶許地山先生

江克

偶然的邂逅

去年六月初，我離開了盤桓經年的福建，道經江西、湖南、廣西及廣東四省，輾轉去港。記得是抵港的第二天晚間，在一個文友的招宴上，得與許地山先生作初次的邂逅。地山先生出身於燕京大學，畢業後曾留學英美，以求深造。歸國任教燕京母校，嗣經胡適之先生的推荐，担任香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因為胡氏認為：對於西方人士，他是一個東方文化的解釋者或說明者；對於東方文化，他可以運用西方人士治學的精神與方法，加以研究和發揚。以他對於歐風美雨的耳濡目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該是一個十足洋派的新人物了。大大地出於我的意料，地山先生是一位落拓不羈和修邊幅的人。一襲網衫，一柄蒲扇，加以他的健談和風趣，益顯得古人的儒雅之範。聽說我是剛從福建來的，他就很感到興趣，并且提出許多幾乎非福建人所能提出的問題。一談之下，先生的故鄉原來是閩南的龍溪，與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有同鄉之誼。先生關心桑梓，溢於言表，對於他的殷殷垂問，我只略陳了一些自信比較客觀而公允的私見。接着我們又交換了許多關於治學和譯作的意見，只恨時間太暫，不能盡吐為快，而以後會之期相約了。

薄暮歸來，追憶先生的初作「空山靈雨」「綴網勞蛛」，其中洋溢着豐饒的經驗，現實的意味，和優美的辭藻，會予我以一種不可言喻的靈感，而達於昇華的境界。我羨慕先生，多年來一瞻風采的

回憶許地山先生

先四

夙願，總算得償了。

半山的訪問

爲了南行之期的迫切，我在七月初專訪先生於半山區薄扶林道的香港大學，這一次的晤談就比較從容不迫了。就我的記憶所及，我們的談話是這樣進行的：

「你的筆名爲什麼叫落華生呢？」我笑着。

「就爲人，處世，治學三方面而言，我一貫主張是實實在在。所以取名落華生者，除『落』『生』兩個字以外，『華』與『花』是諧音，落花生俗稱長生果，非僅蘊藏不露，而其味雋永，我是以此自勉的。在『落花生』一篇散文裏，我不是寫過，只須有用，不要體面和偉大嗎？」

拿這個解釋證諸地山先生的爲人，處世和治學，是一點也不誇張的。卽就此時此地的香港而言，地山先生從封建文化的羅網中突圍而出，他的功績是不可湮沒的。他說：

「我是一向主張以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治學的。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的『扶箕迷信的研究』一書，爲了這本小小的書，我真也竭盡智能地一面搜索古書和文獻，做考證的功夫；一面根據最新的精神學及心理學的實驗結果，力糾扶箕的迷信，希望國人不要再上術士們的當，請神以決休咎了。」接着他又說到：

「香港的環境，你是知道的。今天某太史提倡讀經，明天某太史主張復古，我在這裏是很礙他們的限的。然而，對於舊傳統，我是『甘冒不韙』，操禿筆以前驅，向他們挑戰的。『國學與國粹』一文已經脫稿，交給大公報發表了。同時我更積極地，對於新文字運動和文藝講座，不但贊助，而且躬

自力行。」

「你看會有什麼反響嗎？」我這樣問着。

「我是準備有反響來的，給他們一個體無完膚的駁擊。」先生的坦白和正直，使我大受感動。

「聽說你在印度有一段苦學的經過，而且對於梵文很有造詣。」

「造詣談不到，稍有心得罷了。我對於梵文確也下了一番苦功，至今還不敢間斷。真的，你對於

印度文學感覺興趣嗎？」

這一問，倒使我想起七八年前偶然從朋友處借來的一本書，那是英國傳教士安得烈（C. F. Andrews）的「宗教經驗譚」。於是，我這樣回答：

「對於印度，除了甘地及尼赫魯領導的獨立運動，太戈爾的詩和劇本以外，我幾乎一無所知。你知道安得烈這個人嗎？他毅然離開了劍橋大學，排除萬難地到印度去傳教。他自承投身於一個非常的文化領域之中，要以半世的寶貴精力和時間，奉獻給印度的民衆，尤其是賤民階級。」

地山先生是一位虔誠而有修養的基督徒，又在印度一面苦學，一面向太戈爾及甘地等請益，那有不知安得烈之理。提起賤民階級，他似乎很有感觸，他說：

「賤民階級的英文原名是 'Untouchable'，一種不屬於任何階級的最下層羣衆。在階級界限森嚴的印度，賤民所受的壓迫和痛苦是可以想見的。他們在政治，教育，宗教……上應該享受的權利都給剝奪了。」說到這裏，地山先生從書架上拿出一本「企鵝叢書」，那是我所熟悉的，可巧書名就叫「賤民」，是一本小說。地山先生接着說到：

「作者愛蘭德是一個印度人，一九二五年他在倫敦大學考得哲學博士的學位。一九二九年歸返祖

國，投身於甘地所領導的獨立運動，并且潛心於小說的創作，專以印度窮街陋巷里的人們爲描寫的對象。已經出版的有「苦力」，「兩片葉子和一根芽」，「鄉村」，「越過黑海」等。這一本「賤民」還是最近出版的。長夏無聊，你若有意，翻譯出來，移植中土，倒是一樁美舉！」

談到這裏，相視而笑，只見窗外暮靄沉沉，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先生帶笑地說：

「願意到我家坐坐嗎，也還有一點小擺設。」

到地山先生的家裏，翻翻巨帙的藏書，撫摩珍奇的異寶，已經够我目不暇給，流連忘返了。那有不願之意。

「好的，」我這樣率直地回答着。

地山先生住在羅便臣道，那是香港的半山區，爲了往返便利起見，他自備了一輛小型汽車，車夫也就是他自己。

學者的家庭

香港是一座山城，我們的車子蜿蜒而行，雖不如山頂纜車那樣的穿山越谷，羽化登仙，而窗外的海景，滄波浩渺，雲水相連，也要嘆爲觀止了。

到了地山先生的家，夫人周女士和兩位公子已經出迎了。

使我驚贊不置的是藏書，尤其是佛典和梵文方面的，他說：

「要想登佛教文學的堂奧，非對梵文下一番苦功不可。對於國內一班僅憑漢譯經典大談佛學的妄人，只有付之苦笑。我加緊警惕自己，鞭策自己，早日完成『漢英梵文大辭典』一書的工作，給研究

佛學者一個必要的工具，也算對於中國學術界稍盡一點棉力。」

在地山先生的書架上，我又看到一本「達衷集」，那是鴉片戰爭前後中英交涉的史料，由先生校錄後出版的。這本書對於中國外交史的貢獻，姑不置論，而先生精心校錄的精神，只有使時下一般亂加標點和註釋的文人自慚形穢。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先生從印度帶回來的若干有關佛敎與藝術的文獻，太戈爾與甘地等人親筆簽字的照片和贈書……我相信，就中印文化的交流和東方哲學的闡揚上，先生是一個適如其份的理想人物，而今竟賚志以歿，能不痛悼？

一番暢談，一頓美餐，我從一個學者之家，回到闔無一人的陋屋，帶來的是先生的贈書「賤民」和他底誠摯的叮囑。

「賤民」的推薦

地山先生算是替這本書找到了一個歸宿，入晚，燈下獨坐，展而讀之，開卷就是福斯特的序言，他這樣寫着：

「這本小說描寫一個印度清潔夫的一日生活，取材是現實的。這是一本淨潔的書呢？還是污穢的？有些讀者，特別是那些自視爲純粹白種的人們，看不幾頁，就會漲紫了臉，動起怒火來，他更會大聲叫喊，不相信自己是在說話。雖然爲了另一個原因，我也不相信自己。在我呢，這本書似乎是無可形容地淨潔，我就心這寥寥數字不能表達我的意思。我們誰也不淨潔——假使我們潔淨的話，就不該還活着。但是，只須坦白，正直，一切事情都可以潔淨。愛蘭德的成功也許就是爲了他所攻擊的正是

應該攻擊的所在了。……」

正如愛蘭德這本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所說：「他們以爲我們污穢，那是因爲我們把他們的污穢洗滌淨潔的原故」……」

「清潔夫（編者按：賤民的一種）的遭際比較一個奴隸更加悲慘，因爲奴隸的主人和職務有更換的希望，甚至可以成爲一個自由人。但是清潔夫是一輩子出不了頭的，生來就被幽禁在一個狹籠裏，無法高走遠飛，社交的往返，宗教的安慰，都給排斥了。他自己不淨潔，一碰到別人，就會把他人玷污。他們必得先把自己弄淨潔，再安排一日的行程。當他沿着馬路行走的時候，在正教徒看來，他是一個不順眼而可憎厭的對象。他得一面走，一面叫，好讓行人迴避，這是他的責任。污穢會侵入他的靈魂，這是不足爲奇的。人家怎樣看待他，他自己也覺得的。有時人家說他是這樣的鄙賤，他也滿不在意。這既不是那班研究者的意見，也不是我個人一點小小的見證所產生的；我記得在我訪問印度的時候，曾經注意到清潔夫比較別種奴僕表情更敏感，而且更有風采。據我所知，就有一個人具有一些詩人的才情呢。……」

「賤民這本書只能由一個印度人來寫，而且他還得從外面觀察的。任憑那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歐洲人，都不能創造出像巴哈那樣的一個人物，因爲他對於他們的痛苦了解得不够。同時，沒有一個賤民能寫這本書，因爲他們會激於義憤，顧影自憐，而愛蘭德是一個理想的執筆者。」

地山先生是去年八月四日逝世的，迄今不覺也一年多了，悵望南國，憑吊無從，而我的翻譯成績還只是先生逝世前的二萬多字，僅及全書的三分之一。這是我愧對先生的地方。去冬港戰一起，倉皇避難，連那輾轉千萬里，跋涉與共，數年來弄得我心力交瘁的一點文稿，都不及救；「賤民」的譯稿

怕更是免罷不能倖了。

感謝D兄的高誼，終於把「賤民」的原書從千里迢迢的南國寄來了，這是在我的破書箱裏偶然見到的，至於譯稿，尙不可得。然而，這對蟄居之中的我，於百般無奈時，未始不是一個排遣之策。陋屋中，孤燈也榻，一桌一椅，果然能把這份翻譯工作早日完成，一可以紀念先生與我的這段慳緣，二也可聊破旅中的岑寂了。

從崑曲說到吳梅

古良穆

在最近的幾年，我們談中國的戲劇，好似已經淡忘了崑曲，在上海的遊樂場所，各地方的淺俗的戲劇，都有立足之地，爲什麼崑曲竟被棄之如遺呢？有人說爲了「曲高和寡」，沒有生意眼，這固然是不可諱言的主因，但是沒有好事者鼓吹提倡，也是一種副因。我們從戲劇的真正價值的立場說話，崑曲實在不應當撤在一邊的。

我們中國的戲劇，到宋元以後纔見成長，可是雜劇和北曲，還是很簡單的，自從明代崑山的梁伯龍顧良輔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一直到清末四百多年，占有中國戲劇界崇高的地位與廣大的領域。無論在歌唱，服裝，道具，以及表情動作，都完成了戲劇的美質。就是取而代之的皮簧劇，有許多是襲用崑曲的體制的。論起牠的功績，實在是中國戲劇的劃時代的成就。

這四百多年中間，產生了多少傳奇，並且有空前的傑構，像孔東塘的「桃花扇」，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鸞腰。「蒼涼激越」的描寫。暗示聽衆多少亡國之痛。顧曲塵談說：「相傳聖祖（清）最喜此曲，內廷宴樂，非此不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還有某筆記說，吳梅曾經在看了桃花扇以後，痛哭流涕。像洪昉思的「長生殿」，集歷來「天寶遺集」的大成，詞句采藻，直入元人堂奧，「和風徐起，蕩晴雲，鈿車一過，草木皆春。」把天寶當年的承平景象，寫得何等絢麗。王東淑柳南隨筆說：「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訪

思，昇，著「長生殿傳奇」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內賜，先后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吾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適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國忌，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秋谷贊善執信，海昌查學重太學，嗣璉其最著者也。」從這記載看來，在清初，崑曲因「長生殿」的見重，風靡都下，正是黃金時代，嫉妬者的攻訐，也是借着「國忌」作題目，對於崑曲的本身，沒有可乘之隙。雖然梁紹壬兩載秋雨庵隨筆說：「朝廷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執信）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也只對於「長生殿」內容的指摘，並沒有禁止崑曲的殺風景的舉動。所以在康熙以後的若干年，崑曲在都下，還是成爲「國劇」的。也許清末宮庭間，對於崑曲的欣賞程度，逐漸在低落，同時淺易的皮簧劇到了都下，目不識丁的滿洲貴胄，覺得容易領略劇詞的趣味，就把這「陽春白雪」的崑曲，冷淡起來了。可是在民間還是欣賞不衰，直到五六年前，上海還有一「仙霓社」的曇花之現呢。（初稱「新樂府」在廣西路笑舞台演出。）

說也奇怪，崑曲雖然託始於崑山，可是崑山的崑曲，並不怎樣發達，倒是蘇州，成了崑曲的大本營。我記得在童年，所見到的戲劇，總是崑曲居多，尤其是喜慶堂會。鄉間的「春臺戲」，也是「文武班」，所謂武班亦稱「徽班」，是皮簧劇的前身，文班就是崑曲。想不到不知文字爲何物的力田者，也能欣賞詞句艱深的崑曲，可知他們並不懂得劇詞，而只欣賞牠的表情動作，與大概的劇情。而詞句的艱深

無礙於欣賞的。

蘇州有不少的有閒階級分子，請了「曲先」來教授崑曲，有所謂「同期」，約了同好者，至期相集清唱，「道和俱樂部」就是一個人才薈集的崑曲票房。並且還有一婦女團體「幔亭曲社」，雖然沒有彩排過，也有好幾個女士們唱得很「入調」的。可是這兩個票房在戰後都已解散了。

營業性質的崑曲團體，到了民初，大有老成凋謝，難乎爲繼之況，就由蘇州的好事者，辦了一個崑曲傳習所，經過若干年月的訓練，出而問世，大家譽爲後起之秀，但是別於以前的團體，而稱爲「小班」，就是後來在上海演出的「仙霓社」。這些梨園子弟，都用一個「傳」字，作爲藝名，有甚深造就的顧傳玠朱傳茗都是的。可是照趨勢推測，這一傳以後，恐怕要失傳了。

我們從崑曲的廣陵散，想到蘇州的一位詞曲大師吳梅了。吳先生號瞿安，一字霜厓，他自述幼年卽喜崑曲，先是習唱，後來作曲，更進一步把詞曲作有系統的研究。在二十多歲就撰了一部「風洞山傳奇」，是把南明史作爲題材，而寫瞿式耜的殉國。柳亞子先生在故鄉用瞻寫版發刊鼓吹革命的「自治白話報」，連期登載這含有革命意識的崑曲。不多時吳先生就著成了「顧曲塵談」，爲崑曲作歷史的考證，及其藝術的理論，至今成爲中國研究戲劇詞曲的最早的唯一參考書。最後選刊了「奢摩他室曲叢」，每一種傳奇都有一篇精粹的序言，成爲每個作者的評傳。可惜最近發見的八百種丁初我藏明代傳奇孤本，沒有經過他的法眼，而加以論列。

吳先生填詞也是能手，這是由於他踐饋於傳奇之日已久，所以他的詞不是脛釘文字，而是不失「自然」的。在詩貴乎性靈，在詞貴乎自然，王國維批評元曲的好處，只是「自然」而已。他自己也會唱崑曲，可是沒有登過紅氍毹。在以前的慣例，到了歲暮，蘇州總得演幾天崑曲，有時在街頭貼出紅

紙，大書「敦請諸位翁台客串」，吳先生沒有參與過，因為他是唱「小生」的，丰神並不俊逸，似乎不合普通對於小生的想像。他的「湘真閣傳奇」，却經過「小班」演出過的。不過吳先生到底還是一個理論家，論「湘真閣」的編劇，並不像「綴白裘」諸劇的緊湊精采。所可貴的，每曲都能合於聲律，不像一般的傳奇，只能看而不能演的。

吳先生喜歡喝一點酒，所以上海有一位商人請他教授子弟，吳先生爲了晚上一頓夜餐雖然豐盛，給「有酒食先生饌」的禮節所拘，不能「引壺以自酌」地喝得自在，竟婉言辭謝，而仍舊膺中央大學之聘。他說，學校里教書固然費力一點，可是比較上自由得多，每星期不到十小時，餘下的都是他自由支配了。直到前年，客死昆明，還是以大學教授終其身呢。

中國的大學，列詞曲於學科，歷史很短，吳先生可說是開山始祖，先在北京大學，後在中央大學，許多桃李中間以盧翼野最能傳他的衣鉢，此外都是游夏以下了。他有一個很特殊的主張，以爲鉛印的書籍，錯誤特多，最好用木版，其次還是石印，雖然似乎不合進化理論，却也有相當理由。所以以後，要是刊行他的遺著，在校勘方面，必須十分精細，以慰他在天之靈。

他逢到蘇州有崑曲演出的時候，無論如何，必須來作顧曲周郎的，他說崑曲的衰落，要歸咎於觀衆水準的降低。到底崑曲是「盛始元音」，在一切戲劇之上。並且表情動作，一絲不苟，深合於古代的舞（宋代的「柘枝舞」，有歌有舞，表情動作都合着節拍，這是戲劇的濫觴。足以保存一部分的「先正典型」，應當把牠發揚光大的。但是我以爲崑曲所以衰落，是違反了易經所啓示的「窮則變變則通」的原理，因爲牠不能變，就不能通了。王國維人間詞話：「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

傳奇在初期，去古未遠，還沒有失去「元曲的自然」，到了後來，愈作愈深，專求詞藻的典麗，忽略了觀衆的理解，就給婦孺都解的皮簧劇奪去了。元曲的都用社會相習的方言俗語不必說，就是西廂記還是不十分深古的。還有一點，崑曲用「反切」，往往把一個字唱作兩個聲音，更不容易聽懂。吳先生主張印曲詞散給觀衆，這一點「仙霓社」在大世界演出時，已經實行過，比較的增加興趣，並增加了領會與認識。

他在上課時候，與會到來，也要引吭高歌，以作演述的參證的。他說大學不僅應當研究崑曲，並且應當學唱崑曲，比唱流行的俗曲，有味得多。他還有一個改進崑曲的建議，是很有討論價值的，他說崑曲每齣的時間很短，要是像現在戲院演四五小時，須排一二十齣，看了容易厭倦。不如在皮簧劇的戲院里，夾入四五齣，一來可以調節口味，反覺得別有風味，好像一座現代化的客廳里，在許多物質文明的陳設中點綴一兩件夏鼎商彝，決不討厭的。二來在唱的人，也不至力竭聲嘶，可以聚精會神地演出。因為過去「仙霓社」，每一個中等角色，每一天總得唱兩三齣，未免過多，過多了就減色。似乎洪深先生也這樣主張過，可惜崑曲的藝人和皮簧劇的藝人，格不相入，這一個計劃沒有嘗試。

吳先生是一個很風趣的文人，凡是文人所有的嗜好癖性，大概都有一點。尤其是對於考證學問上的推想作用。他在「顧曲塵談」上說作「幽閨記」的惠施就是作「水滸」的施耐庵，我一向關心于施耐庵問題的，見到了就去問他有何根據？他說好像鍾嗣成的錄鬼簿上有這麼一說。但是我說，錄鬼簿記施惠：「居吳山城隍廟，以坐賈爲業，每承接款，多有高論，詩酒之暇，惟以填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這「古今砌話」如何可以說就是「水滸」呢？他笑着說，不過是我的推想而已。他還有對於自己世系懷疑，有一個小故事。他說，他的祖先是宋明的帝裔，清

人入關，誅求帝裔，姓朱的都有俘虜危險，因此就把一個孩子交給義僕姓吳的領養。長成了還是不敢姓朱，而託言姓吳，過了幾代，竟是「數典忘祖」了。

說到這里，還有一個小問題，作爲「餘韻」罷。上面所說「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究竟弋陽海鹽的故調是怎樣的呢？我問過唱戲的人，都是茫然，最近我見到一位江西人而會唱戲的，問他，弋陽腔是怎樣的？他說是用笛子的，有時還襯着「漁筒」作爲節拍。不過唱詞却很粗淺，和皮簧劇差不多。我因此對於崑曲的改造，根據弋陽海鹽故調的說法，有些懷疑。並且崑曲的字音，都用中州（丑角用蘇白，倒是崑曲的本色），更與弋陽海鹽無淵源可尋。可惜我沒有在吳先生生存時請教過，不知道還有人能解答這個問題麼？

憶黃季剛師

蒲盧

一 集音韻學之大成

錢二瘋子疑古玄同在北京大學印行的「文字學音篇」的講義裏，把我們這位經小學大師黃侃先生推崇備至，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老先生「集音韻學之大成」，認為自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章太炎諸氏以下，可以算得精通中國古音韻學的，黃先生一人而已。錢氏は常常挨罵的一個人，「二瘋子」的名稱就是黃先生罵出名的，而竟能持論公正，不稍詆毀，可見公道自在人心，黃先生在學術上的地位的不可搖撼也就可想而知了。

關於我國聲韻學的研究，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實開其端，古韻母的分部，顧氏而下，歷江戴王章諸家，逐漸由粗而精，由疏而密，太炎先生的二十四部，可謂已是登峯造極的發明，而黃先生一脈相承，又復增添入聲四部，合爲二十八部，鑄諸家學說於一爐，發揚光大，金聲玉振，爲中國經小學界放一異彩，確立了「後無來者」千古不磨的地位。黃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我們於此說一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話，該是異常確當的了。

二 東渡日本列入章門

黃先生名侃，字季剛，號病蟬，湖北蕪春人，民初東渡日本，學習法政，那時太炎先生剛巧亡命東京，他因爲私淑已久，求教心切，輾轉得友人的介紹，把自己的兩篇作品呈獻上去，並附寄書信一通，大得章先生的賞識。那一封回信大約不很短，我記得在課堂上每當黃先生高興的時候，常會高聲朗誦地把牠一字不漏的對我們背誦起來。時間隔得很久了，我只能記得開頭的一句，那是：「得手書知君爲天下奇才。」

他自見太炎先生以後，學校也不進了，師弟兩人住在一起度着清苦的生活，他是窮學生，太炎先生也常得不着國內的接濟，據黃先生說：他們有一個時期每日僅僅吃兩塊大餅充飢，旋而國內匯來了一千元的款項，當晚就出去飽餐一頓中國料理。太炎先生的食量大得嚇人，十幾個碗碟的菜肴，一霎時便風捲殘雲似的一掃而光，他本身吃的實在有限。他們在東京一直住了三年多，他一直埋頭苦讀，把十三經注疏點完，兼及說文解字注、資治通鑑、四史、文選等類的書籍，執經問難，進益良多。他說：章先生是最先教他圈點禮記注疏的，唐賈公彥的文筆非常的不高明，糾纏繁複，佶屈聱牙，讀起來煞費苦心，此關如能打通，其餘的便一一順利通過了。

太炎先生盈門桃李，列計起來，何止千百，然而能升堂入室够資格稱做「弟子」的，實在寥寥無幾，而季剛先生便是此中的第一人，也只有他能傳其衣鉢。弟子而外，次一等的是「門人」，再次一等是「學生」，那就彷彿像恆河沙數了。黃先生每逢談到這一層，必然要提起馬融絳帳傳經，對鄭康成說「吾道東矣」的話，於此可見先生的自況是如何了。

黃先生告訴我們，他在跟隨章先生的三年中間，始終沒有「拜師」的動議，太炎很以爲奇。之後，他因爲本身有不得回國的苦情，乃徵求太炎的同意。太炎說：「你要拜一個老師常常指教你才

好。」他答：「什麼人好呢？」太炎說：「到北京找申叔（劉師培）吧！」他答：「暫時尚不能去北京。」太炎說：「浙江瑞安去拜孫詒讓也好。」他答：「不願到浙江。」太炎說：「伯弢（陳漢章）在南京可以找他。」他答：「南京暫時也不預備去。」太炎說：「那末，怎麼好呢？萬不得已就是勉強強點吧！」這時，他才認真的磕了個頭，算是拜師。這回事是他生平認爲最值得紀念的，酒酣耳熱之際，不時提起，引以爲榮，並以之斤斤自傲。

三 痛罵胡適之反對羅振玉

他生平除太炎先生以外，拳拳服膺的有兩個人：劉申叔和陳伯弢。劉執教北大，他也拜之爲師，後來蔡元培先生也請他講學，整個北京大學，就是他倆的天下，什麼人不在眼裏。劉是一位經學大師，十三經的注疏能倒頭背，著作等身，遺稿落在黃先生手裏的着實不少，他預備有機會把牠們彙刊問世，並痛斥竊據劉之遺著爲已有的人。奈此願未償，而先生已歸道山，非常可惜。胡適之在當時和他是同事，因爲倡導文學革命，很得大多數青年的擁護，並且和陳獨秀劉半農等互相聲援，聲勢很壯，可是一碰到黃先生，馬上就矮了半截，一陣臭罵，大概沒有嘴回。平心而論，黃先生並不肯抹煞胡氏提倡新文化的功績，這從他的言談上可以測知。本來他治學的態度是異常謹嚴平正的，關於什麼今古文之爭，漢宋學之爭，文言白話之爭，他決不意氣用事，總以持平之論來教人，這是我們理解得很清楚的。他之所以痛惡胡適，實在於維護師道的尊嚴，因爲胡氏本也是在太炎門下請教的，但是請教之後，一個問題了解了，馬上便對太炎來一個反駁，來一攻攻擊，以之作爲自己成名的手段。黃先生是篤守師承的一個人，會對老師的叛徒有好感嗎？再者，胡氏學問的根底又遠不如他，自然要更遭他的

輕視了。至於羅振玉的殷虛書契，他始終是反對的，根本他就不贊成龜甲文，我們常常聽到他「烏龜殼子」「烏龜板子」一類的譏諷的語調。在中大裏他只佩服歷史系主任陳伯毅，關於歷史研究方面，不惜虛心去請益，講授三禮時，遇到疑難，也往往取決於彼，伯毅也是不贊成甲骨文的。本來甲骨的研究尚缺少科學理論的根據，而羅氏所搜羅的贗品又不在少數，而其成名也以得諸王國維氏之力爲多，無怪他要不肯置信了。我記得那時中大甲骨文教授胡小石受他奚落的次數很不少，每次總是面紅耳赤的不加答辯，是理屈呢？抑是不屑與談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四 傲骨嶙峋與物多忤

黃先生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就是太炎的經學有時他也批評一聲：「粗」，小學是沒得說的。對老師如此，其他可知。我記得馬寅初博士有一次曾經拜訪他談說文，他置之不理，說：「你還是專心去弄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當時要人慕名去拜訪他的很多，除蔡元培居正諸人外，一概不加接送，如再要叨教，便遭大聲呵斥，說：「你們做官刮地皮的配談這個麼？」所以一般達官貴人沒一個不痛惡他，但也奈何他不得。每逢上課，他往往拿這些事來縱談取樂，並且提到太炎向不送客，嘴裏說「送」是客氣帳，來客謙虛的阻辭一下就算，某次岳維峻不知好歹，被太炎用力一推，直摔到樓下，這是咎有應得，接着便「哈哈」的笑個不了。大約這種脾氣也是秉諸師承的吧！從前在北京上課不願爬樓，教務處不知底細，偏偏他的課排在樓上的教室，他事先也未聲明，只一味恨當局和他搗蛋，一直一星期沒有到校，後來還是老蔡打聽到，再三登門勸說，其氣方消。上課講得高興，一拖就是兩三個鐘點。別的教授和學生白等在門外，

他也不拿眼去看一看，逢到不高興，幾分鐘就跑，幾天不到也是常事。在南京還是如此，我們弄慣了亦不以爲奇。他到中大是同門汪東（時任中大中國文學系主任兼代理文學院長）再三邀請來的，本來張作霖以重金聘他任東北大學講席，他已答應，中途失信，心殊不安。那時中大校長張乃燕人雖顯赫，但對他非常尊敬，相安無事，後來朱家驊繼任，搭起官架子，一直沒有看他，於是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捲行李滾蛋，當不起國文系同學再三挽留，到校長室請願，朱家驊居然也就做到三顧茅廬躬躬屈節的地步，這才總算把他老先生的辭意打銷。我記得在這期間，他曾給同學會一封信叫轉給各同學，因爲我也是同學會委員之一，到手再三誦讀過，所以還能記憶三分之二，茲特筆錄於下：「……：但既已懇辭於前，又復勉強留於後，直視去就如童豎戲，諸生何取焉？」慎爾優游，勉爾遯思，「諸生愛我，當爲我詠也。」

五 「黃酒」「大聯珠」「花生米」

黃先生抽煙很多，每天起碼四五十枝，在課堂上也抽。一直抽大聯珠，說是價廉物美。南京的花生米本就出名，又脆又香，他就挺喜歡吃。同學會每逢開娛樂會，他常到，這兩種東西我們總要多預備點。至於黃酒是法國貨，那時就靠近十餘元一小瓶，他每喝一次至少一瓶，這筆費用自然是很大的，除自己化錢外，還要人請。他有個親姪兒名叫黃孝先的，國學根柢尚可，也在國文系教點書，當助教，起初住在他家，兼任酒掃應對進退之事，不時受到鞭撻，每月所得，必須請老叔吃兩頓館子，總要有黃酒，非此不歡。後來好容易跟汪東先生商量，再三代爲緩頰，才搬到校內教習房去住，但是兩次酒食仍然照常，除黃孝先之外，請吃酒的主顧大部分是磕過頭的入室弟子，這種錢一班人都說化得

不冤，難得老師賞臉。其中有一個呆頭呆腦的潘姓學生，在中大旁聽，老是替黃先生挾書包，大家都稱之爲「顏回」，對老師也特別恭敬。後來就做了老師的乘龍快婿，大家都知道黃先生的令姪跟他在武昌大學讀過書，異常摩登，善於交際，相形之下，着實替這位「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顏回先生」捏一把汗。

六 「打屁股」的口頭禪

「罰打屁股三百」，「罰打屁股五百」，這是黃先生常用的口頭禪，他每逢不滿一個人，無論今人或是古人，往往都會這樣說。現在且來舉兩件說一說。有一次他到城郊居院長覺生（正）的公館裏去拜訪，院長的門房威風自然不小，看到他穿得很樸素，而且語言不客氣，一定不給他傳報，又推辭院長不在家，以至於大鬧起來。幸而居氏被驚動了，猜着一定是他，趕忙出來迎接，連聲道歉。他一定不行，要居氏當面罰打門房屁股三百，居氏說：「裏邊已經預備了好酒，喝兩杯再打不遲。」提到了酒，這事總算馬虎過去了。又有一回，中大門警把他大褂紐子扯掉，他氣得發昏，趕忙辭職。原來中大有校警數十，各門口照例站崗，稽查進出的人所攜帶的包裹。這班人都以爲大學教授總挾皮包的，布包一定得查。黃先生認爲查就是侮辱，一定不肯，結果褂子紐扣給撕豁了兩個。這件事又引得張乃燕趕忙打招呼，賠笑臉，他定要拿這門警打屁股，終於一再懇求，撤差了事。

七 「大老子黃侃」

記得那時金滿成在南京一家小型報屁股上常常寫東西，據說還是編輯。金一向主張廢除夫妻

制，擁護「革命的情人制」，其時他所寫的文章的中心思想，當然還離不了這一套，因之轟動了首都的整個文化界，羣起而攻。不知是那一位文人覺得自己人微言輕，就借重黃先生的大名寫了一封「致金滿成小子書」發現另一份報上，下面署名「大老子黃侃」。因爲是「衛道」，而且文筆也相當好，弄得全南京人信以爲真，各報館記者也紛紛到黃公館來訪問。那一天剛剛有課，黃先生哈哈大笑說：「罵罵也好，也罵得好，我也無須否認，反正稱我一聲『大老子』有什麼不樂意的。」

八 文人無行

黃先生是曠達不羈的一個人，雖不至於過分的放浪形骸之外，而不謹細行總是有。在南京我們所看到的師母是陶氏，年齡相當輕，武昌大學的高材生，和黃先生的令媛同學，是黃先生在武大任教授的時期娶的，師生戀愛確係事實。總之，少壯時代的黃先生，確是位風流才子，很有不少的韻事流傳在士林人物的口中。聽說他執教北大時，會不時涉足勾欄，偶而遇到學生，索性就在一塊兒廝混。事爲蔡校長悉知，極表不滿，而他却若無其事的分辯說：「我資格老，門檻精，他們跟了我，不會有苦吃。」一番話弄得蔡老頭兒啼笑皆非，無可如何，只有責罰學生了事。諸如此類的傳說，不一而足，確實可信的也不少。及至後來到了南京，人也差不多老了，而且因爲酷嗜杯中物，嗜好過深，弄得面目浮腫，不時咯血，體力既虧，興致也就銳減了，晚年的生活倒很是嚴肅的。

九 汪東吳梅尙在眼中

黃先生善於辭令，高興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甚且極滑稽突梯的能事，而談鋒又往往尖酸刻毒，喜當面揭人之短，以致同人避之如蛇蝎。在中大國文系同事之中，算對汪東最爲客氣，汪也奉之若

神明，常跑上課堂聽他爾雅和聲韻學的課，汪精於詞，課唐宋詞選，太炎先生評其詞「柔若無骨，太富於女兒氣。」聽同學說，有一次黃先生當衆對汪說：「你的詞怎麼老是這樣媽媽腔調的？你敢是水做的？」引得哄堂大笑，汪仍不以為意，虛心求教。又有一次汪先生的令兄駐日公使汪榮寶到京，在中大講演音韻學，當堂批駁太炎，黃先生引爲奇恥大辱，中途退去，氣得兩三日沒有上課，後經汪先生再三代爲道歉，怒氣始平，據他說要不看汪先生的交情，當堂會叫這位公使出醜呢！汪先生之外，又相當佩服吳梅先生，他說關於詞曲，瞿安尙能同他談談，每逢同樂會，他去一定要拉瞿安先生也去，一定還要唱兩段崑曲給他欣賞欣賞，有時吳師母還幫着親吹玉笛哩！的確，國文系同仁除汪吳兩人以外，不受到他冷嘲熱諷的，實在罕見。

十 不肯輕易著作

他對輓近人士的率爾操觚，濫事著作，非常痛恨，巴不得始皇復生，再來一把「秦火」燒一個精光。本來立言談何容易，他輕易不肯下筆，固然是自愛自重，亦所以使世人知所愧怍。他經小學工夫之深不用講了，而於諸子學說也有精密的研究，詞章之學更毋庸多說，只可惜生平著作極少，教書也不編講義，僅賴口授令學生筆記，所出版的書，音韻學方面有一本「音略」，是二十年前北京某書局印行的，搜購極其不易，我們始終沒有見到，據他本人說這僅是早年的一點敷淺見解。關於文藝方面有一本「文心雕龍札記」，比較容易得到。此外專著就沒有了，我所得到的有古音韻圖表十數種，游廬山記一篇及詩數十首，零縑斷素，都成瓊寶，可是軍興以來，盡歸散失，良深惋惜。先生是事變前仙逝的，並已歸葬故鄉，所有遺著大約多半被他姪兒黃孝先君和快婿潘君珍藏着，我想總有一天會給我們一個先觀爲快的機會的。

憶弘一法師

馮三昧

去年寒假，无悶兄從上海回來，他的行囊中除帶着他自己歷年飄泊的旅愁以外，更帶來了弘一法師的噩耗。他一見我便很感慨地告訴我這不幸的消息，而且再三叮囑要我寫點紀念他的東西。

就交情說，我和弘一法師，是並無深交的，平時過從也極疏闊，不像丐尊子愷諸先生和他有深切的關係。所以消息傳來，雖也在人生的寂寞無常以上，更激起了對友朋的哀感，可是在情緒上倒還並不發生怎樣深刻的痛苦。但不知是什麼因緣，我却和他有過兩次意外的遭遇，直到現在還深印在腦中，好像生了根苗，要忘記也忘記不了。因此雖無深交，卻也不是全無交情。

第一次是在民國八年的夏季，我和望道新從日本回國，因為他被聘為杭州一師的國文教員，就同留在西湖陶社度暑。其時「五四運動」的怒潮，正由北國的舊都奔騰到浙江文化中心的杭州，而杭州的文化領導者如劉大白，沈玄廬，沈仲九等諸先生，又都同住在此陶社。因此西泠橋畔鳳林寺旁小小的幾間洋樓（紀念紹興革命先烈陶煥卿先生的處所），一時便又成了杭州的文化中心。當時的座上客，男的有丐尊，馥泉，天底，猛濟諸先生，女的有謝雪，吳怡怡，毛彥文，蔡慕暉諸女士。而朋友間所常談及的，弘一法師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本姓李，名息，字叔同，別署息霜，弘一是他出家以後的法號。從前在「南社」上或什麼地方，雖也見過他的作品，卻從沒有見過他的人。一次，我和望道同遊虎跑，忽然想起了掛搭在虎跑的

弘一法師，擬順便去訪問一次。惟因生平從未謀過一面，總覺有點唐突，雖然朋友之間很多與他有私交的。經過我和望道考慮的結果，決定以「某社」同人的資格，前去拜訪。因為我和望道都是嚴肅矜持的人，這種突兀的過訪，在我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我們進了寺門，向小沙彌投遞了名刺以後，就被帶到一間僻靜幽寂的會客室，大約經過五六分鐘，就有一個年在三十左名，手持數珠，身穿黑紗僧衣的和尙，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從他清癯秀逸的面目，和溫文慈祥的舉止上看，我就斷定他是弘一法師了。當我們向他說明來意，彼此交換初會的談話以後，原想和他說些文學藝術方面的事情，因為他是日本美專出身，對這方面頗有研究和素養的。他不但對中國的詩文有很深的造詣，同時也還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手好畫，所以有「三絕」的確稱。其實他對音樂篆刻，也都有極深的功力，西湖西泠印社直到現在還保存着他個人的「印藏」。可見他合着十指拘拘爲禮的宗教的儀態和謙恭的樣子，卻又覺得不敢打攪，隨便談些佛家的事就匆匆地告別了。在臨行時，私覷着他踏上長階漸漸遠去的後影，不覺黯然魂銷，感到人生的寂寞。現在時過境遷，當時的印象還常浮上心來，形成暮烟似的漠然的悵惘。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會見。

第二次是在民十四或民十五年罷，也就是我和子淵先生被夏定侯所查緝的那年了。因了環境的關係，我先從奔波的四中，退避到奉化的錦溪中學，再從奉化撤退到白馬湖的春暉中學。由都市的奔波一躍而到山鄉的奉化，再轉而到農村的白馬湖，由緊張的社會運動者一變而爲安閒的隱遁者，孫悟空所表現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也許就是象徵我這樣的生活罷。

春暉中學是上虞富翁陳春瀾先生所獨力創辦的，學校的主持人就是富有教育經驗的經子淵先生，所以種種方面都較近於理想，教師的待遇雖亦難免清苦，卻富有道義感，和親和互助的人情美的氣

園。而學校所在的白馬湖，又是甬紹線上背山面湖的風景區，校舍也還算得相當的壯麗。尤其是沿山一帶星羅棋布的教員住宅，雖都是低低的平房，却家家有獨立的結構，新式的設備，有小型的庭園，和各種的花木，一到春季，屋後滿山的杜鵑花，和門前脈脈的春水，是够有趣的。我所住的正是弘一法師的弟子豐子愷先生的舊宅，當我遷入的時候，四面粉牆上還留有他手寫的詩詞，記得其中一首是歐陽永叔的「臨江仙」詞，子愷先生所寫的字跡，至今還歷歷地如在目前。歐陽的「臨江仙」詞，因版本不同，有兩種讀法：一是「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一是「水晶雙枕畔，猶有墮釵橫」。子愷先生所寫的，正是後一種的讀法。子愷先生因愛這詞，將牠題在壁上，我也因愛這詞，常將牠從壁上移到口上。但正因爲有了這最後的語句，後世評論歐陽時往往引爲人身攻擊的資料，真是不懂文藝的俗物呵！

這所屋由子愷先生到我，已經二易其主，如今事隔多年，又不知是誰人在作臨時的主人，也許事變以後，連屋子都沒有也未可知罷。從前讀崔護的「人面桃花」，往往與人生無常的感慨。現在回想起來，真不勝滄桑之感了。由於這寓居的關係，使我最難忘懷的，就是先後作故的經先生和弘一法師了。

一天上午，我從學校下課回家，女僕章媽私下告訴我道，適纔春社裏的和尙來向我們討過飯了。我當時雖沒有詳細根問她的情形，但我心裏已判明是弘一法師了。因爲我已聽得他因上溫州去，路過此地，就順便來看看舊友，正寄寓在我右隣の春社裏面。他是一個篤守戒律的淨土的皈依者，他不但實行着過午不食的素食制，每到黃梅時節，還常常要警戒出行，說這季節，地上的各種生物都要出來遊行，一不小心，就會因踐踏而傷害牠們的生命呢。這種博大的愛，和約制自己的精神，無論從那方

面說，都是可敬佩的。他的膳食，原由丐尊先生備就素菜，派遣家人按時送去的，這天却不知爲什麼沒有送去，也許是遲送了，所以到我家裏來乞食。當我邀請他入客堂，請他進餐的時候，他諷然地向我聲明，說這也是出家人的本色，可以剋制自傲自大的意念的。這是多曠達的胸境呵。聽了他隨緣的說法，誰也會受他溫暖的人格感動罷。無怪在他的薰陶下，桃李盈庭，造成豐子愷，劉質平，裘夢痕，朱穌典等許多高徒來了。他在寄寓春社的期間，每天清晨都到河邊小埠上去洗臉，他的牙刷，據我所見，已經大半脫毛，快要廢得一根骨柄了，但他毫不介意，仍照樣地使用着，也全沒有捨棄牠的意息。這雖是件小事，但無論是對人對物，處處都顯出他博大的愛，和崇高的精神。中國近來會產生過兩個高僧：一是曼殊法師，另外一個就是弘一法師了。曼殊法師是因家庭的悲劇，由壓制而轉入超脫的未來生活的解放，而弘一法師却是曾經風塵，由放浪而轉入嚴肅的過去生活的懺悔，故其表現於兩人宗教生活上的形態，各不相同。曼殊法師出家以後，還常涉足花叢，作詩酒的雅集，而弘一法師則會因丐尊先生翻譯獨步的女難而提出質難。這都可以做我們生活的啓示，爲我們所應該師法的。不過他那時的精神雖還健旺，身體却很清瘦，故凡見過他的朋友，都暗暗地爲他擔心，我就是惦記着他，常爲他的健康掛心的一個。

自從這次別開以後，我就因生活的關係，像斷綫的風箏一般到處飄泊，而弘一法師的消息，也就久未聽得了。去年寒假，先闊兄和我說起這事，我當初還不肯置信，以爲是一時的誤傳，後來看見各報都有關於他在福建圓寂的記載，這纔不幸做了前言的信徵。而我本來充滿歲暮窮愁的心上，也更添織了舊友的哀思，與寒冬的殘景，兩相應和。

章 瘋 子

崇 賢

章太炎，名炳麟，初名學承，字枚叔，又易名絳，後來才改今名，太炎是他的號。他是浙江餘杭人，學者遂都稱他餘杭先生。別署荊漢，著有荊漢微言，他的門弟子因就稱他荊漢師。

太炎的學術思想，在吾國學術界上，自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平生學術，在所著的荊漢微言裏會稱述過，是說：「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見諦轉勝者耶？後生可畏，安敢質言。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侷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謂專志精微，反致陸沉，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余雖無腴，固足以雪此恥。」他對於經學，治經的態度，比康有爲劉逢祿等來得真切審慎，成就也遠出康劉之上，卓然而爲近代的經學大師。對於小學，尤有極大的成功。梁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裏稱贊他說：「其治小學，以音韻爲骨幹，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始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至於所作的文章，近人都都稱牠內容充實，辭無枝葉，而且感情豐富，筆力雄健，具有一種迫人的力量。

大師與革命家

太炎固是位國學大師，同時又是位革命大家。當清代末葉，士大夫或言變法，或言立憲，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他却能截斷衆流，主正大義，提倡光復，經他文字的鼓吹，士民翕然從風，對於締造民國，有着無可磨沒性的功勳。他賦性簡質，言行率直，無所畏憚。獻身革命，持成仁取義，因於個

人生死，置諸度外。見解超人，於是所言所行，每不易爲世俗所瞭解。爲着他生平言行，頗多獨特的表現，因此世人便稱他做瘋子。他是否真的瘋子，我們來看下面幾則的軼事，和他一段爽直的自由，就可得到一個明白的答案。

在光緒末葉，太炎因爲提倡革命，見忌於清廷，於是便遊日本。到了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他從日本回國，和鄒容等在上海組織愛國學社，發行蘇報，從事革命的宣傳。持論激烈，清廷遂有拿辦愛國學社的密諭。上海道商諸總領事，總領事已簽字，工部局却以政治犯例應保護，不肯執行。在密諭裏要拿辦的，便是太炎和蔡元培鄒容宗仰吳敬恆陳夢坡等。工部局幾次傳吳蔡前去，告以盡力保護的意思，實則暗示被拿諸人，從速離開上海，於是蔡赴青島，吳往歐洲，陳夢坡游日本，宗仰避居哈同花園，獨太炎不走，亦不躲避，並囑鄒容亦不可去，並且說着「革命必流血」的一番激昂慷慨話。後來清廷又嚴諭兩江總督魏光燾，斥其形同擊贖，責其從速緝辦。光燾非常惶恐，爲着工部局不肯拘人，只得自己代表清政府做原告，控訴太炎等於上海會審公堂。工部局遂出票拘人，西捕至愛國學社，走進客室，便問「那一個是章炳麟？」那時太炎正在室中，泰然自若，便自指着鼻子答道：「我是章炳麟。」說罷，很高興似的跟了西捕到巡捕房去，後來竟坐了三年的西牢。當時新聞報記者譏笑太炎的不走爲愚。太炎在獄中寫了一封信給新聞報記者，有「志在流血，性分所定。」和「休矣新聞報記者，請看數百年後，銅像巍巍，高出雲表者，爲我爲爾，無待預決。」等語。太炎認明革命在伸張正氣，怎可畏首畏尾，臨難苟免。那麼太炎的不走，豈真是愚？

民國成立後，和議告成，南北統一，臨時總統孫中山舉政柄授諸袁世凱。袁氏抱着帝制野心，恐太炎反對，便把東省籌邊使餌太炎，却不使他開府辟僚佐。太炎於是決然去職，返至燕都，隱窺袁氏

野心益露，他擬效方孝孺故事，身穿麻衣，手執喪杖，痛哭於國門，來哀悼共和的將亡，後爲同人所勸阻。可是章瘋子的諱名，從此播露。

反對袁世凱

太炎留京不久，回至上海。眼見袁氏逮捕國民黨員，並藉口憲法問題，命令國會停職，他遂一面召集民黨故舊，密議討袁，一面發表反袁文字。袁世凱因爲他在南方公然發表文字攻擊，便以主持共和黨事爲名，招他到京。太炎絕不疑慮，毅然北上。到北京後，寓居共和黨本部。袁氏便命陸軍執法處長陸建章，派憲兵四名，緊隨太炎，名爲保護，實則暗中監視其言論行動。太炎爲着自己的身體自由，都被剝奪，因此在黨部中演出了好多回的洩憤舉動。

太炎居黨部右院斗室中，朋輩過從極少。每天和他談話的，只有張伯烈張大昕吳宗慈等三數人，上天下地，無所不談。太炎本來酷嗜杯中物，每每暢談既罷，繼以狂飲，醉則怒罵。有時在窗壁上遍書「袁賊」二字，有時掘起樹根，寫「袁賊」無數紙埋焚，大呼道：「袁賊燒死了！」怒罵倦了，便寫大篆小楷行草，以資消遣。有一天，太炎應黎堃甫約赴晚譚，乘馬車出門，憲兵躍登車，前後夾衛，太炎初未注意。譚畢回寓，見憲兵仍登車如前，便很不快。次日詢胡培德，胡笑着說：「這是袁世凱派來保護先生的。」太炎聽了大怒，揮杖驅逐憲兵，憲兵逃去，他便很得意的說：「袁狗被吾逐去了！」憲兵旣被逐，却換穿便服又來，向黨部中的幹事說：「吾等奉上命，來保護章先生，雖觸先生的怒，却不敢怠，因此改穿便服來。」那四個憲兵，不但易了便服，而且就居在司閹室中，不使太炎知悉。又有一天，陸建章派秘書長秦某進謁太炎，秦某見了太炎，便很恭敬的說：「敝處長奉大總統

命，謂先生居此，慮諸君供億有乏，將有所贈。」說着，探懷出鈔幣五百元，置書案上。太炎起初默無一語，至此遽起立，持幣直擲秦面，張目叱道：「袁奴去！」秦某見他勃怒，狼狽而遁。

黨部同人，見太炎悶居抑鬱，時時怒罵，足以傷生，便商請他講學。得了他的允可，剋期成立國學講習會，講堂就設在黨部會議廳的大樓上。報名聽講的，紛至沓來，袁氏私人受命來監察先生言論的，也廁講筵。太炎在講學時，貫串經史，融和新舊，絕無政治上感情歧出之意。講學過了一個多月，他忽有出京歸滬的意念。黨部同人知道其時袁氏的偵騎四出，怎得成行，却又不敢實告。在他出京日期，同人逆知出京必被阻，於是設筵爲餞，邀他縱酒狂歡，以誤車行。座中有人倡議把「罵袁」爲酒令，一人罵，衆人飲，不罵者罰，他大歡樂。轟飲至下午五時，他匆匆赴車站，却是車子早已開出了。這回「縱酒罵袁以致誤車」的趣事，是他後來和朋輩談笑的唯一資料。

絕食勸食

太炎欲行不得，不禁大怒，不肯再還黨部，就移居東單牌樓的華東飯店。到次晨七時許，他身穿藍布長衫，手執羽扇，胸懸位章，雇了御車，直抵總統府，要見袁氏。等候好久，沒有見到，他便大怒，把招待室器物，擊毀幾盡。袁氏便命陸建章設計誘他至龍泉寺幽禁起來，並諭建章特殊優待，不得非禮，但不許越雷池一步。建章奉命維謹，黨部中人偶來問候太炎起居的，必須得建章許可證，方可直入無阻。太炎焦怒，用杖掃擊器具，並欲焚其屋，建章飭監守者慎防。太炎無奈，宣言絕食。絕食已有好多天，袁詢左右：「誰能勸進食的？」王揖唐本是太炎門下士，受袁命趨寺婉勸。揖唐進見，先和道家常及他瑣事很久，後來便問：「聞先生將絕食死，其義何取？」太炎答道：「吾不待袁

氏來殺，寤自餓死。」揖唐便進言：「先生如此，袁世凱喜而不寢了。先生誠思，袁世凱果欲殺先生，事極易易，現在這般的處置先生，可知他非不欲殺先生，乃不敢殺先生，所以不敢，爲的不易負千秋萬世後殺士之名。先生今若自願餓死，那麼袁既無殺士之名，又得除心腹之害，先生所以爲袁謀甚善，但於自謀何疎？」太炎聽了揖唐的一番話，便允進食。原來袁氏對於太炎，目的在監視其言論行動，深知太炎爲天下重望所歸，豈敢加害？因諭陸建章監視太炎時，曾手示六條保護辦法，便是：（一）飲食起居的用款，多少不計。（二）說經講學的文字，不禁傳鈔，惟關於時局文字，應設法銷毀，不得外傳。（三）毀物罵人，聽其自便。（四）出入人等，嚴禁挑撥之徒。（五）何人和他最善而不妨礙政府的，任其來往，但必持有許可證。（六）早晚須派人巡視，恐出意外。

洪憲時，籌安會陝西勸進代表康寶忠，是太炎的傳經大弟子。太炎居龍泉寺，寶忠屢視起居。一天，問寶忠道：「我未教爾勸人家做皇帝，汝何故反背師說？」寶忠答道：「先生也是皇帝，素王改制，加乎王心。先生執春秋之筆，行天下之事。項城不過僭周室天子位，以洪憲元且爲元年春王周正月罷了！與周故宋，黜周王魯，筆削的權，仍屬先生。」太炎便說：「周家天子姓姬，洪憲天子姓袁，汝何不直稱他叫袁術，我已爲他貯蜜于斛，恐江亭呼喚，聲力俱碎，一滴也不能入口，還要想聞蜜脾香麼？速去！勿多言。」直至民國五年，袁世凱死，黎元洪繼攝大政，太炎遂得安然南下。

論神經病

民六護法軍興，太炎任大元帥府祕書長，奉命赴雲南，促唐繼堯出師川黔，以壯北伐聲勢。到昆明時，唐氏郊迎他，儀仗甚盛。一天，出遊昆明市，朗日高照，四無片雲，他却在輿前張着紅紗燈。

有人見了奇怪，問他用意。他說：「四海茫茫，到處黑暗。」原來唐氏在滇，聲勢極大。在那時，滇省的士大夫，方助唐氏作副總統夢。唐氏濫發紙幣，大開煙禁，其貽害人民，太炎早已覺察，因於白晝懸燈，藉資警告。而滇人不察，竟因是稱做他瘋子，豈不可嘖！太炎後和唐繼堯同赴貴州畢節，畢節是川滇黔三省軍事指揮總部的所在地。太炎製大纛，大書大元帥府秘書長名義。唐氏派副官長，緊隨太炎，照料一切。滇黔旅行，非至正站，食宿供應，都不很便。太炎每天行程，却隨興所至，多行二三十里，少行一二十里，並且非至正站，也常素白蘭地酒大砲台烟，藉以驅瘴，不得大怒，副官長因常受其窘。

民國十三年，黨國樹基於廣州，決採容共政策，總司令部延用俄顧問。馮玉祥組國民軍於西北，也把容共為政治宣傳。太炎那時在漢口，發電嚴詞譴責。當他發討赤通電的日子，全國亦以瘋狂目太炎。試想，他能發表這般大膽的話，豈是真的瘋子呢？

章瘋子的諱名，他自己也早聽得，曾經發表過一段精警的話，並且申明任憑人家說我瘋顛，我還守我瘋顛的念頭。爲什麼呢？他說：「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着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又說：「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前現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的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甚麼氣候。兄弟嘗這毒劑是最多的，算來自戊戌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兄弟在這艱難困苦的盤渦裏，並沒有絲一毫的

懊悔，憑你甚麼毒劑，這神經病總治不好，或者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於此。若有人說，假如人人有神經病，辦事必定蒼亂，怎得有個條理？但兄弟所說的神經病，並不是粗豪鹵莽，亂打亂跳，要把那細鐵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神經病裏，譬如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際，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看了這一番的話，他是否真的瘋子，不言而喻。



有人見了奇怪，問
省的士大夫，方吸
畫懸燈，清江雜記

種三第書叢誌雜

種 種 物 人

編纂者 雜誌社編輯部
出版者 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建國書店

南京太平路大行宮口

新國民書店

蘇州護龍街七〇〇號

定價：每冊拾元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